鲁SN(2010)016号　　山东省地图出版社编制　2010年3月

沂蒙史志 YIMENG SHIZHI
2014 · 11, 6

主　　办：临沂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协　　办：临沂市地方志学会
　　临沂市望族文化研究会
　　临沂大学沂蒙文化研究院
编委主任：赵爱华
编委委员：徐福田　秦鸿伟　刘广阔
　　李洪彦　赵建民　王长利
　　赵宗远　王培栋　刘兆东
　　李凤军　刘耀华　孙建中
　　李延杰　曲文军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胡拙安
　　钱　进　尹传贵　王士岭
　　顾怀亮　杨沂成　卢廷运
　　李忠山　董保东　韦瑞芳
　　朱海涛　伊永航　段　洪
　　于　芹　王卫东
主　　编：朱海涛
副 主 编：曲文军　刘兆东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本期执行主编：呼国英
责任编辑：杜　帅　宋希芝　贾　梦
　　孟玉玉
美术编辑：胡拙安　宋夏娟　周轩正
法律顾问：山东今海瑞律师事务所 刘海亮
编辑出版：《沂蒙史志》编辑部
刊　　号：鲁连内资（2011）第Q1023号

目　录

【本期特载】

邓子恢在沂蒙　辛鸿义　04

【峥嵘岁月】

井冈山女兵吴仲廉　周　燕　08
武工队郯城三打日伪军　杜继贤　13
沂蒙脱险　刘　静　16

【名人素描】

清代学者许瀚（下）　丁原基　19

【文化掇英】

红衣脱尽芳心苦
——记钱勤来老师　高　雷　24
助刘裕成大事业的刘穆之　眭达明　27
临沂出土文物之秦铜钺　刘　英　31

【探索发现】

蒙公氏景仁族五世祖公鼐家世及生平小考
公　杰　杨　阳　32

【古城旧事】

老城夜话（连载）　刘家骥　37
回忆姐姐　徐肇英　44

【诗画赏析】

张景华《白溪漫稿》选　47

麃孝禹刻石（帖）	徐森玉	49
【蒙山沂水】		
岁月尘封的钻石机缘	秦承良	51
追寻远去的“费县八景”	平　凡	54
【影像沂蒙】		
沂蒙革命根据地略影——巾帼铁流（一）	海　涛　高　雷　国　英	57
【史料辑存】		
王小古年谱（中）	刘瑞轩	59
八路军五纵三支队的组建与发展	霜林醉	61
【百家渊流】		
姓氏百家漫谈——吴姓（上）	赵丹峰	67
【文史论坛】		
一部恢弘瑰丽的信史——《大店镇志》	魏贤胜	71
【沂蒙名医】		
中医天路行 ——陈权足迹	惠东波	75
【史志动态】		80

封面：秦铜钺
（封面文物介绍见本期《秦铜钺》）
封底：清·屈复《沂水春帆》/胡石 书

地　　址：临沂市北城新区
天元商务大厦634室
邮　　编：276000
电　　话：0539-8727560
邮　　箱：yimengshizhi@163.com
szbyw2010@126.com
网　　址：http://www.linyisq.gov.cn
《沂蒙史志》栏目
印　　刷：临沂玉峰印刷有限公司

邓子恢在沂蒙

辛鸿义

邓子恢，福建龙岩人。1925年参加革命，是闽西游击队创始人之一。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邓子恢、张鼎丞等同志，以福建省西部永定县的溪南区、上杭县的蛟洋区，以及龙岩县的白土区为重点，领导群众举行了武装暴动，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1934年，红军主力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邓子恢留在南方继续坚持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邓子恢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1941年1月起，历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新四军第四师政委，淮北区党委书记。1947年1月20日，鲁南战役结束后，中共中央决定，华中分局正式合并于华东局，饶漱石为书记，陈毅、黎玉、邓子恢为副书记。根据华东局的分工，邓子恢负责组织地方支前、部队后勤、恢复区和城市工作。同时，华东全军实行统一整编，正式成立华东军区，邓子恢兼任华东军区副政委，并成立支前司令部，邓子恢被任命为支前司令员，统管地方支前和部队后勤工作。

建国初期，邓子恢曾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中南军区第二政委，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历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兼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国家计委副主席等职。

1953年后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1953年起，担任过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文革”期间惨遭迫害，因病1972年12月10日在北京逝世。

是第七、八、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邓子恢到沂蒙工作是在1947年1月。此前，他长期在新四军任职。皖南事变后，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第四师政治委员兼淮北区党委书记，和第四师师长彭雪枫一起坚持斗争，巩固和扩大了淮北抗日根据地。当时他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于9月19日发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决定山东分局改为华东局，陈毅、饶漱石北上山东，华中局改为华中分局，受华东局领导。同时成立华中军区，邓子恢任华中分局书记兼华中军区政治委员。此后，他和华中党政军领导人一起，团结华中军民，为争取和平民主和准备自卫战争作了大量工作。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华东解放区是国民党军进攻的主要方向之一。他们企图首先侵占苏皖解放区，消灭在该区的新四军，或逼迫其主力北撤山东，最后在山东决战。其时进攻华东解放区的国民党正规军约50万人，其中整编第十一师、第七十四师和新五军，皆属于其“五大主力”。在此情势下，陈毅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指挥山东和华中的解放军分头迎敌。经过3个月的艰苦战斗，虽退出一些城镇，遇到一些困难，同时也取得了歼敌8万的重大胜利。更重要的是，逐步实现野战兵团的集中统一的战略转变。

9月23日，中央军委电示：“山野、华野两军集中行动，两个指挥部亦应合一。提议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10月11日，毛泽东又发电称：“陈（毅）、张（鼎丞）、邓（子恢）、曾（山）、粟（裕）、谭（震林）团结协和极为必要。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你们六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往复电商贻误戎机），战役指挥交粟负责”。自此，邓子恢和华中区几位主要领导人随野战部队行动，参与对战役的筹划和部队的支援、供应等各项工作。

11月，国民党军为配合伪国民大会的召开，调动其在华东的25个半整编师共68个旅，分四路向华东解放区进攻。12日，陈毅与邓子恢、张鼎丞、粟裕、谭震林等华中领导人，共同研究了敌人兵力及动向。确定先打其由宿迁进攻沭阳和新安镇的一路。宿北战役从12月15日开始，19日胜利结束，共歼敌2.1万人。接着，中共中央军委致电陈毅、粟裕等，提出“第二步作战，似以集中主力歼灭鲁南之敌，并相机收复枣（庄）、峄（县）、台（儿庄），使鲁南获得巩固。”据此，邓子恢、张鼎丞随陈毅到达山东临沂与张云逸、黎玉会合。五人对中央军委的意见进行了讨论，并于25日致电粟裕、谭震林，速率华中野战军北上。这是邓子恢首次进入沂蒙地区参与战争的策划。

1947年1月2日至20日，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胜利进行了鲁南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六师、第五十一师及第一快速纵队5.3万人，并缴获了坦克、汽车、火炮等战利品一批。鲁南战役期间，华中分局、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都集中到山东，为成立统一的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提供了条件。12月25日，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分局和华东局、华中军区与山东军区、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并，使华中区与山东统一领导、统一收支。据此，从1947年1月21日起，原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华中军区、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番号撤销；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和中共华东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成立。同时，华中分局合并于华东局。从此，邓子恢改任华东局常委。经常在华东局的安排下，负责处理党政各项事务。

1947年2月20日至23日，华东野战军取得莱芜大捷。邓子恢和华东局、华东军区的几位领导人，于3月初齐集华野指挥部所在地——淄川大矿地蒲家庄，与华野领导人一起学习中共中央关于《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同时研究决定：抓紧时间对华野第八、第九、第十纵队和特种兵纵队进行兵员补充，并从渤海区调运粮食2亿斤至胶济路以南，以供应华野之需。这对加强华东野战军起了重要作用。

鲁南战役胜利后，邓子恢坐在缴获的汽车上，左二为陈毅。

随后，邓子恢又于3月18日，和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张云逸、政治部副主任张凯，代表华东局、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出席了在沂南县举行的华野特种兵纵队成立大会。邓子恢在会上作了长达7小时的政治报告，使参加会议的纵队的干部深受启发。

1947年3月，蒋介石对解放区全面进攻失败后，又集中近70万的兵力，对陕甘宁及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其中用于进攻山东解放区的多达45万人。在重兵压境的形势下，华野于4月下旬组织部队在泰安、蒙阴一带歼灭敌军两万余人。接着又于5月中旬，取得孟良崮战役的胜利，歼灭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整编第七十四师等部3.2万人。随之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华东局于5月22日召开支前工作会议，邓子恢等在会上作了发言。会议着重研究了山东解放区如何最大限度地调集人力、物力、财力支援战争。其中主要措施是继续进行土地改革、发展生产、动员广大群众参军参战和积极支援前线。

6月下旬，华东局由坡庄迁驻诸城县城以南的寿塔寺，在那里召开了土改工作会议。确定根据形势的发展，另行制订《关于山东土改复查新指示》。新指示规定土改中应实行“中间不动两头平”。其办法是：中农和靠勤劳致富的新富农的土地、财产不动，而使雇农、贫农与地主、旧富农按人口平分土地。这种办法，邓子恢早在华中任职时就推行过。当时他亲自抓了淮安石塘区鹅钱乡土地改革试点，取得经验，在华中推广。他并撰写题为《从鹅钱乡斗争来研究目前的土地改革运动》文章，发表在1946年的《华中通讯》上，借此进行介绍和推广。这次，他又在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强调在新形势下推行“中间不动两头平”的必要。

8月，根据中央提出的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要求，陈毅、粟裕率华野指挥机关、第六纵队、特种兵纵队挺进鲁西南，与原来就活动在那里的第一、第三、第四、第八、第十纵队，组成西兵团，执行外线作战任务；许世友、谭震林指挥第二、第七、第九、第十三纵队，组成东兵团，执行山东内线作战任务。随着华野主力的一分为二，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机关也于8月上旬，在掖县（今莱州市）徐家一分为二。确定由邓子恢、张云逸、舒同率华东局、华东军区部分机关转移渤海地区，组成华东局工作委员会（简称华东工委），由邓

子恢、张云逸主持，全力做好西兵团的后勤保障和华东局委托的其他工作，并直接领导渤海地区。华东局的领导中心则仍设在胶东。1947年8月上旬，邓子恢等在掖县的虎头崖登船渡海，于羊角沟登陆，进入渤海区。

华东工委到渤海区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华东补给支前中心，支援华野西兵团作战，以及检查土改，整理各军区和部队在渤海区的后方机关。在各项工作中，他们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尤其在整理财政方面，结合整党实施的“三大方案”，影响最大。当时，在渤海区吃饭的非生产人员计41万人，群众负担很重，财政面临危机。为此，华东工委于1947年10月10日至30日召开了各部门驻渤海区的高级干部会议。邓子恢在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了当时克服财政困难的三个办法，即厉行精简，核实人数；降低待遇，厉行节约；集中资材，统一财力物力的使用。他所阐述的办法，当时被概括为“精减编制，降低供给标准和清理资材”三大方案。在高干会议结束的当天，华东局即发出《关于贯彻高干会议精神及具体执行三大方案的决定》。决定指出：“这是克服当前财政严重困难，减轻人民负担，支持长期战争，争取战争胜利的重要关键，全党全军必须贯彻执行。”此后，三大方案不仅在渤海区，而且在华东解放区得到迅速贯彻，并且收到显著效果，既解决了财政危机，又完成了各后方机关的整党任务。

中共中央对山东采取的克服财政困难而实施的三大政策也极为重视。1948年7月15日，中央将此经验通报给各个战略区。通报说：“去年底，山东的财经状况是相当严重的。经过去年敌人的重点进攻，除渤海黄河以北地区外，其余地区的国民经济受到严重摧残，特别是大鲁南区域，十室九空，田园荒芜，庐舍为墟，农民嗷嗷待哺，而战争仍在紧张进行，战费紧迫，开支扩大。另一方面，旱灾在前，各灾继之春荒又将来临。虽然粮食奇缺，但不能不拨出大批粮食救灾，虽然财政困难，也不能不停止烧酒的专卖，改做平粜粮店。因而税收减少一半以上。……在这严重情况下，华东局向该区全党同志提出了‘三大方案’（略），并以身作则，坚决执行。因而一方面渡过财政难关，救济了春荒，开展了生产运动，正在医治战争创伤和积蓄力量，以恢复元气。可见我们的财政状况虽极困难，但只要正视困难，从最坏的情况出发，健全制度，坚决执行，我们是有足够的办法渡过财政难关的。”

1948年5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华北、中原两解放区的辖区和人选》的通报，确定邓子恢担任中原中央局第三书记（第一第二书记分别为邓小平和陈毅）。在赴中原局履行新职之前，邓子恢于5月中旬，偕张云逸赶赴胶东华东局驻地，与饶漱石、黎玉等共同研究决定：从鲁南、胶东、渤海各军区抽调5个团，分别补充粟裕兵团和华野第十纵队。之后，他又风尘仆仆赶往濮阳，于5月30日与陈毅等前往中原局，从此离开山东。

井冈山女兵吴仲廉

周　燕

吴仲廉，1938年离开延安奔赴山东，任鲁中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兼秘书长。1939年9月被选为山东分局出席中共七大代表，同月，自沂水王庄奔赴邳县，参与创建了苏皖纵队，出任八路军苏皖纵队（陇海南进支队）政治部主任。1940年4月返回山东纵队，参加了沂蒙山区的反扫荡斗争。1941年11月7日率山纵四旅独立团守卫大崮山。抗击了日寇以十倍于八路军兵力的进攻和飞机大炮轰炸达两天之久，胜利突出重围。后任山东军区政治部秘书长。1943年冬离开沂蒙山区，前往延安参加中共七大。

她是宜章农军中的一员女将，跟随朱德领导的湘南起义军走上井冈山

吴仲廉，湖南宜章县人，1908年12月6日出生。她的父亲吴初生在城关镇开了一爿卖鱼的小店，靠小本生意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父母省吃俭用供她读书。吴仲廉天资聪颖，清秀恬静，喜欢吹箫操琴，写得一手娟秀的毛笔字。

1926年夏天，国民革命军在广州宣誓北伐，汹涌澎湃的大革命浪潮席卷南方各省。毗邻广东的湘南地区自然首先受到革命的洗礼。正在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吴仲廉，积极投身到革命的行列之中。1927年4月，由同学曾志介绍，吴仲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吴仲廉等20多名宜章籍同学，

20世纪50年代初，井冈山老战友聚会北京，二排左三为吴仲廉，三排左三为康克清，三排右一为蔡畅。

在青年教师、共产党员张际春的带领下，返回家乡宜章县，在碕石村承启学校坚持斗争。

1928年1月12日，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在中共湘南特委和当地农军的配合下，智取宜章县城，掀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

第二天，吴仲廉和彭晒奉中共宜章县委指示进入宜章县城，直奔起义军指挥部，向朱德、陈毅汇报黄沙地区的革命活动情况。

这天，中共宜章县委在城内西广场召开群众大会。朱德、陈毅领导的部队正式更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会后，彭晒和吴仲廉与朱德、陈毅一起研究确定了碕石年关暴动和攻打黄沙堡的军事计划。

碕石年关暴动之后，一支由300多名赤卫队员组成的碕石工农革命军独立营正式成立，彭晒任营长，朱德派龚楷担任党代表，吴仲廉负责后勤工作。这时，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萧克也来到碕石村，向特支书记彭晒和组织委员吴仲廉递交了党组织介绍信。特支决定，任命萧克为独立营副营长兼第一连连长。

朱德、陈毅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很快占据了湘南，控制了贯通南北的重要通道湘粤大道，部队扩大到8000多人，形势一片大好。3月间，粤、桂、湘军阀混战结束，军阀之间取得暂时的妥协后，立刻勾结起来，以7个师的兵力对工农革命军进行“协剿”。为了保存军力，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同敌人决战，朱德、陈毅果断决定起义军撤出湘南，向井冈山地区转移。

她曾是毛泽东身边的书记员，古田会议决议最初就是由她抄写出来的

井冈山会师不久，吴仲廉被调到红四军政治部工作，在毛泽东身边任书记员。

为了打破湘、赣两省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解决部队给养问题，1929年新年刚过，红四军和红五军在柏路开会，决定分兵作战。红五军坚守井冈山，红四军下山到敌人后方牵制敌人。

为了更好地开展群众工作，红四军下山前，成立了工农运动委员会，前委委员谭震林担任主任。谭震林调来曾志、伍若兰、贺子珍、吴仲廉和康克清等7名精明强干的女将，组成妇女组。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的主力离开井冈山，进军赣南，先后进行了大余、大柏地、宁都、广昌等一系列艰苦战斗。

在红四军前委工作的那段日子里，吴仲廉经常给毛泽东抄写报告、讲话，她也增长了不少见识，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召开。吴仲廉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古田会议。古田会议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红军建设的经验，批评了各种错误思想，坚持以无产阶级思想建设党和人民的军队。大会经过热烈讨论，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代表前委起草的3万余字的8个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的最初版本，就是经吴仲廉亲手抄写出来的。

此时，21岁的吴仲廉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其实，她心中已经有了尚未公开的恋人——前委秘书、颇有才气的瑶族小伙子江华。但在领导和康克清等人的热心劝说下，吴仲廉还是服从了组织，与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曾日三在1930年夏天结婚，朱德为他们主婚。

随着中央根据地的不断扩大，许多青年妇女踊跃参加支前工作，其中一些人不愿回去，坚决要求当红军。经过中革军委和地方党组织协商，决定将她们编入红军学校女子义勇队，为地方苏维埃培养能文能武的妇女干部，并决定调吴仲廉和康克清分别担任女子义勇队的指导员和队长。

吴仲廉和康克清遵照朱德传授的经验严格带兵，不论队列训练、内务卫生、日常作息，还是值勤放哨都非常严格，从不懈怠和马虎。经过半年的学习和训练，女子义勇队180多名学员全都领到结业证书。

从二万五千里长征到鏖战河西走廊，她是悲壮历程中的坚强女性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主力被迫离开中央根据地，开始长征。红军出发时，吴仲廉是军委卫生部担架队政治指导员。这支担架队共有30多副担架，人员由100多名红军战士和一部分途中请来的民工组成。

在长征开始的前3个月里，红军日夜兼程，一路强行军。担架队的同志除了自己的行装，还要抬着伤病员，付出的艰辛可以想见。走着走着，一些民工便偷偷离开队伍。为了照顾伤员和整个担架队，吴仲廉不顾辛劳，跑前跑后，不断地劝说和鼓励民工们克服困难向前走。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

为了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和打通国际通道，中央组建西路军，西渡黄河，向河西走廊进军。吴仲廉奉命西渡黄河。此时，身为红九军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的吴仲廉，已经怀有8个月的身孕。不久，她在张掖西北的临泽县生下了一个男孩。

西路军在西进途中，面对的敌人的是以剽悍、凶残而著称的全副日式装备的马步芳部。1937年3月14日，在康龙寺南石窝附近，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被迫决定：将现有兵力和人员分为左、右两个支队进行游击活动，等待与党中央派出的援西军会合。李先念和李卓然率领的左支队向西行进了几天后，为便于主力机动，决定成立一支干部支队，由毕占云任队长，曾日三任政委，与主力分开行动。吴仲廉和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张琴秋也在这支队伍中。

一天傍晚，当他们到达北川门时，马家军骑兵像海啸一般汹涌袭来。为了掩护伤病员和妇女突围，政委曾日三亲自担任火力掩护。因寡不敌众，部队陷入敌人的紧密包围之中。敌人凶狠地嚎叫着：“当官的出来！否则，统统杀掉！”曾日三挺身而出，吴仲廉亲眼看着自己的丈夫倒在血泊之中。

吴仲廉被俘后，被敌人从张掖押解到西宁，在中山医院做苦工。此时，在马步芳第一〇〇师跳舞团里，扩充进三四十名被俘的西路军政治部剧团的女战士。当得知张琴秋、吴仲廉和妇女独立营营长陶万荣等重要干部被俘的消息后，女战士们非常焦急，千方百计地将她们认领到跳舞团，保护起来。

原妇女独立团女战士杨绍德被俘后，被“赏给”国民党青海省党部宣传科长陆澄做小老婆。一天，杨绍德去跳舞团看望女友，无意中发现了张琴秋，回家后便向陆澄告密。陆澄的上司正是蒋介石派驻青海监视马步芳的国民党省党部特派员、政训处长李晓钟。为了把张琴秋、吴仲廉等红军重要干部从马步芳的手里弄出来，李晓钟和陆澄假意应承将她们送回原籍的要求，并亲自护送。可一行人到达西安后，李晓钟和陆澄便原形毕露，竟把她们交给国民党宪兵队，直接将她们押往南京，关进国民党关押政治要犯的南京晓庄“反省院”。

她和丈夫是参加中共七大为数不多的夫妻代表，毛泽东教他们“察言观色”

1937年8月18日，周恩来、叶剑英到在南京参加国防会议，亲自到晓庄“反省院”探视在押的政治犯，并积极开展营救工作。10月初，吴仲廉和张琴秋获救，一起回到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十二班学习。

20世纪60年代初，江华（毛泽东右侧）和夫人吴仲廉（毛泽东左侧）与毛泽东一起用餐。

当年曾和她一起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战友江华，此时已是军委四局局长，他对吴仲廉更是关心备至。吴仲廉在讲述了这些年异常艰苦的战斗经历后，又谈到曾日三不幸英勇牺牲，以及留在河西走廊的不满周岁的儿子。这位在严酷斗争中从未掉过一滴眼泪的坚强女性，此时已禁不住潸然泪下。

西路军突围时，队伍被打散，吴仲廉忍痛把孩子寄养在甘肃临泽一个叫王学文的保长家里。吴仲廉被俘后，王学文曾前往张掖看望过她。王学文让吴仲廉放心，他一定将孩子抚养成人。为了纪念丈夫曾日三，吴仲廉给孩子取名王继曾。

听了吴仲廉悲痛的述说，江华的心情非常沉重。他安慰吴仲廉说：“等到革命胜利了，一定把孩子接回来，我们一起抚养他！”

见江华对自己仍然一往情深，吴仲廉非常感动，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1938年春天，吴仲廉从中央党校毕业，被派往陕西泾阳县，在安吴堡青训班任女生大队指导员。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山东的战略地位，为了统一领导进入山东的各支部队，决定成立山东纵队。江华被任命为山东纵队政治部主任。

离开延安前夕，江华去凤凰山向毛泽东辞行。毛泽东在分析了山东的抗战形势、叮嘱了一番关切的话语后，又关心地问江华：“这次去山东，还有什么困难吗？”

在毛泽东身边成长起来的江华，索性一吐为快：“我想和吴仲廉结婚！”

毛泽东笑了：“这很好嘛，你和吴仲廉曾一起参加学生运动，又都是‘井冈山人’，我同意你们结婚！不过，还要履行一下组织手续才是。”

听毛泽东这么一说，江华喜出望外。他恨不得插上翅膀，立刻飞到泾阳，把这个喜讯告诉吴仲廉。

1938年8月，由张经武司令员率领的山东纵队从延安出发了。在途经泾阳时，吴仲廉也参加到他们的行列之中，并担任山东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兼秘书长。江华和吴仲廉骑着马并肩开赴山东抗战前线。

江华和吴仲廉是在1943年冬天回到延安的，不久，便进入中央党校一部学习。

一天，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来找江华和吴仲廉，说是有个“老同事”要见他们，请他们到他的办公室来一下。江华夫妇纳闷地猜测着：“这个‘老同事’能是谁呢？”彭真神秘地一笑：“见了面，你们就知道了。”

江华和吴仲廉跟着彭真来到他的办公室。门刚推开，他们便惊喜地叫了起来：“毛主席！”

5年不见了，毛泽东比刚到陕北的时候胖了一些，但衣着还是那么朴素，精神特别好，谈笑风生。毛泽东关切地询问起江华和吴仲廉在山东敌后及回延安途中的所见所闻，特别是老百姓的生活情况。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江华和吴仲廉作为七大正式代表出席了这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党的代表大会。在500多名七大正式代表中，除了朱德、康克清，周恩来、邓颖超，张闻天、刘英，李富春、蔡畅等人外，夫妻双双同为七大正式代表的实不多见。

她是新中国第一位省高级人民法院女院长，毛泽东对她说：法院万岁嘛

1952年，吴仲廉出任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成为新中国担任这一高职的第一位女性。吴仲廉刚一上任，便带领省法院的同志，“一边作战，一边建军”。他们携卷下乡，巡回审判，在浙江全省普遍建立起人民法庭和巡回法庭，清理了数以万计的积案。

吴仲廉认为，人民司法工作既要讲专政又要讲民主，一个国家是否真正做到民主，律师制度的建立是一个重要的标志。1955年，她率先提出建立律师协会，允许律师依法为被告申诉、辩护。

1956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清查案件时，各地上报的死刑犯有854人之多。吴仲廉觉得这个数字非同小可，800多个死刑犯人要牵涉到数千名家属，影响面很大。于是，她亲自审阅案卷，核对事实，经常工作到深夜。她还派出近百人的工作队到各地核实情况，经过一一甄别，再三审核，最后确定非杀不可的只有24人。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去杭州。在杭州期间，毛泽东经常把江华和吴仲廉找去叙旧，回忆当年在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评说其中的是非曲直。毛泽东还经常风趣地与他们聊民俗，谈家事。当毛泽东得知吴仲廉一直担任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时，便诙谐地说：“法院万岁嘛！”

20世纪50年代以后，贺子珍长期住在上海。吴仲廉与贺子珍从井冈山起就是要好的姐妹。贺子珍每次来杭州，吴仲廉都要亲自到火车站去接她，还要请她到家里吃饭，聊上一会儿在中央根据地的战斗生活。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林彪、江青一伙阴谋篡党夺权，煽起“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并疯狂叫嚷“砸烂公检法”。吴仲廉是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兼党组书记，又是浙江省“头号走资派”、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的妻子，更是难以幸免。

1967年1月19日下午5点左右，勤务员去给被隔离审查的吴仲廉送饭。他推开门，只见吴仲廉坐在沙发上，头伏在沙发扶手上。勤务员以为她在休息，便过去唤她吃饭。走到跟前，勤务员惊呆了，吴仲廉已经死了……事后，有关方面给出的结论是：吴仲廉畏罪自杀。

然而，历史是公正的。1978年11月，浙江省政法系统为吴仲廉平反昭雪。

武工队郯城三打日伪军

杜继贤

1943年，为粉碎日伪军的“扫荡”、“蚕食”和强化治安运动，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二旅根据上级指示，组织连、排干部为骨干的武工队，深入郯城一带敌占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

1月，武工一队一行12人，乘主力部队攻克郯城之机，插入马陵山两侧，依靠人民群众，分化瓦解、打击消灭敌人，开辟郯城县的沭河区、徐桃区、郯三区、郯四区敌后抗日根据地。当时，我任指导员，化名邵子真。

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夺取前高峰头，在这里站稳脚跟。前高峰头是郯城县的大镇。日军在这里设了伪乡公所、伪警察所，周围建立了伪据点，是敌伪连接的纽带和交通咽喉。1月30日晚，武工一队攻打前高峰头，赶跑了伪军。但根据当时形势，敌人被我卡住咽喉，决不会就此罢休，必来与我争夺。为从长计议， 我武工队当晚全部转移到麦城，观察动向，待机行动。

不出所料，几天后的拂晓，驻桃林的日、伪军各一个中队共200多人，摸进麦城，企图从北侧夺取前高峰头。不料，与我麦城的民兵遭遇，当场打起来了。区中队和武工队及周围村庄民兵闻讯后，迅速赶来迎敌。我们利用有利地形，隐蔽出击，击毙敌两名，俘虏一名。日伪军气急败坏地逃走了。

3月下旬的一天，下午3点多钟，敌人进行“报复”了。郯城伪警备大队长带领两个半中队的伪军和一个班的日本鬼子，从阴村偷渡沭河，向前高峰头扑来。敌人刚出郯城时，武工队就接到情报。我们一面派人去山左口请求主力增援，一面派人通知赵敬涛区长带领区中队前来迎敌。赵区长到后，我们对形势作了分析，认为来敌虽多，但长途奔袭，地形不熟，短时间内不可能攻破我防线，便决定“固守待援”。下午5点多钟，敌人已进到前高峰头南的开阔地。伪军在前，日军在后，成“一”字形向我开来。赵区长用三八步枪瞄准一个敌指挥官，一枪打中。

抗战时期的武工队

武工队员正在出击

民兵、武工队员乘势猛烈射击。顿时，敌军队形大乱。伪警备大队长见队伍乱了，非常恼火，一边叫嚷“顶住！顶住！”一边示意炮手向我们开炮。只听“轰”的一声响，不见炮弹来，而敌炮周围却横三竖四地躺下了好几个伪军。事后得知，敌炮手在慌乱中把炮弹装倒了，掷弹筒炸得粉碎，伪警备大队长也差点上了西天。敌人受挫，只好趴在地下顽抗，相持一个多小时。黄昏时分，我主力部队一个加强排赶来，借着夜幕，相互配合，全线出击。日伪军一部分成了俘虏，其余的狼狈逃走了。

日伪军不甘心两次反扑失败，仍千方百计要消灭我们这支抗日力量。

四月底的一天夜晚，武工队正在麦城开展工作，大批伪军突然拥进前高峰头。据前高峰头的群众报告：“前来突袭的是田六、孙鹏九、曹光林三股伪军，足有1000多人。他们挨家挨户地搜查武工队员，盘问武工队的行动踪迹。”同志们听后十分气愤，纷纷要求出击。我立即和队长研究和分析敌情，认为三股伪匪平时矛盾重重，突然联合来犯，其中必有蹊跷。在没有弄清底细以前，不可莽撞。于是，我们决定派队员褚衍萱到前高峰头，通过关系，找到曹光林，摸清情况，然后决定行动方案。

第二天上午，褚衍萱回来向我们汇报了情况。原来这次突袭的主谋是原高峰头的伪乡公所长寇某。这家伙被武工队赶跑后，一直怀恨在心，便撮合田六、孙鹏九、曹光林三股伪军，企图将武工队一网打尽，夺回前高峰头。为此，他大摆酒席，宴请田、孙、曹三人。就这样，四个家伙终于在酒席桌上达成了“协议”，当晚进攻前高峰头。对田、孙、曹我们有所了解，他们都是当地有名的土匪头子。其中田六最坏，手下有200多人，经常四处打家劫舍，残害百姓，投靠日本鬼子后，更加疯狂。其次是孙鹏九，有100多人，原盘踞在阴村，被武工队打跑后，流窜到大院子一带为非作歹。曹光林的势力最大，有六七百人，称“曹团”，平时活动在瓦窑一带。为争取伪军中有民族意识的分子，发展抗日的两面派，武工队曾和他建立关系，双方表示“互不交兵”。他与田六、孙鹏九为争地盘矛盾重重。田六所以拉他入伙，主要是利用他的势力。根据这个情况，大家认为：对付这伙“乌合之众”最好的办法是政治瓦解配合军事进攻。我们决定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分化曹光林，然后以军事压力动摇孙鹏九，再集中力量打击消灭田六。

下午，褚衍萱第二次进入前高峰头，做分化瓦解工作。五点多钟，褚衍萱返回麦城，

向我们汇报了情况。他对曹光林说：“领导叫我给你送个信，今晚我们大部队就要包围前高峰头，消灭田六、孙鹏九两股匪徒，由于你昨晚给我们提供了情况，领导表示你还‘可信'，所以给你打个招呼，何去何从，请君自便。”说完，曹光林马上表示感谢对他的“照应”，并说他的人马黄昏就撤出此地。还说，今后请你们手下留情。

晚7点，我们兵分两路，急奔前高峰头。刚离开麦城不远，突然听到南边一阵枪响，估计是敌人发生了“内讧”。事后得知，田六吃过晚饭，得知曹光林的人马突然撤走的消息，火冒三丈，急忙集合队伍，追赶曹光林，在村南头与“曹团”相遇。田六骂曹光林不够朋友。曹以“家中有事，急回处理”为由，依仗人多势大，不顾阻拦，策马而走。田六由于势力单薄，只好忍声吞气，对着远走的“曹团”，乱放了几枪后，龟缩进村。

当我反击部队接近前高峰头时，孙鹏九得知曹光林把队伍拉走，八路军又大兵压境，自知面临灭顶之灾，便率领人马，与田六不告而别。这时，只剩下田六这股伪军了。他手下的人早已慌了手脚，个个惊慌失措。田六自感危在旦夕，骑马就逃。伪匪兵也立即尾随逃窜，结果闯进我埋伏圈，被我打得七零八散，丧命近半。

我们连续打退敌人的三次反扑以后，武工队便站住了脚，以前高峰头为中心在北至郯城城关、南至新安镇及杨集、崂沟、归昌一带活动。沭河两岸的群众在我军的胜利影响下，纷纷起来抗捐、抗粮、抗税，抗日斗争基本打开了局面，为以后东进徐桃、开辟郯三区创造了有利条件。

相关链接：强化治安运动是日本侵略者为扩大和加强它在华北的统治所采取的法西斯措施。其主要内容是：在治安区（日占区）实行“清乡”，以禁绝抗日活动；对“准治安区”（游击区）进行“蚕食”，扩大占领面；对“非治安区”（抗日根据地）加强军事扫荡和经济封锁，以彻底破坏抗日根据地的生存条件。1941年3月至1942年冬，日军在华北共推行了5次强化治安运动。

作者杜继贤，文中身份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二旅武工一队指导员。

青纱帐里埋伏待命的武工队

沂蒙脱险

刘　静

1941年初冬，日军向沂蒙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惨无人道的“扫荡”。那时我在鲁中军区二分区司令部机关担任代理指导员。面对强敌，大家一致决心要经受考验，即使战斗到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坚持斗争。

有一次，敌人以密集队形，实行分层“清剿”，包围了我分区部队，还出动飞机大炮狂轰滥炸。为避开敌之锋芒，我们分散转移，边打边撤，伺机突围。我随着部队连续奔跑了三天，在路上吐了好几口血，实在走不动了，就抓住马尾巴跑。当部队抵达沂水大顶子山时，我往山坡上一坐，腿就抬不起来了。敌人已追上山来，同志们催我快跑，我爱人王兆相（当时任二分区司令员）带着警卫员过来了，着急地说：“你怎么不快走？”我说：“走不动了。”警卫员王秀田就上来要背我，我立时甩开小王的手说：”你们的任务是保卫首长，快点走别管我。”我又向王兆相说：“你指挥部队要紧，快点走吧。”他为难地说：“你怎么办？”我说：“我有办法，你别管我。”他一边说着“对不起你了”，一边和警卫员往山上走。走几步又回头向我说：“宁死也不能当俘虏呀！”为了让他放心，我举起手枪，向他表示；“我是能够保持共产党员气节的。”部队的同志都走过去了，我紧握着抢，准备和敌人拼。等了一阵子却没有动静，抬头看太阳已快落山。我想不能坐着等死呀，还得走，试了试，腿不大听使唤，但还勉强可以走。我边走边爬，突然看见对面小山头有几个日本鬼子来了，我见不远处有口棺材，冲过去想躲进棺材里，可是用了很大气力也掀不开盖子。又见附近有好几具尸体，我过去把尸体移动移动，就躲在尸体堆中。日本鬼子过来了，把上面的尸体踢了几脚，“叽里咕噜”说了几句就走了。我屏住气，握着枪，一动不动，等了一会儿，再无动静了，我站起迅速往石崖上爬。突然，从山上下来一个人。我端起手枪，心想，是敌人就打死他，敌人多了我就向自己开枪。可仔细一看，走近来的是警卫员小王，我高兴地呼喊起来，问战斗和部队情况怎样。小王说：“不要紧，伤亡不大，敌人吃饭去了，我们到处找你，这下总算找到了。”说着，他扶着我一瘸一拐地赶上了部队。

领导上根据斗争越来越残酷的现实情况，决定部队的女同志留在地方隐蔽起来。政委王一平同志找我谈话说：“刘静同志，组织上决定给你配两个同志到县区隐蔽，同时领导当地群众一块反“扫荡”。

我向政委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决定。王政委交代了要去的县区地址和注意事项后，我们就出发了。

这时天已大黑。我们照直前进，也没有指北针，就按北斗星辨别方向。

走着走着，遇到了分区独立团的同志，我们三个人就跟他们团部直属队一起走，走到山边一个大村子，突然敌人的枪响了，激烈的战斗把我们冲散了。我爬上一个土坎，敌人又是一阵子机枪扫射。我滚下来顺着河沟跑，突然觉得左腿麻木，一会儿疼起来，用手一摸，黏糊糊的，我知道自己负伤了，就摘下军帽，垫在伤口处，解开绑腿，把伤口裹了起来。这时天快亮了，我已跑不动，想找个地方隐蔽。看看附近有个石崖缝，我就把身子挤了进去，可是崖缝浅小，腿脚还露着，我正要想法，突然觉得有人在我脚边放石块，回头一看，是个老乡在为我遮盖身体。当时我感激的心情就无法形容了。

进了石缝，我发现上面正是一条靠山崖的路，敌人陆陆续续从山崖上面过去。天黑后敌人也没走远，还在我隐蔽的周围点起了一团一团的火。我想，老待在这里也不行，便悄悄地爬出崖缝，爬了不很远，日本鬼子开始搜山了。正好跟前有一口水井，我就不顾一切跳了进去。井水不到一人深，我在小时候就学会了游泳，跳下去虽喝了几口水，但很快扒住井壁，把身体隐蔽起来，把头紧靠井壁。由于负伤流血过多又饿又冷，泡的时间一长就支持不住了。将要迷糊时突然听见井上面有响声，看见一个老头在打水，我就拉住了水桶。老头吓了一跳。我忙说：“老乡不要怕，我是八路军。”他听我的声音是个女的，就说：“村里有敌人，我回去看看，敌人走后，我再来想法救你。”老大爷走了，一顿饭时间还不来，我后悔不该向他说明身份，但又上不去。正焦急时，老大爷领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到井口来了，他们用水桶把我拉了上来。老大爷说那女孩是他的姑娘，敌人现在已经走了，让我去他家。一进屋，大爷的老伴看见我那个样子就哭了，给我换了干衣服，端来热腾腾的绿豆稀饭、香甜的红薯煎饼。边吃老大爷边问：“听你口音不是本地人。是不是陕北的红军？”我说：“是的。”老大爷又说：“不是俺不留你住，鬼子天天挨门挨户搜，待在这里太危险了，还是送你上寨子山吧。”我说：“行。”老大

日本鬼子在扫荡中

爷说：“你这军衣可不能穿了。”说着就把我的棉袄撕开口，掏出些棉花来，拧干了，放在火上烧糊，捂在我伤口上。老大娘说：“女人家到哪里也不方便，干脆女扮男装吧。”我也同意了。她就拿着剪子把我的长头发剪掉了，还给我戴了一顶帽子，又说：“你啥武器也没有，万一碰上敌人怎么办？”我说：“大娘，就把剪子给我吧，万一有事，也可以用得上。”实际上我带有短枪，只是换衣裳时没有让他们看见。老大娘说：“行，给你带上。”说完就把剪子递给了我。她怕我冷，又给我披了一件夹袄，包了一兜子红薯塞到我怀里。这短暂的相遇，真使我感到了军民鱼水的深情，使我终生难忘 。

第二天东方快亮时，我才爬到寨子山顶，山头冷风嗖嗖，空无一人。为不被敌人发觉，我抱着一把枯草，今天住在这山头，明天又换那山头。带的红薯很快吃完了。饿的实在受不了时，就在暮色苍茫中爬下山，摸到村边去要饭吃。拣了快破麻袋片披在身上。为了不暴露陕北口音，我就装成哑巴，比划着向老乡要点吃的。后来，天下大雪，脚冻肿得像馒头，我就找些树皮，再用草拧成绳子，把脚包起来。腿上伤口越肿越厉害，有时一站起来，脓血就顺腿往下流。身体太弱了，饥饿伤痛，使我站不稳、走不动。但是，我坚信，敌人的“扫荡”总有一天会被粉碎的，日本鬼子一定会被我们打败的。于是，我忍着疼痛，顶着风雪，一次又一次下山，一面讨饭，一面了解敌人动向，打探战友消息。

有一天下山要饭时，走到一家老乡门口，突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不仅大吃一惊，细细一看，原来是分区宣传队女队员小高。我俩在患难中相逢，真是惊喜交加，但残酷的斗争，又使我不能不保持高度的警惕。我知道小高那时还不是党员。交谈中得知她也是部队分散后，被一家老大娘掩护起来的。我们当即一起上了寨子山。小高是上海人，大学生，我想她能坚持斗争到这一步真不简单了。她很泼辣，白天常爬到树上观察敌人动静。漫漫长夜，冻得我们睡不着觉，就互相搂住脚取暖。敌人常常搜山，我们就和敌人在一些山头上捉迷藏。敌人走了我们就下山要饭。在山上呆了二十多个日日夜夜，但仍不见自己的队伍来。小高建议说：“咱们不能在这里等死，你现在还走不动，我去找部队，找到了就来接你。”我嘱咐她一路小心，依依不舍地分开了。

把小高送走，山上又剩我一个人了。为防万一，我除了有时下山要饭，还得不断转移山头。有一天，我转到一个小山包，见到一个十二三岁的放羊孩子。他看我一拐一拐的瘦弱不堪，像个伤员，就认定我是八路军，主动向我讲，他是沂水地区的勤务员，还说山下不少村政权的人叛变了要我千万别下山。我看他态度很诚恳，表示向他感谢。这样，每天我就替他放羊，他帮我要饭，不断给我打听山下的情况。一次，他要饭回来，突然问我：“你是不是王司令员的爱人？”我说：“你胡说什么，我还不到二十岁，没有结婚哩，哪来的爱人？”他说：“山下来了一些人，说是要找一个王司令员的爱人，我看你就像。”我说：“你别胡猜了，不过你下去再打听打听，来的人是哪一部分的，领导人叫什么名字？”第二天，他上山来告诉我，来人是沂水县大队的，还有个王司令员的警卫员，因为找不到司令员的爱人急的直哭，听说他们明天就要走了。我听了以后，非常兴奋，但情绪上又不敢显露出来。就让他前面带路，我跟着下山。当他进村时，我躲在村外一个破草房子内，手里握着枪，随时准备应付意外情况。不一会儿，那个放羊孩子领着几个人来了，走近一看，那个穿长袍的就是我早认识的李冠智同志，还有警卫员张秀成同志等。见了这些久别的亲人，我扑了过去。大家见我这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样子，都哭了。我宽慰同志们说：“我这不是活的很好嘛！”李冠智同志看到我腿上的伤势很重，就忙派人找来个椅子，绑上杆子，把我抬回了部队。

清代学者许瀚（下）

[台湾]丁原基

光绪元年杨氏丞青阁刻本《攀古小庐文》

清江刻书　海丰校书

道光二十六年（1846），许瀚应南河总督潘锡恩邀请，在清江浦主持增订《史籍考》之事。有关章学诚纂修《史籍考》之缘起、经过，此不赘述，仅述许瀚居清江浦之经历。

许瀚与潘氏本系旧识，道光十五年（1835）潘氏任顺天学政，许瀚中顺天乡试举人，即随潘氏于保定、大名等各地校文。潘氏自著《学诗绪余》稿本，并属许氏校订续补，此番复邀请许瀚肩负增订《史籍考》全责，足证许瀚之学养深邃，深得潘氏信赖。

清江浦，今江苏省清江市，为南北水陆交通水枢纽。清中叶，沿运河设北、东、南三河道总督，为财源丰沛之衙署；南河道总督驻清江浦，故此地街市繁华，盛极一时。彼时先后幕游清江者有丁晏、许木连、杨铎、鲁一同、包慎言、刘毓崧等，旧朋重逢，踪迹甚密；又与高均儒、顾沅、李佐贤、杨亮、

罗士琳结识，时相交往。因清江地处要津，凡由江南进京，必过此浦，许瀚居此，得与老友相会，略尽东道意。如杭州至交六舟上人达受，于二十六年（1846）五月与次年三月，因往返京师，道经清江浦，二人相聚而互示所藏，喜不自胜。许瀚《跋六舟手拓彝器全图》云："陆友仁《研北杂志》云：京师人家有《绍兴稽古录》二十册，盖当时所藏三代古器，各图其物，以五采饰之。又模其款识而考订之，如《博古图》而加详。余每口其文辄神往（按：口字原缺），恨不与同时手披而目览之也。丙午之夏，六舟上人过浦，示余手拓彝器全形款识种种，精巧出人意表，如人意中皆就原器拓出，不爽豪发，觉采色模饰之图，又不足系余怀矣。"。文中言及"丙午之夏"，即道光二十六年也。

许瀚总纂《史籍考》之增订，乃撰《拟史籍考校例》。对章学诚之原稿繁冗、重复漏略、舛误之处，均有订正。书成，潘骏文（潘锡恩子）云是书"补录存佚之书，视原稿增四之一，详审顿觉改观"，知许瀚不负众望，圆满以成。

许瀚居清江浦，并时进行之事，即刻桂馥《说文义证》，此次系山西杨尚文出资。因纂订《史籍考》，事难兼顾，遂请薛寿、田普实二人分校，待潘锡恩告病回籍，收还《史籍考》不办，方得亲负刻书之责，始发现薛、田校本错谬难忍，乃抱病独校桂书。

道光二十八年（1848）冬，许瀚返日照。次年正月十七，致和公八十寿辰。张穆撰《日照许肃斋先生寿序》，何绍基书之。鲁一同撰《许肃斋先生八十寿序》。许瀚将多年奔波余资，略置产业，拟效前贤归养老父，以娱朝夕。张穆《寿序》云："窃尝羡叹先生家庭之乐，前惟潜邱之事饮牛叟近之，然阎氏世席厚赀，而先生家无儋石则难能也。江郑堂覃思高密，以父母宋五子书，别辑《宋学渊源录》，亦与先生乔梓为近。然江父兼好佛理，而先生壹意儒书则粹过江氏远矣。康成自称年过四十乃归供养，假田播殖，以娱朝夕。印林五六年来不上公车，假馆必于邻壤。近复买龙湫之左，种松万本，结茅其中，奉春秋杖履吟眺，其诸真郑君之徒也。"此后许瀚因父病缠绵，遂不再远行。

咸丰元年（1851）八月，许瀚膺选授山东滕县训导。次年十月中旬只身抵滕县。冷斋颓敝，几案俱空，冬寒，致不能作书。曾撰七绝四首，其一云："岁暮天寒冰雪深，围炉尚觉气阴森。缘何几砚春先到，一卷唐风次第吟。"其二云："击节中秋对月篇，三朝阅历更谁先。即今瓜代垂残腊，又过咸丰第二年。"其三云："不求奇诡不深艰，抒写真情意态闲。流水行云化糟粕，大都风味似香山。"其四云："酒地诗天笔有神，安排丽句赏芳春。宦囊如此非萧索，锦绣珠玑富有新。"诗中叙及之凄凉景象，在《与王菉友书》中，更可窥其端倪："弟自前岁八月选滕县训导，至此一年，催提考验，至再至三。仓惶收拾赴省，以十月半到任。家父年八十四，数年来动履须人，不能迎养。只身于滕，作速退计。念今春试院，稍得薪水资，即归去。乃学宪考至沂郡，闻江宁杨镇失守，顿生变计，草草出进十余日，遁东府去矣。而弟正月下旬湿痰旧症发作，清明转剧。脱有院试，亦不能送。调理两月有余，总未霍然。今已告退，定望后旋理。抽筋拔髓，口口赤手空拳而去，甚可笑也。"（按：口字原缺）行句之间充斥贫穷需财，然造化弄人，亦无可奈何之情。

咸丰三年（1853）四月，返日照，大病。至八月下旬始稍瘥，抱病为丁艮善跋《唐仁恺碑》，有云："养疴兀坐，假希遇之品，聊用破寂。开卷低徊，疑难斯见；检书核对，牴牾滋多。缘隙而求，不能自罢；勉为卒业，疾乃顿兴。不审此事何补性命，而皇皇若是，殊自笑已。"返里后自况如此。又撰《竹杖铭》三首，其一云："余未宜杖，而遽须杖。天闵余病，俾君余相。危持颠扶，余惟君仗。虚心劲节，千古同尚。哀今之人，胡不如君。"其二云："我仗尔扶持，尔仗我携持。我不携尔，尔亦拳曲之。竹杖弃捐中野当谁知。尔其戒哉。黾勉我扶，毋怠哉！"其三云："蟠其根，直其节。寒不畏霜，炎不避日。厥中空空，终始如一。跬步与偕，弼我堂室。嗟彼弱藤，动辄摧折。选贤任能，古曰明哲。"

咸丰四年（1854），致和公卒，年八十四。许瀚撰《家祭文》，呜咽感人，拳拳以努力家业为志，盖此际因刻桂馥《说文义证》，负债累累之故也。其文云："呜呼！吾父舍不

孝而长逝，今四十有五日矣。”卜于明日奉柩，诣黄山前吾祖父母墓右，与吾母成孺人、孙孺人合葬。……曩吾父病少间，语不孝曰：‘吾父子相亲之日，可云绵长’，而今何如耶？吾父寿八十有五，五子十孙，一曾孙，人皆称为全福；……而自不孝历数之，则毕生在忧患中，未尝稍即安乐也。……不孝奔走四方，南客瓯越，北历幽燕，司讲渔山，校书淮浦，远或一二千里，近亦五六百里；或岁一再归省，或数岁一归省，晨昏滋疏矣。乙未（1835）叨乡荐，甲辰（1844）挑二等，例补学官，前岁始铨滕邑；而吾父病已三载，不能迎养，又值时艰，忧郁成疾，急解组归，禄养不遂，冀菽水，奉朝夕，依依膝下，庶亦稍竭乌私；而孰意归而病久不愈，定省多缺，今夏始渐瘥。至七月而吾父辄增病，病而愈，至九月而又病，而遂至不起耶。……吾父病亟时，频呼幼妹抚摩之，若甚牵挂者。不孝瀚以为言，则云吾绝费牵挂。旋又呼之，又抚摩之，则是终不能无牵挂。既而舌强语蹇，犹谆谆训不孝多端，曰小心谨慎，曰行己有耻，曰不可妄想，曰择友全交，曰孝弟友田，曰择子弟之才稍可造者，竭力成之，曰汝二叔祖不可忘。至所以安置吾庶母者，则初病时已言之。不孝年已就衰，近又多病，能终吾父之志否不可知，然一息尚存，必率诸弟努力为之，吾父其毋过念。……杏黄山前吾祖父母在焉，吾两母在焉。其果聚处如生人乎？则不孝等环侍膝下容有日也。”

居丧期间，为表弟田子郊撰《千字文音汇序》；校海源阁刊本《蔡中郎集》；为丁楙五审定《说文解字韵隶》等。

咸丰五年（1855）八月，应浙江学政吴式芬邀请，赴杭州，随署校文。此时生活拮据至极，乃先过沂州，向丁守存借付川资，方得至杭州。旧地重游，人事多变，暇时仍与达受游。未几，吴式芬因病引退。次年，自杭州返山东，居沂州，助吴式芬编《捃古录金文》，致力于金文考释。十月，吴式芬卒，年六十一。

咸丰七年（1857）正月，式芬次子重熹至沂州，亲邀校订其父遗书。重熹为许瀚及门弟子，乃陪瀚过济南，登千佛山后黄石崖，观魏造像。四月，抵海丰，校遗书，计有《捃古录金文》《陶嘉书屋钟鼎彝器款识目录》《捃古录》《金石汇目分编》等。本年，高均儒据所存许瀚手稿，在清江浦汇刻一册，延丁晏作序，名《攀古小庐文》，此为许氏述作中最先刊行者。次年正月，病偏瘫，回日照，自述云：“弟初病极危，转侧饮食，非人不治。赖贤主人派八人环侍，夜不息烛者月馀，自分旦夕间人，不意能生还也。及舍弟暨小儿得信往视，东君为制卧舆，廿人舁之，行半月抵舍，竟得不死，费百余金。”自此以后，许瀚常居日照矣。

病废家居　抑郁而终

许瀚于咸丰八年（1858）正月因中风而患左偏瘫症，由海丰舁卧舆归日照。至中秋前后，于室中需有扶持方能勉强移步。

一年后，犹能执笔作书。愿得其书法者甚众，书得长短二百余幅，尽售之，得金百数十千，以资日用。十年（1860），《攀古小庐文》版在清江浦因捻军劫掠而毁。是年，困于家计，亲友忩恿主讲日照奎峰书院，课余仍力疾校吴式芬《捃古录》、《金石汇目分编》等书；年底《捃古录》校毕。

十一年（1861）十月，捻军越日照县境，邻众舁许瀚登山避难。家中藏书及桂馥《说文解字义证》板片，皆毁于兵火。所携吴式芬遗书底本散弃崖谷间，经多方访购，历年余，始尽得之。日照家乡经贼军蹂躏，焚掠一空，乃暂移安东卫，寄姻亲苏翰亭闲宅居之，未几，苏氏卒，子弟析居。同治元年（1862）九月，“独与老妻归。家徒四壁，乃支一瓮一釜于其中，与老妻日两炊焉”。冬，得赣榆县令隋汝龄书，转高均儒自淮所赠金，藉以度日。岁暮，贼军又至，先乘车诣龙潭山林舍暂避；时丁艮善在县北磴山筑寨，力劝上山，暂免于难。次年三月，下山，居家。得丁晏自淮安来函，作书答之。又作《与秀水高伯平书》，谢

其馈赠。（按：《攀古小庐文补遗》收有许瀚与高均儒书札三通，其中《与秀水高伯平书》虽未注明年月，唯书札中有“弟病废以六载，桂版毁已三载”语，知为同治三年（1864）所写，书中述自舆归日照家乡后六年的生活状况，修理甚贯，许瀚晚岁景遇，尽得考见，足称实录。兹不嫌冗赘，摘录于后。）

《与秀水高伯平书》，略云：“比初病，极危。……既抵舍，延医疗治、汤者、丸者、膏者、酒者、熨者、薰者、蒸者、洗者、鍼者、灸者、推拿按摩者，络绎细口，百方历试，迄无一效，又费百余金，而囊中罄矣。是时已能离床自坐，伏案自立试执笔则犹能作书，敝乡多欲得弟书，既病则大失所望，今闻半边人犹能书，诧以口口，愿得者益众。乃裒辑前后集《争坐帖》字成联者，长短二百余幅，益以新作，择其可用者而尽书之，而尽售之，竟得百数十千，颇资朝夕。

何子贞在济南主讲泺阳书院，言之各大宪口口口，又代销《说文》得数十金相寄，以是日用不绝。敝邑亲友悯弟病无以养，请口口口，使主讲本邑书院。庚申（1860）春，乃挈眷赴馆卧理，一载束脩所入足供领口，每月阅卷四次，余无事。念苾翁书校未竣，乃走书取来，课余力疾校之，顾人抄写，秋未解馆，余廿余页，携如舍复校之，命小儿抄写，颇自适，而逆匪抵赣榆矣。

于时敝邑方办团练，人心踊跃，纠众于邑南，杜集不下万人，颇有声势，距舍仅二十五里，炮声隆隆满耳。弟校书弗辍，小儿于料理乡勇之暇，仍据案钞写，书竟告竣，而匪徒卒未敢入境，安稳度岁，以是知杜御之不徒也。

辛酉（1861）二月，贼又至，不由前道，掠西境而退。五月又至，又掠西境而退，八月乃大至由西境入，转而北，长驱入登莱，及其归，又穿东境，越敝邑而南，往返蹂躏，其何以堪！有舍表侄李涛善侍弟疾，朝夕相从，不离左右。八月初，闻贼至，相率入山。已旬日，忽欲归取食物，弟阻之不能。十一日早，未及出而贼已入，杀之庭中。已而贼渐逼山，邻众急舁弟登山，露坐通宵，乘高望各处火光不绝，比晓，弟山下所居室亦焚矣。贼退，小儿下山视之，室中物俱为灰烬，独苾翁书散弃崖谷间，收而裹之。弟旋亦下山，闻贼未果退，尚在邻近屯庄，不能遽归，乃别移山麓暂住。检点苾翁书尚少数册，送磴山寨，交丁少山收存。少山谓贼焉须此，此必遗崖谷间，避难者拾去耳。多方访购，历年余，果尽得之。惟分编中少陕西一册，似其家仍有副本，无甚关紧要也。兄於苾翁有知己之感，故以相闻。

安东卫苏氏，弟姻家也。卫城新修，姻伯翰亭封翁知弟庭中杀人，在山又几为贼所窘，抬之入城，乃往假闲宅居之。十月，闻贼复至舍下，极遭焚掠，桂板及藏书皆毁。弟居城中，未受惊恐，事过始收拾残剩，尽移于卫，惨目伤心，不可言状。荏苒岁余，虽风鹤时闻，究无实事，意从此稍安矣。

去秋，翰亭姻伯去世，敝亲家兄弟皆析居，弟恐居住不便，又自念敝庐久旷，必就颓废，乃甚不自安。因与老妻谋归去，留小儿夫妇守残剩，并使小儿就彼学贸易，冀取刀锥以资养膳，独与老妻旋舍。既至，则室徒四壁立，门窗多毁损，惟弟素所居屋，门户尚完。乃支一瓮一釜于其中，与老妻日两炊焉。倏忽三月岁行尽矣，觉卧先人敝庐中，与寄人庑迥殊，辄取《争坐帖》十字，为门联云：‘还来守故业，且喜得安居。’未及书写，腊廿二日夜分，警报忽至，云贼鼠聚莒东南境山中，时出劫掠，马首骎骎欲东，距舍仅六七十里，比明，逃徙者纷纷矣。小儿在卫，以小车来逆，弟不欲回卫，兼虑道远遇变，乃乘车诣龙潭山林舍，老妻扶杖徒以从，至，则邻近来避者已众，夜萃数十人于一室，坐以待旦，不能假寐。自欢转自笑，只好改前集对语‘且喜’二字为‘犹不’矣。此地即弟曩与张石洲诗所云‘龙湫烟树里’也。其北大山曰磴山，为敝邑名胜，前贤多题咏。丁少山避兵于此，诘朝来视，力劝宜上山，从之，坐大竹篮中，十余人舁之，山径斗险，虽非扪参历井，亦略得其彷佛。既登，大海苍茫忽来眼底，信奇观。阅其寨，石垣环山余里在翠微间，抬枪大炮地雷之属，森置隘口，庐舍云连，宛然绝大屯，聚入其中，相遇多至亲好友，向日愿见而不能即见

者毕集于此。室中床几釜皆便，优哉游哉，以卒岁矣。又集《争坐帖》八字为联云‘升高自下，出危就安’。

逾岁，闻寇氛仍未靖，久据他人屋非计也。少山为择地，伐龙湫木，自构屋一所移居焉。屋虽卑狭，地实高放，隐几可以看山，伏枕可以望海。未几春暖，山草山花山蔬迸生，色可观，香可闻，味美可茹，居而安之，不思归矣。然此特所以备有事，岂容无事之秋，贪此清福。田园荒芜复将奚恃。今下山已月余，但祝能不再上山乃真福也。噫，一别十年，近又多故，如此作书，岂有了时，请从此已然。”

《又与伯平书（二）》略云：“今下山里居已五阅月，风鹤无惊。病躯似较往年为差胜，而瘫痪如故，无能为也。书籍亡失殆尽，无可消遣。舍六弟忽于贼退后，在马矢马溺中得杜诗二种：一钱牧斋《笺注》；一吴东岩先生选评，名《杜诗提要》，幸皆无损污。病榻无聊。日唯翻阅二书，数月来能背诵者近二百首，乃默书于册，尚未及半，借此遣日，似胜左思右想，徒滋扰乱也。数遇疑难无从质问，益令人思良友不置。今别纸录一事就正，他日遇便明示。幸甚！幸甚！”

书札中详述捻军数扰照邑，藏书尽毁；已身病废家居，唯读杜诗以遣日，苦中作乐而已。

同治三年（1864），许瀚年六十八。前一年曾大病不起，至岁暮始勉强起坐，收汪尧辰赠银十五六两，因岁底费用繁多，随手用去。知其晚景困于财贿，寒伧至极。《与杨石卿》书末云：“兵火后，文房所须十不一存，信笺间得一两篇，不相联属，不足以罄所欲言。此纸乃糊窗物，弟爱其幅广，可资剌剌不休，想知已不诧也。”此书及《又与伯平书（二）》，皆许瀚晚年之作，自后未见其片语只字。同治五年（1866），抑郁而卒，终年七十。

同治十一年（1872），入祀乡贤祠。许瀚著述，除咸丰七年（1857）高均儒刊行之《攀古小庐文》，其余从未比理。杨铎乃搜辑遗稿，于光绪元年（1875）刊行，名《攀古小庐杂著》。又，许瀚生前嘱遗稿交陈介祺，后由吴重喜延丁艮善校定，光绪间刊板，名《攀古小庐文补遗》（十二卷，四册），全书未及刻竣，印本无多，版旋焚毁。其他批校书册，单篇零稿，金石跋尾，多归丁、吴两家，后散佚特甚。

民国十八年（1929），同邑王献唐先生掌山东省立图书馆，锐意收罗乡邦文献，尤用心访求许瀚著述、遗稿、日记，所收今藏山东省博物馆。1985年济南齐鲁书社刊行《攀古小庐全集》，拟分三册，惟仅刊行上册即中止。则‘山左许瀚之学’，其著述之刊刻，以及对其学术成就之研究，正有待之也。

红衣脱尽芳心苦

——记钱勤来老师

高　雷

叫一声老师，是一场缘分。接到钱老师短信：“高雷你真混，有病也不告诉，在临一月，竟无从聚首，歉甚！好后即望告知。”南望淞沪，感慨万千，老师执教五十春秋，耳提面命我辈七载有余，忧国忘己，呕心沥血。不求闻达于当世，一片冰心待后生，其言其行，可歌可泣，雍容大雅，无以言表，我点开民族管弦乐《明月千里寄相思》，敲打着电脑，寻觅着求学的足迹，记录下心灵的游历。

钱老师相貌平平，语不惊人死不休。初入师门，走进课堂时，他已经站在了黑板旁边，只记得他穿了一领中式罩衣，声音嘶哑，后来才知道那是抽烟和熬夜造成的。上课后，他用手指指着自己的鼻子介绍说：“好多同学都认识我，老钱。”然后在黑板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钱勤来。记忆深刻的是他用左手写字，他蹩脚的普通话夹杂着吴音软语，音调动听，词语茫然，需要慢慢地适应。初次接触，他宣讲自己的教学理念：“你们都是共产党的干部，都可以发号施令，啊！但你们如果没有文化，就是土八路。某某某是大骗子，你们都是小骗子。”他用大拇指指着自己的鼻子尖继续说：“我也是一个骗子。老人家说：我党真懂马列的并不多。我也不懂马列，我给你们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驴唇不对马嘴，真正的文艺理论不是舶来品，是你们临沂的土特产。刘勰，大家知不知道？啊！知道。《文心雕龙》看过没有？都没有？！”他带着一丝失望，猛地转身，用左手握住粉笔，敲打在黑板上，咚咚作响，挥洒而就，写下了：刘勰《文心雕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后抑扬顿挫吟咏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品味钱老师，你只有永无休止的学习，才能够读懂他的内心世界。他的天

钱勤来（1941—），男，汉族，上海市奉贤区人，临沂大学教授，作家。

1964年7月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同年8月分配至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1965年8月后游历于临沂师范等多所学校教书；文革结束后调至临沂教育学院工作，担任中文系主任，临沂教育学院并入临沂大学后，钱老师出任教授至今。曾为政协第八届山东省委员会委员。主要著述有《文学审美与批评》《太平广记选》（合著）、《红楼梦辞典》（合著）等，主编有《写作知识辞典》《美学新论》《文学概论教程》《外国文学简史》《外国文学作品选评》等等。本篇选自钱勤来文集《我有左手》。

资，他的经历，尤其是他的阅历均非常人之所能，其功力深厚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看问题一针见血，回味无穷。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给我们讲述文学的阶级性、党性时，就可以站在学术的前沿，明确地阐述文学特性是人性，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共产主义就是完全的人道主义。当时这样讲是有风险的，但他旁若无人，引经据典，使我们重新认识了马克思，有些观点前所未闻，振聋发聩。他在黑板上罗列的马克思名篇之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当时刚刚出版。古人云：师者“传道、授业、解惑。”钱老师无愧普罗米修斯的传人，他传递的是文明的薪火。而共和国从禁言人性到现在的以人为本，我们在理论的迷宫里足足摸索了二十余年。今天，有着几千万马克思主义信徒的中国，有谁真正读过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钱老师授课，来者不拒，多多益善。八十年代初期，他除了要完成教育学院布置的任务，还带了六个电大班的课程，每到期末考试，由于声望，连周围县市的电大老师和有条件的学生都前来蹭课，听他辅导的人，挤爆了课堂，填满了会堂，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甚至连讲台上都有盘腿而坐的学生。每次进门他都是迈着轻快的步伐，直奔讲台，将背包放在脚下，掏出他那劣质廉价的香烟点着，用拇指和食指捏住，贪婪地一口接一口地吞噬，两到三支后，他会用力将烟蒂掐灭，高声预警：“拿出课本，打开目录”，开始了他的辅导，他喜欢提纲挈领式地梳理教材，用试题形式分解篇章，突出重点，旁征博引，在互动中增强学生记忆。

讲到文学体裁诗歌，他会绘声绘色地吟咏一段：“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有的人，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然后话锋一转，询问到：“这是什么体裁？诗歌。你们山东老乡臧克家先生的诗歌——《有的人》。它概括了诗歌的三要素：一二三……。”简洁、明快是他教学的特点。

讲到报告文学，他在黑板上写下了：徐迟《哥德巴赫猜想》，刘宾雁《艰难的起飞》。用高亢激越的声音背诵出了：“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钱老师讲课饱含着丰富的感情，很容易进入角色，一旦出神入化，他手中的香烟与粉笔就变换了位置，以至于脸上粘满了粉笔沫子，有些细心的同学予以暗示，他便指着自己的鼻子：“啊！我，老钱，傻呼呼的。”发出会意而率真的笑声，惹得全班哄堂大笑。

这是一个充满朝气与活力的智者，他的朝气与活力不仅表现在炯炯有神的眼睛之中，更表现在他身上背包里，那里面装满了不断更新的书籍，始终有七八本之多，有买的，有借的，有赠的……。咀嚼智慧的人充满着无穷的力量。钱老师包中的书，只要“产权”属于他的，都是可以外借的，同学们大受裨益。记得一次，我从他的包里翻出一本新书，要求借阅，他爽快答应了并特别嘱咐：“把重点内容、语句给我划出来。”这种出借方式新鲜得很，我谨慎地问：“用铅笔？”“什么笔都可以，我来不及通读了，下个学期用。”对书他有着自己认识与把握的方式，他是教育家，不是收藏家，注重的是书的内在品位而不是书的收藏价值，他以实用主义的观点，走捷径，与时间赛跑，不失为一种精明，否则，你搞不懂他的知识体系是如何丰富和升级换代的。

钱老师给我们主讲《文学理论》和《外国文学》，也业余辅导过《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写作》等课程，他的热情始终饱和沸腾着，这不是他的性格张扬所致，而是他本身具备那种“达则兼济天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许是年龄距离的接近，他尤其呵护我们这群被“文革”荒废而失落的一代。为了我们的考试复习，他可以和同学们一起背着挎包从临沂到济南，从济南到北京，寻师访友，登门求教，对中国的学历教育他也无奈得很。“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七年之中，我们学习的每一步阶梯，都倾注了钱老师的心血，至于钱老师的教学效果如何，不看广告看疗效，本人受业七年，考试一不小心就是90分以上，最高考过98.5分，记住，这可是全国第一期电大文科班、全国第一批自学（汉语言文学）考试，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钱勤来（右）与
老友张铁民

艺术的崇高在于它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也是钱老师毕生的追求，钱老师为我们开启了艺术殿堂的方便之门，带领我们匍匐在维纳斯的脚下，教育我们用真、善、美感受事物及其环境，是老师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我们的人生的轨迹。我至今记得他老人家讲述莎士比亚的情景，他先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战胜神权思想，讲到了莎士比亚的贡献，比较了莎士比亚与同期作家的优势互补，讲到了莎士比亚对中国的影响，讲到了朱生豪与梁实秋的译本的优劣，通过哈姆莱特的艺术形象向我们展示了人类对自由的追求和人与理想的悲剧冲突，其清新之气扑面而来，悲壮情节震撼心灵。钱老师崇拜的还有巴尔扎克，当提及巴尔扎克著作的译者傅雷之时，钱老师感情外露，表情呆板地说：“他死了。”两眼直楞楞地向房顶远方望去。

某年夏季，中国被泪水淹了，钱老师桃李遍天下，不乏中国的高官，更有外国的达人，没有歹徒，却有“嫌疑”。老师舔犊情深，波澜不惊，默默地将个别特殊学生的孩子接到家中，供给吃住，联系上学，担负起父母的责任。表现了他特立独行的魏晋风骨和在烈火中永生的古希腊悲剧精神。

我们毕业了，“我轻松愉快地走上大路，我健康，我自由，整个世界展开在我的面前，漫长的黄土道路可引导我想去的地方。（惠特曼）”虽然是陈年老窖，味醇酒香，但与老师面对面求教的机会达到了珍稀程度，屈指可数。每年师生聚会，我都会被老师喊到跟前，询问一番，他不问前程，不问利禄，不问家庭，而是问你最近在做什么。一切未知领域他都饶有兴趣。而对他自己的成就从不炫耀，有一次，我们对老师荣升中文系主任表示祝贺，他却不以为然，淡淡地说：“老虎不在家，猴子称大王。”当问及教育学院，他那愤世嫉俗，直言不讳的性格又溢于言表，“教育是国家富强的必由之路，教育学院培养的是老师，高校录取却是最后一批，啊，不可理喻。”

大人物属于历史，小人物属于文学。钱老师经常调侃：“我们都是灰色卑琐的小人物。”实际上带着镣铐跳舞的他游离两者之间，既属于历史，也属于文学，无愧于辉煌的地域坐标。他老人家从23岁支援沂蒙山区，到退休离郡，重返沪上，在临沂从事教育事业40年，坚守自我，激浊扬清，以卞和识玉而闻名，因欧冶铸剑而自豪。数不清的学子成就了他的事业。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来临沂无关风月，并非己愿，而是组织下放，属于歪打正着，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钱老师1964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分配到山东师范学院任教，后被美其名曰“下放”到临沂师范学校。钱老师自己说：“到临沂来的唯一理由是能够吃上大米。”他的根在上海，他的感情，他的事业留在了临沂，“断无蜂蝶慕幽香，红衣脱尽芳心苦。（贺铸）”

聚散皆是缘，离合总关情。老师希望学生展翅高飞，普济苍生，学生亦祝福老师涛声依旧，健康长寿。在这里，叫一声老师，道一声珍重！

助刘裕成大事业的刘穆之

眭达明

刘穆之（公元360年－417年），字道和，小字道民，东莞郡莒县人，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东晋末年大臣，汉高祖刘邦庶长子齐悼惠王刘肥之后。官至尚书左仆射。刘穆之深受刘裕倚仗，更屡次在刘裕领兵在外时留守建康，并且总掌朝廷内外事务。死后追赠侍中、司徒、南昌县侯。南朝宋受禅追封为南康郡公，谥号文宣。

根本无托，决意东还

晋安帝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八月，刘裕率军北伐，攻打后秦。这次北伐十分顺利，只一年时间，汉魏以来的名都——洛阳和长安，都被东晋打下了。后秦主姚弘，被俘后送到了建康（今南京市）。自公元316年匈奴人刘曜攻陷长安以来，关中人民盼望汉家军队的旌旗，已经100余年了。收复洛阳和长安后，刘裕本可乘胜前进，平定陇右，恢复晋朝疆域。可是在此大好形势下，他却下令停止北伐，留下12岁的儿子刘义真为安西将军，镇守长安，自己匆匆返回建康。对刘裕这种虎头蛇尾的举动，三秦父老十分失望和不解，纷纷责问他“舍此欲何之乎”。有人说刘裕“狼狈而还者，欲速成篡事耳，无暇有意于中原”。就是说刘裕之所以宁愿功亏一篑而匆匆南归，是他对夺取东晋皇帝宝座已是急不可耐了。这种说法当然有其道理。但要知道，刘裕回到建康以后，并没有马上黄袍加身做皇帝，他真正篡晋自立，是在元熙二年（公元420年）的六月，那是将近三年之后的事情了。既然如此，刘裕匆匆南归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辛未，刘穆之卒，太尉裕闻之，惊恸哀惋者累日。始，裕欲留长安经略西北，而诸将佐皆久役思归，多不欲

留。会穆之卒，裕以根本无托，遂决意东还。”从这段话里，我们知道，刘裕当初是打算留在长安，继续征服西北的，后来突然改变主意，原因有二：一是东晋的各位将领因长期征战在外，思念故土，大多数不愿再留；二是留守建康的刘穆之在这年的十一月初三病死，鉴于朝中没有可以托付大事的人，刘裕怕有人会趁机夺权，才急忙赶回建康。《资治通鉴》的这段记载，显然更合情合理，也更符合事实，因而是可信的。

好人散去，国家遭殃

刘穆之是什么人？他的死不但影响了东晋这次北伐的进程，而且改变了一段历史的写法，这个被刘裕寄予心腹之任的刘穆之，肯定不是平常之人。

事实的确如此。刘穆之当时的身份虽然是左仆射、前将军、丹阳尹并领监军、中军二府军司，但他的真正身份其实只是刘裕的心腹秘书而已。刘裕西征北伐，都让刘穆之留守京城，以免后院起火。刘穆之死后，刘裕犹如失去了依靠和主心骨，常常叹息着说：“刘穆之如果不死，一定能帮助我治理天下。真可谓是‘好人散去，国家遭殃！’”又说：“刘穆之死后，别人从此都会轻视我！”由此可知刘穆之在刘裕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高，他对刘穆之寄予的希望有多大。

刘穆之担任刘裕的秘书，说来也是很偶然的。

元兴三年（公元404年）二月，北府兵将领刘裕以游猎为幌子，与何无忌等收集部众，联合了魏咏之、檀道济、周道民等27人率众起兵，讨伐桓玄。初克建康后，刘裕对何无忌说：“现在急需一个主簿的人选，你看怎么能得到？”何无忌说：“没有比刘道民更合适的。”（刘道民是刘穆之的别名）。刘裕说：“我也认识他。”便马上派信使骑快马去请他来任职。刘穆之曾任琅邪府主簿，此时赋闲在家。这天，他听到京口方向人声鼎沸，于是一大早就起来，到路边打听张望，正好和前来的信使相遇。在此之前，刘穆之曾做过一个梦，在梦中，他和刘裕在大海中泛舟，忽遇大风，眼看大船就要倾覆，却见船的左右有两条白龙护卫着。不久航行到一座山前，此山山峰耸翠，林木茂密，刘穆之十分高兴。现在，刘穆之接过信，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他两眼直视前方，一句话也不说，呆立了很长时间之后，才返身回家，把一件布衣服撕破，改作裤子，跟信使一道去见刘裕。刘裕说：“我们刚刚举起大旗，发动这场符合道义的事变，一切从头开始，困难很多，非常急迫地需要一个在军队中负责文秘工作的人才，你说谁最适合做这种工作？”刘穆之说；“您的军府刚开始建立，所用的文官必须具有真才实学才行，在这种紧张仓促的情况之下，恐怕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了。”刘裕高兴地说；“你能屈尊亲自担当这个职务，我们的事业一定能够成功。”于是当即任命刘穆之为主簿。

就是这么一对原来并无深知深交的人，一旦走到一起，却像前辈子有缘似的，很快就建立起了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刘裕初入建康时，对那些重大事情的处理和安排，全部交给刘穆之，使那些仓促间应办的公务马上办理完毕，没有不恰到好处的。刘裕于是把他当作自己的心腹，大小事情全都询问他的意见。刘穆之也是竭尽忠诚、极力筹措，没有任何遗漏和保留。当时晋朝的政令宽泛废弛，纲法纪律都没有建立起来，豪门大族凌傲放纵，普通百姓却异常贫困穷苦。桓玄篡权后，接下来的是东晋朝廷留下来的烂摊子，桓玄虽然曾经打算进行整顿，却因各种规章的分类条目过于繁琐细密，百姓无所适从。刘穆之仔细研究了当时的情况，按照轻重缓急进行清理矫正。刘裕也能以身作则，以威行严法进行管束，使朝廷内外的文武百官都能小心谨慎地奉行职守，不满十天，官风民俗顿时大为改观。总之，在刘穆之的操持下，百废俱兴，朝廷内外很快出现了少有的振兴气象，这一切更使刘裕众望所归。

刘穆之确实是一个非常能干之人。他在内总管府中事务，在外供应军旅的给养，遇事当机立断，处理问题快如流水，一切事情没有堆积迟滞的。各方宾客从四面八方集中到他这

里，各种请求诉讼千头万绪，内内外外，咨询禀报，各种材料堆满了办公室。刘穆之竟然能够眼睛看着文件内容，手写答复信件，耳朵听属下的汇报，嘴里当场答复，他同时进行这四种工作，互相之间又不混淆错乱，一切应酬自如，全都处理得当。他又喜欢宾客来往，说笑谈天，从早到晚，毫无倦意。偶有闲暇时间，他便亲自抄书，参阅古籍，校订错误。

赤胆忠心，毫无保留

作为刘裕的秘书和心腹，刘穆之对刘裕可以说赤胆忠心，毫无保留。东晋在江南立国，以建康为京都，以荆（州）、扬（州）为根本。刘裕赶跑桓玄，立了大功。桓玄的司徒王谧与众人商议，准备推举刘裕统辖扬州。刘裕刚起事，不想太张扬，坚决辞谢，于是任命王谧为扬州刺史。晋安帝义熙三年（公元407年）十二月王谧去世，刘毅等人不希望刘裕进入朝中辅佐政事，因而商议任命中领军谢混为扬州刺史，也有人打算让刘裕在丹徒兼管扬州，而把朝中的政务交给孟昶管理。朝廷特意派尚书右丞皮沈带着这两个方案，前去征求刘裕的意见。皮沈首先拜见了刘穆之，把朝廷讨论的情形全部告诉了他。刘穆之假装起身上厕所，秘密地写了一张条子给刘裕：“皮沈说的话，千万不要同意。”刘裕召见皮沈后，暂时先让他出去，又把刘穆之叫进去询问。刘穆之说：“晋朝对朝政失去控制，时间已经很久了，现在上天的福命已经转移。您兴复皇家的事业，功高德勋，地位重要，在今天的形势之下，怎么还能一味谦让，而永远去做一个老守藩地的地方将领呢？刘毅、孟昶几个人，与您都是从普通百姓开始起家的，当年一起倡导大义，争取富贵。但举事的时候，有先有后，所以推举您做了盟主，但他们并不是诚心诚意服从您的。所以，当他们的力量和您相当，地位也差不多的时候，终究是要互相吞并和排挤的。扬州是可以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根本所在，决不可以再把它拱手让给别人。上一次把它交给王谧，不过是处理事情的权宜之计，这次如果再把它交给别人，可就要受到别人的制约。权柄一旦丧失，再想得到，便没有理由和机会了，那样一来，将来的危险，实在无法想象。现在朝廷这样商议，您理应表明一下态度，作出回答。但是如果说只有我自己合适，又未免难于启齿，所以只有这样说：‘中央地区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所在，辅佐君王的宰相一级官员，地位非常重要。选定这样的官员既然如此重大，便决不可以在外地随便发几声空议论敷衍，最近我打算抽时间前往京都，再与你们一起充分地交换意见。’您到了都城，他们一定不敢越过您再把这官职交给别的人。”刘裕听从了他的话。朝廷于是征召刘裕任侍中、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录尚书事，他原来的徐、兖二州刺史的职务仍然兼任。

刘穆之对刘裕推心置腹，不但在大事上当参谋、出主意，而且把自己听到和看到的一切都如实向刘裕汇报，史称“穆之外所闻见，莫不大小必白，虽复闾里言谑，途陌细事，皆一二以闻。高祖每得民间委密消息以示聪明，皆由穆之也。”刘穆之“又爱好宾游，坐客恒满，布耳目以为视听，故朝野同异，穆之莫不必知。虽复亲昵短长，皆陈奏无隐”。也就是通过和宾客来往谈天说笑中了解情况，打听消息，并且有意布下耳目，探访民意，然后告诉刘裕，以便他及时掌握新情况和新动态。对刘穆之的这种不是很光明正大的做法，有人很看不惯，对此刘穆之非常清楚，他不以为然地说：“以公之明，将来会自闻达。我蒙公恩，义无隐讳。”刘裕对刘穆之自然越加信任。和刘裕一道起兵的刘毅想离间刘裕和刘穆之的关系，经常对刘裕说刘穆之权太重，刘裕反而越加信任刘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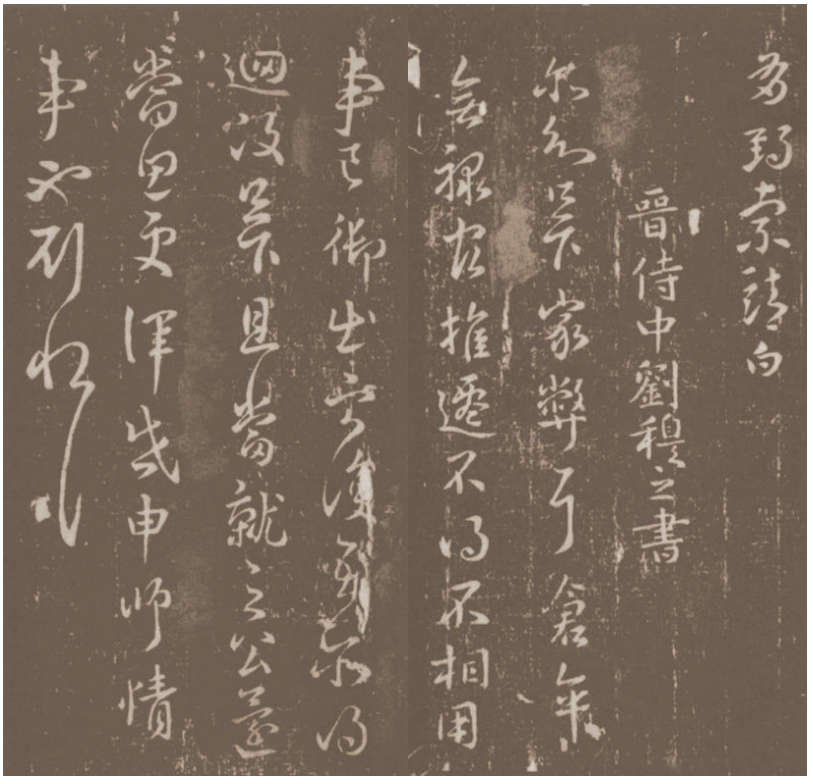
正因为刘穆之对刘裕如此推心置腹，所以刘裕对他的话都能听得进。刘裕因是寒门出身，在年轻的时候自然没有念过什么书，是个半文盲。后来在工作中他虽然慢慢认识了一些字，可以写些简短的命令和文告，但他的字写得极差，和他至高无上的地位很不相配。刘穆之便对他说：“此虽小事，然宣布四远，愿公小复留意。”当时军政十分繁忙，加之

刘裕生性不喜读书习字，自然不可能按刘穆之的建议去做。刘穆之于是又对他说：“公但纵笔为大字，一字径尺无嫌。大既足有所包，其势也美。”（您既然没有时间练字，那就把字写大一些，字写得越大越好。字写得大，不但能够藏拙，而且有气势。）刘裕觉得这个意见可行，便采纳了。从此后他写手谕文告，一张纸顶多只写六七个字，这可能是当时最大字号的文告了。

刘穆之劝刘裕写大字藏拙，当然是为了维护刘裕的尊严和面子。因为在当时，那些出身大族的人，对出身寒微的人打心眼里瞧不起，哪怕你身为帝王将相，如果不是士大夫出身，他们也是看你不起的。出身士族的人大都有较高的文化，而寒人却没有文化，所以寒人出身的人经常受到士大夫的讥弄和嘲笑。刘裕的字写得难看，当他的面可能没有谁敢挖苦讥笑，但背后人们肯定有所议论，作为他的秘书，刘穆之婉言相劝，要他留意把字写好，自然是一番好意。正因如此，刘裕才采纳了他的建议。

连自己的缺点，刘穆之也不想对刘裕隐瞒。刘穆之也是寒门出身，没有门户可以依傍。在得志之前，常常到岳父家里去混饭吃，受人奚落。但他的性格奢放豪迈，跟上刘裕后，身份地位提高了，条件改善了，于是吃饭一定要宽大的饭桌，一大早便经常准备十个人左右的饭食，从来没有一个人单独进餐。他曾经对刘裕说：“我刘穆之的家庭出身本来贫穷微贱，维持生计都很艰难。自从得到您的信任忝任高位以来，虽然心中常常想着节俭，但从早到晚所需要的花销，仍然稍微显得过于丰厚了一点，除此之外，没有一点儿是对不起您的了。”

从元兴三年（公元404年）二月出任刘裕的主簿，到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十一月去世，刘穆之与刘裕共事虽然不到十三年时间，但对刘裕和刘穆之来说，却是他们一生中最为重要也最为辉煌的阶段。在这十几年时间里，刘裕南征北伐，打下了刘宋一朝的基业，最后成了新王朝的创立者；在此期间，刘穆之把自己的全部聪明才智贡献给了刘裕的事业，是刘裕事业的最大支持者。刘裕称他“深谋远猷，肇基王迹，勋造大业，诚实匪躬”。《宋书》的作者沈约说他是“一代宗臣”。晋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六月，刘裕即帝位后，即追封刘穆之为南康郡公，谥文宣公。



临沂出土文物之

秦铜钺

刘　英

沂南县博物馆“镇馆之宝”秦铜钺，出土于1994年，是一村民在阳都故城取土时偶然发现的。是年12月26日，砖埠镇任家庄村村民任启斗在挖坑取土时，发现一把重3.5公斤的青铜钺。当时，经考古学家李学勤等考证，该铜钺为西汉以前兵器。

据介绍，这件铜钺出土时，通体无锈，刃部锋利。铜钺有长方形銎口，上部居中有一圆孔，重3.5千克。铜钺銎口长8.3厘米，宽3.9厘米，高20厘米。更为可贵的是右上部近銎口处有13个铭文。经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考证，这13个字为“廿四年莒阳丞寺库齐佐平耳或”。

根据铭文考证，“莒”，作为地名，可谓历史悠久，始自原始社会的部落，商为古幕国，春秋至战国时期为莒国，汉代为城阳国。可铭文里出现“莒”而不是“城阳”，故断定应该不是汉代。“阳”在“莒”后，说明“阳”是属于“莒”的一个地方，这与后来演变为汉代的“阳都”应该有一定联系。“库”应该是“武库”的简称，而武库是秦代储藏兵器的专门机构。再回到铭文的开头“廿四年”，恰巧也存在秦始皇帝二十四年。综合种种，铜钺为秦代的文物理由很充分。

钺是由斧发展而来的，钺除了其实际用途为兵器和刑罚器外，还有其特殊的用途——王权的象征物。这件铜钺的历史已经跨越了2200多年，它传递着当时的社会信息，为研究这一地区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这件被权威专家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目前全国只发现了这一件。

蒙公氏景仁族五世祖公鼐家世及生平小考

公 杰 杨 阳

公鼐其人

公鼐，字孝与，号周庭，山东蒙阴人，自称“懂东蒙公鼐”，生于明嘉靖三十七年，卒于天启六年，享年69岁。公鼐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中进士，后“改庶起士，授编修屡迁左谕德，为东宫讲官”（《明史·公鼐传》）。仕至于礼部左侍郎。殁后加赠礼部尚书，谥文介。著有《问次斋集》100卷，由于时逢明季战乱，在清代以前即已佚。清钱谦益虽仅距其三十年也仅看到30卷，在其《列朝诗集小传》中即已说文介公鼐仅“有集三十卷行世”。清张廷玉主编的《明史·艺文志》中也仅记载有30卷。现今仅留世《问次斋稿》31卷共8册，为明万年历间刻本，现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国内已是很难看到了。公鼐的史料本就很少，对其研究也只是能从散于各种典籍中的公氏轶作的零金碎玉中下手。但

令人感到稍慰的是，在1969年蒙阴县文化局在进行地名普查时，在桃墟镇前城子村公丕轩公氏景仁族二十九世孙家发现了其珍藏的《问次斋集》的清代手抄本一部，共8册31卷，收有公鼐文四篇，诗歌2015首，全书共20多万字，此抄本可谓海内孤本了。齐鲁书社于1998年12月影印出版发行了该书。该书成为迄今研究公鼐的最为全面详实的资料。

公鼐家世及“五世进士，父子翰林”之说

公氏家族的源头可追溯至春秋时期。按照《百家姓》及《姓氏起源》的说法，公姓出自于鲁昭公之子。鲁昭公有二子衍和为，均封为公爵，时人称之为公衍、公为，其后代以祖上爵位为姓，世代相传姓公。有一种说法认为公姓是公孙、公西等复姓的省略，但依据公鼐自己的考证，否认了上述两种说法。他在《训子》诗自注中写道：“公姓本出自鲁昭公之子公衍、公为之后或公孙、公西诸氏之省，非也。”据他的观点认为“公族受氏，为国纪纲”。其理由是“汉有主爵都尉公俭，历唐宋。氏族诸家皆有地望可考”。即为“耘地著，望于括阳”。后来虽然“分枝别派”，但仍不出鲁疆。到了北宋宣和年间其公氏家族人“自临沂来，改埠在古堂阜之阳”。据考证此地即为现在山东蒙阴县蒙阴镇西高都村。于慎行在给公鼐写的墓志铭中也写道：“时候琅琊，至宣和中，徙青之蒙阴家焉。”公氏一族自宋迁入蒙阴（即所谓东蒙新兆）后，一直居于此地，虽有少数子孙在此后历年由于各种原因迁出，但公氏之祖派仍在蒙阴，公姓也只有在蒙阴才能大量看到，而公姓自清中后期以来历为蒙阴诸姓之首，在民国时最盛，所以有“蒙阴城，公一半”的说法。

公氏一族真正的有详实全面的资料可查可追的时代为元朝，但此时的公氏一族，却受军籍所累，所以有“蒙之远祖，历金元不仕”，虽然可以“岿然独存”，但直到明朝中期时才有所发展，即“弘治中以户繁”。由于既是军籍有加之明朝有“三家出一戍”的政策，公鼐远祖公汝被遣往辽东戍边。汝有四子，分别是公守道、公守信、公守权、公守敬。后来公守敬“代兄之辽”，后因海险阻挡，“遗一子留金州而还”，该子即公先先。据公鼐《训子》诗及《蒙阴县志》记载：公先先生于永乐年间，在宣德年间以因孝行受到举荐，任广宗县县丞。期年，移疾归。公先先只有一子公评。

据《蒙阴县志》记载“（公评）富而好施，睦族劝善。”可见此时公氏已蔚然一大族欣欣兴然。公评只有一子公忠，公忠“孝友承先，诗书启后”。从公忠开始，公氏真正开始脱离军籍转而从文，即谓“公氏之兴始于忠”。公鼐也有“单传三世后，遂渐冒”的记载。然而公氏家族真正大兴走上仕途和文坛，成为声势烜赫的“馆阁世家”开始“五世进士，文字翰林”的家史荣耀，成就一方家族传奇的佳话，而誉之于史，其实是开始于公忠之子公勉仁。

五世进士的第一世公勉仁，字尚德，号西阜。为明孝宗弘治三年（1490年）的进士，授行人，升江西道监察御史，太仆寺少卿。在武宗正德初年，得罪了宦官刘瑾，被贬谪为四川参议。后来逢蓝鄢之乱，公勉仁领兵剿贼，立下战功，升至四川按察副使，又升为按察使，之后又升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大同。其在巡抚大同期间，颇有功绩，《明实录类纂》记载其“选抚南赣，末行，改陨阳，抵任随卒”。对其一生，《明实录类纂》有如下评价：“勉仁居官谨慎，不失职”，但却“遇事伤于烦琐，无变通之才。”公勉仁著有《东山集》行世。

第二世为公跻奎。为公勉仁之侄。公景仁之子。嘉靖十四年中进士，以工部主事出守山西潞安，升湖广按察司副使，后调任广西，累立战功。公鼐在《训子》自

注：“曾祖中宪府君为郎，历守潞安副宪楚粤。”公跻奎有五子为：公一载、公一鸣、公一扬、公一跃、公一翔。此五人“介登科宦”。 公跻奎著有《中岩诗草》行世。

第三世为公一扬。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中进士，授大理寺评事，后迁沙南裕州知州，仕至工部郎中，著有《闲音集》行世。

第四世公家臣，字共甫，号东塘，是公跻奎长孙，公一载长子。史记其“有奇迹，聪悟绝人垂髫受书”，“长孙中完公仕归则补博士弟子”。“读书务求经世之学”，公家臣于嘉靖辛酉举山东省试第二，隆庆五年（1571年）中进士，并以才选庶起士，后授编修，在万历四年（1526年）充任会典纂修官，负责校阅《世宗实录》，完成后受到了钦赐金币嘉奖。公家臣为人正直，好仗义执言。万历五年（1577年）因上书劝阻张居正“夺情”而遭到贬官。后移广平司理，南京户部主事。后在万历十一年在赴任途中卒于滁州。著有《东塘集》行世。

第五世即为公鼐，因后文对其生平重点论述，此处先一笔带过。

以上即为公氏五世进士之说，公鼐与其父皆为翰林院编修，因此又为父子翰林。公氏一族在明朝时为最鼎盛时期，五世之子孙大多为官科。上述中公跻奎长子公一盛曾担任兴济令，公一鸣曾任县丞，公一跃曾任岷州卫，公一翔曾任京卫千户，公一载次子公家邻中举后曾任虞城知县，公鼐弟公鼒与公鼐同年中举官至工部屯田主事，公鼐的长子公光国担任徐州总兵并卒于任上，三子旬仕南京户部郎中。由此可见公氏一族在当时之盛，但至公鼐孙辈之时家道逐渐衰落。公氏一族亦如一颗闪耀的流星般划过历史的天空，其家族的荣耀也只能成为一段永远记于公姓后辈心中的历史。

公鼐生平事略

公鼐是公氏五世进士中的第五代进士，也是公氏家最引以为耀，成就最大者，是公氏继前四世诸优的集大成者。

《蒙阴县志》记载，公鼐“生有异才，髫龄能诗。诗书一目即记，载籍靡不腹笥之。弱冠文明炳著海内，直指毛公试而奇之，升蒙阴为中邑”。

公鼐14岁时其父公家臣中进士，后授翰林院编修，公鼐得以随文入京读书。其才智得以发挥，不论是其学业还是诗作都已初具微名，小有所成，正所谓“小荷才露尖尖角”。其15岁时，写下的《拟秋怀》中有两句：“有怀投笔非吾事，愿学龙门兼太平。”从这两句诗中不仅留露出其志向之远大，我们更可以看出其诗作文采之高，不论是从格律还是意境，都宛如大家一般了。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公鼐的一生同样遭受磨难历尽困苦。1577年，朝中发生了张居正夺情事件，一时满朝哗然。稍有正义之士即纷纷上言，公家臣也上书劝阻张居正，不料万历帝下令官员杖谪官，公鼐、公家臣好友翰林院编修吴中行、检讨赵用贤即在杖谪之列。“即日驱出国门，人不敢候视”。公鼐代父为吴赵送行，《蒙阴县志》记载：公家臣“以论夺情事忤江陵意。吴中行、赵用贤之杖谪也。家臣遣子鼐送之潞河”。不久后，公家臣亦被贬谪，公鼐在《书评群斋壁》中写道：“太史周南意，今同滏水阴。寸衷堪对月。一羽任飞沉。”从这首诗中不仅表达公鼐对其父刚直不阿性格的赞扬，也表现出公鼐自身受其父影响嫉恶如仇、仗义执言的一面。

在公家臣遭贬谪出京后，公鼐回到家乡蒙阴。公鼐于22岁万历七年（1579年）起参加科举考试，至40岁历经数次均未考中。万历十一年（1583年）公家臣在数次

今公鼐故里

遭受贬谪迁徙之后，忧愤伤身，最后卒于任所。此时的公鼐已26岁，刚遭受到科举失利的打击，又惨遇慈父见背，其痛苦可想而知。冯琦在《东塘公大史葬黄山记》中写道：“值大雪，且行且泣，泪被面，纵横成冰。”公鼐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奔赴滁州，迎回父亲尸骨，安葬于蒙阴。在漫长的20年中，公鼐承受了父亲遭受迫害的打击，科举失利的磨难，家庭生活负担的拖累，这一切是痛苦的。正如他诗中所道：“负米不待养，风木心如劈。三朋穷愈坚，怡然甘落魄。荷锄犹带径，爇薪时映册。褴裂不掩胫，圭窬但空壁。”天不负人，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四十岁时，公鼐终于与其弟共同中举，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中进士，后改庶起士，授编修，为东宫讲官，此时公鼐已四十四岁了，一如其诗中写道：“傥然诸俊后，白发几茎添。”

然而他此时踏入的朝廷却正是个是非之地，围绕着立储事件，朝中一时暗流涌动，各种势力交错纷争。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公鼐如履薄冰，进退两难，处境十分困难。“如行异域境，险夷暗如漆，张弧生嫌情，触机成憯惕。”这种混乱的政治局面极大地挫伤了公鼐的政治热情，虽后来被提升为“左庶子”，但为明哲保身，离开官场成为他这一时期的主要想法。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春，朝廷诏公鼐以“观风使”身份出使湖广江西等地。这正合了公鼐想离开朝廷这个是非之地的心愿。出使完毕，自南方归来，途经家乡之时，已到深秋时节。历时半年之久，途经南北之广的这次出行，公鼐在游览了大好河山，写下大量的诗作之后，也许是疲于政治，也许是在游历中体会到了什么，在这一年底之时，他第一次引疾归乡了。对于这次离开朝廷，公鼐十分高兴，从其诗作《丁未人日》中我们可见其欢愉之情：“向年将半后，十载乞闲身。童子粘屏喜，乡邻送酒频。人当初服日，花进故园春。野趣何供给，盘中芋栗新。”

远离是非，避开那些勾心斗角、蝇营狗苟的官场，公鼐获得前所未有的放松和快乐。我们可以在其多首诗作中看出，然而闲居后的生活并非陶潜描述的那般恬淡美好，现实毕竟不同于诗境。闲居后的公鼐又遭到了另外的折磨。首先是疾病的折

磨，其次是家庭的重担，还有势利小人的欺辱，令其苦不堪言。“亲舂妻口瘏，号寒儿骨立。路鬼任揶揄，市儿恣辚轹”。其境况凄惨可见一斑。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鲁中、鲁南一带发生了严重的旱灾，一时而饿殍遍野，饥民四起，流走他乡。《蒙阴县志》记载：仅蒙阴县人口便“流走河南五百户”。面对这样的境况，公鼐心急如焚，忧国忧民，“疏请发赈，一路赖此全活。”这一举动不仅表明其有心怀天下志向，也使其获得了当地人民的普遍赞誉。

有些人注定不会沉寂下去。1619年明光宗即位，公鼐重被召回京师，官拜国子监祭酒。光宗对自己的老师十分器重，曾亲书“理学名臣”四字匾额。“国家有大事，公卿咸就裁”。这一阶段成为公鼐最受器重的时期。虽年逾花甲，体弱多病，公鼐仍勤于职守，兢兢业业。然而半年后，光宗驾崩，公鼐政治生命里的短暂春天画上了句号。光宗去世，熹宗即位。在即位之初，熹宗对公鼐仍很器重，视之以“两代帝师”，加封礼部右侍郎，詹事府詹事。然而在魏忠贤逐渐专权乱政的情况下，嫉恶如仇、刚正不阿、性格耿直的公鼐自然成为了被打击的对象。在帝党、后党、宦官、朝臣的错综往复斗争中，公鼐既不愿意陷入相互攻讦的党派斗争中，又不允许魏忠贤陷害忠良，其所处于两难的境地可见一斑。为了纠正魏忠贤等人散布的流言蜚语，愤然上书熹宗要求主持编纂《光宗实录》，秉笔直书光宗政绩和宫中委曲隐秘之事。“存其直补存其伪”，“以成一朝信使”。然而宦官当道下，朝政日非。公鼐请退两次均未获准。

1621年（天启元年）公鼐在看到改元后不到半年，御史因进言而受责罚，有十几人连续两次上疏，对皇帝及辅臣加以规劝，然而得到的结果却是“准责和忤者”。公鼐对魏忠贤专权乱政深恶痛绝，加之编纂《光宗实录》之事，触怒魏忠贤，“群小恶害己，尽力打击”。公鼐自感势单力薄，又不肯趋炎附势，不得不再一次引疾而归，从此脱离仕途。天启六年（1626年）死于故乡，终年69岁。

公鼐在1621年引疾归户，因李三才事件受到牵连，遭魏忠贤陷害，被免去官职。在毅宗即位后，公鼐得以平反，被追封为礼部尚书，谥文介，并在蒙阴县署后建造“五世进士，父子翰林”石坊一座以旌公氏荣耀。

老城夜话（连载）

刘家骥

皮狐精火烧二里棚　日本鬼焚毁五凤楼

临沭县的韩村原先住着一户大地主——“皮狐子”王英标。为了让人相信他的发家史，便在住宅后院建了一座狐仙祠，内供狐狸大仙，初一和十五上香上供，供品一定有熟鸡。村北有座小石山，山上多洞孔，洞内真住着狐狸和黄鼠狼，他把小山筑墙围起来，不准人进入，也是初一和十五去上香上供。

清光绪十三年二月初，王英标病死，其子王鼎成了王家庄园的主人，演出了一场出大殡的闹剧，造成一起烧死400多人的惨案。

这王鼎财大气粗，处处皆要显示他家的豪华。临沂城的大户人家最高葬礼也就是尸体在家停放“五七”以示隆重，这五七35天也够长的了，他家却要“七七”，停放49天。一般人家要僧道对棚各8人，最高对棚各16人，而他家要僧108人，道士也是108人。一般皆是文场，即念经奏乐，而他家还要有武场，即请武僧武道表演武术杂技，而吹鼓手更是用了200名，还请各种戏班演唱，形成了一个特大的娱乐场面。

浪费程度也十分惊人，专门请了潍坊的扎纸匠给扎纸草，扎的人物皆穿丝绸的衣服，还需分一年四季，一般人家大门外只扎两个方相士，出殡时在前“打鬼”，俗称“打路鬼子”，他家扎了四个方相士，还扎了四大天王及关公张飞，在大门外把门。更为奢侈的是从他家大门外一直到墓地搭了二里路长的席棚，这就埋下了祸根。

今临沭韩村外景

农历三月二十三正是韩村逢山会，头一天的晚上到达了葬礼的最高潮，请来了九华山的真禅老法师，青岛崂山的道会老道长。由他们各带僧道放焰口，在村外搭了两座高台，众僧道奏乐诵经，一直闹到半夜，接着又搞堂祭闹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准备出大殡，各种仪仗和扎的纸草摆满了从主家到墓地的席棚内。这真是乐极生悲，中午时，棚内突发大火，一时火光冲天，烧成一片火海，看景的人四散奔逃，烧死、压死、挤死的竟达400人，伤者更是不计其数。事后苦主皆向王家索赔，并告到沂州府。王家又向府官行贿，花了不知多少银子。事后有人说他家得罪了关公和张飞，他自家就说得罪了狐仙，说是狐仙放的火。

八年的官司打下来，王家开始败落了。抗战时王鼎的儿子王林翰将临沂城的宅院卖给了王洪九，带着钱财和眷属去了青岛。

现今兰陵县的庄坞村原先住着杨姓的大地主。这杨氏家族清朝有人在外地做过大官，故高门大户满村庄。这些大户中有一户祖上曾在河南做过官，发财后在家乡大兴土木，特别是建了一座五层的大楼，自称“五凤楼”。他的五儿诨名叫“五老虎”，横行乡里得罪了不少人，所以就有人将他告上官府，说他家僭越妄为，自称“五凤楼”想谋反。这可是大逆不道的罪，消息从北京传来后，他家大吃一惊，眼看查房的御使就要来到，杨家连夜请人想法应对。这时杨家私塾中有一老秀才，说出了免祸的良策。只听他说道，改建拆除都来不及了，只有将最底层用土屯上改为一个平台，这样楼就成了四层了。杨家连夜雇人运土将底层屯上建为平台，天衣无缝。不久御使来到，一看果然是四层。他家还将附近寺庙的神像移来供奉，所以御使一看原来是一座大庙，一场大案就这样结束了。事后这家重谢了那位塾师，但此

兰陵县庄坞杨氏贞节牌坊

楼也就正式成了一座寺庙。大楼终日封闭，最上层住了狐狸和黄鼠狼，从此更无人登楼了。日伪时曾做过汉奸的据点。后来被鬼子汉奸放了一把火将此楼烧毁，从此这座“五凤楼"只剩下传说了。

马思孔王桥除奸　李华源初战告捷

前面曾谈到马思孔带游击队火烧日本马厩的故事，现在再讲讲他为民除奸的故事。当时的王桥区马家石河村有一户村民，名马自良，夫妻两人勤俭过日子，在村

小皇山残存的岗楼
（上世纪七十年代）

中还是有余粮剩钱的人家。正因为如此，他家就成为汉奸敲诈勒索的对象。

临沂城南沂河东岸有一座小山，此山名小皇山。由于它地势重要，鬼子汉奸就在上面修了一座炮楼，里面住着一个小队的汉奸，用以保护临沂至新沂这条公路。这炮楼里的汉奸经常向四周村民征粮要钱，使村民大受其害。此事被马思孔领导的游击队知道后，汉奸马上向游击队求饶，请马思孔前来“训话”。马思孔只带两个队员来到炮楼，对他们晓以大义，告诉他们以后不准再骚扰四周百姓，鬼子有什么动态要向游击队汇报，不要死心为鬼子办事。从此这炮楼的汉奸被游击队说服了。

时过不久，这炮楼又换了队长，来者是个铁杆汉奸，他名叫张佃岳，是大汉奸齐华亭的干儿子，他本是土匪出身，当了汉奸后更是无恶不作。他来到后不但不向游击队请示，还发出诳语“活捉马思孔向皇军请赏”，平日里四处向村民要酒要肉要白面，还到村中奸污妇女，一时间闹得四乡不安。这时马思孔决心除掉这个汉奸。

张佃岳非常狡猾，他将各村的富户排了个名单，按户索要钱财，稍不如意，就说该户私通八路，便要抓人。马家石河的马自良自然也被列入名单，第一次到他家要吃要喝，还要去了30块大洋，从此这贼人经常到他家勒索。眼看日子无法过了，女主人对丈夫说：“你太老实了，何不向咱大爷爷马思孔求救。（他家和马思孔是本家）”丈夫一听有理，便向马思孔诉说自家的遭遇，马思孔满口答应帮他除奸。

不久后的一天晚上，这个汉奸带着一个护卫又到马家，照样要吃要喝要银元，还不断调戏主妇。这时主妇到厨房炒菜，丈夫出去买酒，这汉奸蹲在椅子上喝茶吸烟。事有凑巧，在酒店马自良遇上了马思孔，告诉他贼人正在他家。马思孔到了他家，一个箭步到了堂屋内，将汉奸张佃岳一手抓住。这汉奸连喊“长官饶命”也无济于事。马思孔将其带到村外，只听一声枪响，就结束了这个汉奸罪恶的一生。从此后，再来的汉奸小队长皆接受了教训，再也不敢作恶了，老老实实地听从游击队的命令。到1945年春天，最后的一任小队长在民主政府工作人员钟伯荣的策反下，整个小皇山的伪军全部参加了八路军，从此沂河以东再也没有日伪的据点了。

沂河东岸临沂至新沂的公路甚为重要，因为此时北去东去及西去的公路皆不通了，驻城的鬼子将这条公路看作“生命线”。这条公路也是不太平的，北段以马思孔为首的游击队经常出没，南段以李华源为首的游击队更是活跃。李华源是今兰陵县人，其父是中医，李华源是三乡师的学生，他幼年习武，练成一身好功夫。他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青年救国团后，就成了有名的游击队长。由于家乡人多去枣庄“吃两线子”（爬火车），青年人多练习爬火车的本领，这李华源自然也练就爬火车的好本领。

李华源通过城内的亲友同学及时了解城内鬼子的动态，准备给鬼子痛击。鬼子有个习惯，只吃大米不吃面粉。刚来时吃的全部是从日本运来的大米，这大米全存放在“红部”内。这“红部”设在南当铺内，一天鬼子忽然叫苦力打扫粮仓，这苦力中有人“私通八路”，早将消息告知了游击队。不久小皇山的伪军又接到通知加强戒备，一定要保证公路安全，伪军小队长也告诉了游击队。李华源分析，鬼子肯定有重要物资通过公路。不久，果然自城内来了一队扫雷兵，沿途侦探地雷。新沂的侦察员又报告，从新沂发往临沂的三辆汽车，全部装满了日本大米。李华源组织了50名精干的队员，全部带短枪和手榴弹，埋伏在李家庄至王桥一带，当日上午10时，鬼子的车队来到了，只听李华源大吼一声“打”，他首先打死了第一辆车的司机，接着后面两辆车也被队员们击中。护送的鬼子跳下车顽抗，结果一个班的鬼子一个也没跑掉，全部被击毙了。这时马思孔组织的小车队赶来搬运大米，三汽车大米就全部落到游击队的手中。当晚队员们吃上了日本大米，而沂河公路上的游击队也出了名。

诸葛亮数庙享祭　关云长四季风光

临沂人对诸葛亮是十分崇敬，为有这样一个老乡而自豪。据现有的临沂史志记载，自明代临沂即有祭祀诸葛亮的祠庙，在城南北门外立有“汉诸葛亮武侯故里”碑。明万历《沂州志·秩祀》中载：乡贤祠内有诸葛亮，忠孝祠内有诸葛亮，在南关外里许，春秋二仲上巳日祭。武侯祠在诸葛城（又称中丘城），景贤祠在南关五里，嘉靖三十年知州何格建。

清康熙《沂州志》载：忠孝祠春秋二仲上戊日祭，乡贤祠祭丰巴同。

清乾隆《沂州府志》载：五贤祠，旧在南关五里，嘉靖问知府何格建，乾隆十六年皇上更定五贤祠名目，作诗记之，知县王垲移建城内府治西里许，忠孝祠在县南关内，武侯祠在诸葛城，北城楼上层亦有武侯祠。

民国《临沂县志》载：乡贤祠祀诸葛亮。忠孝祠，旧在南关内，明崇祯十二年移建右军祠西，旧制春秋二仲上戊日祭。五贤祠，旧在南关五里外，名景贤祠，明嘉靖间知州何格建，清乾隆十六年高宗更今名，知县王垲移建今县西。武侯祠在城北三十五里诸葛城。

民国《续修临沂县志》为民国二十四年县长范筑先任职时所修，对典祀记载更祥。忠孝祠，每年春仲、夏仲、秋仲吉日县长委属员致祭，忠孝祠祭品羊一、豕一、香烛等项，行再拜礼，礼生鼓乐。五贤祠祭祀与忠孝祠同，五贤祠除官祭外，诸葛、王、颜三族还要进行家祭。特别是民国十一年，三族集资重修了五贤祠。重修清点祭器时还发现乾隆时期的祭器，上面铸有乾隆年制的铭文。

乾隆南巡过临沂时在行宫召见了诸葛、王、颜三族的代表，并封其为奉祀生，世袭秀才，至民国时改为奉祀官。

综上所述，诸葛亮在临沂享受了乡贤祠、忠孝祠、五贤祠、武侯祠等祠、庙的祭祀，其规格仅次于孔子，仅少用一牛。祭典最隆重的一次是民国十一年（1922年）五贤祠重修后，由县长主祭，三族代表陪祭。自此祭祀从未中断，直到1938年五贤祠被日寇强占并加以破坏，祭祀中断，以后只是在河东汤河一带的诸葛家族家庙中祭祀了。

东关关帝庙

临沂城关在清末民初可说是寺庙林立。关帝庙最大的当属南关的关帝庙了，它的前身是山西会馆，建于明末，位置在原观音阁门里路西，山西人走后会馆就成了关帝庙。另外在油坊巷南端还有一座关帝庙，靛市巷东首有一座关公庙，这样南关共有三座关帝庙。东关南北大街的北端有一座关帝庙，西关蚂蜡庙的西侧有一座关帝庙。城内就更多了，南瓮城路东是三义庙，内中也供关公。南城楼上层也是关公庙。南大街路东正对着考棚街的井神楼，上面也是关公庙。这大街路西的财神庙巷的西端又是一座关公庙。正气巷的正中正对着北门大街有一座正气庙，供的也是关公，洋楼巷的北端俗称营房庙，实际上也是关公庙。庠门里的最北端也有一座关公庙。城内最大的关公庙当数原北大寺后改建的关岳庙，内供关公和岳飞。普照寺西侧的武庙，同样也是供的关公和岳飞。至于关公小庙当有数十个，大多在丁字形的巷头上，为的是镇邪。像茶棚街就有两个关公小庙，还有八小集街南头、东西更道北端。商人们将关公当财神，所以关公庙又称为财神庙。

城内八处佛寺皆有伽蓝殿，供的也是关公，说明关公当年在临沂城普遍受到尊敬。

现在这些祠、庙都已不存在了，保留下来的只有一张东关关帝庙的照片了。

乌鱼精转世刘黑七　蝎子怪托生王洪九

在临沂的近现代史中有两个“混世魔王”，一个是刘桂堂，一个是王洪九。这两个土匪头子皆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民间对这两个千古罪人有着各种传说，这些传说深刻地体现了群众的爱憎，既生动又很艺术。

传说刘桂堂是乌鱼精转世，这是从刘桂堂的长相得来的。刘桂堂浑名刘黑七，可想而知他长得多黑。他的体形是什么样呢？见过他的人有一段描述：“这黑七长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又矮又胖，头大脚小，脑袋像马桶，肚皮又大又尖，手指又粗又短。”难怪老百姓都叫他乌鱼精。一段山东快书上是这样说的：“要看看黑七是个啥模样？原来是手指脚丫乌龟爪，脸黑头圆王八像，肚子上一个大疙瘩，像

个鳖甲硬梆梆。”在一次次追剿中，刘桂堂都逃脱了，所以人们传说他“现原形遁去了”。但是这个“乌鱼精”终究未逃出人民的法网，最终还是被我军的一个年仅18岁的战士何荣贵击毙了。何荣贵因此于1944年被选派出席了山东省第一次英雄代表大会，被授予山东军区“甲等战斗英雄”称号。

关于刘桂堂转世的传说还有几种。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个千古罪人。

提起王洪九，更是临沂人民切齿痛恨的杀人魔王。他是流氓、土匪、汉奸、还乡团，集官匪于一身的民族败类，由于他杀人成性，阴险毒辣，社会上传说他是个蝎子精托生的。这个传说，一是由他的本性而来，二是与他的出生地方有关。

原来王贼出生在临沂城西艾山北麓的沙沟崖村，此村南面正对着一个山坡，这山坡上的一片岩石上凸起了一道石梁，远看上去就像一只蝎子，故称此地为“蝎子山”，由于王洪九杀人成性，故群众传说他就是这个石蝎子托生的。奇怪的是，不但痛恨他的人相信这一传说，他本人也信以为真。

且说他自1947年2月杀回临沂后，马上组织扩大了还乡团，其番号是“洪范”，由于和红矾谐音，故群众说这“洪范”就是毒药红矾，也是蝎子毒。他大修工事，在南城门望淮门外修了一个大地堡，正对着南门和护城河的吊桥，城内修一地道通入堡中，在堡上又建了一座六角亭，仿照五贤祠御碑亭的样子，在亭的顶上安放了一只试风鸡，可以随时观看风向。痛恨王洪九的人于是说：“王洪九快完蛋了，出现了公鸡吃蝎子的先兆了。”这种说法很快在社会上传开了。这时驻城的特务头子杨可僧听说了此事，告诉了王洪九。王洪九亲自察看了亭子后怀疑是有人故意的，便问是谁设计的。经过一番查问，原来是县长朱绍白亲自设计的，王洪九也就未再追查。但王贼非常迷信，认为对自己不利，命人将亭子上的试风鸡取了下来，认为这样就可以逢凶化吉了。试风鸡取下不到一个月，也就是1948年10月9日，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王洪九和他的还乡团弃城逃走了，不久在郯城被解放军歼灭。王贼后来逃到台湾，其下场比刘黑七还惨。刘贼被一枪击毙，而王贼后来在病床上躺了10年，说是植物人，但还有知觉，每天由他的大儿媳给他喂饭，双股的肉都烂掉了，露着股骨，其臭无比，人不敢靠近。被他抓壮丁抓去的李福湘（义堂人）亲眼目睹其惨状，说道：“王洪九受了天罚。”

山河百战归民主　铲尽崎岖大道平

巍巍蒙山，滔滔沂水，铭记着英勇不屈的沂蒙儿女，见证了百年以来的历史。今日迎来了太平盛世，研究临沂历史的人不能不感慨沧海桑田。

回顾这百年以来的历史，可说是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各色人物可说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才非正不能奇”。这120回的《古城夜话》，叙述了自辛亥革命以来临沂历经的军阀混战、土匪猖獗、日寇进犯、八年抗战、三年内战，终于迎来了解放的历史。三年解放战争中蒋介石为何由强到弱，最后彻底失败，原因就是失去民心，像八十三师李天霞，他的部队中就有招安的四川土匪，收编的汉奸，这些人贼性不改，到临沂后继续作恶；再看蒋介石急于求成，不惜重用当年的土顽，像临沂本地的土匪司令王洪九，他既当土匪又当“皇协军”，还被任命为专员和保安司令，让他在临沂作恶多端，从此失去民心。万民皆知中国共产党以仁义之师驱逐倭寇，打败蒋军，剿灭土匪，安抚百姓，为人民打下江山，这就是得人心者得天下。在中国近代史中，临沂也出过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　如甲午战争中的左宝贵就是我们的民族英雄。八年抗战中，临沂阻击战的胜利更是震惊中外，沂蒙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燃起了抗日的熊熊烈火，浴血奋

战，最终取得胜利。

翻开临沂的近代史，匪患十分猖獗，像巨匪刘黑七（刘桂堂），女匪赵嫘嫘，惯匪李堂刚，官匪合一的梁钟亭（梁麻子）、王洪九，不是被官兵剿灭就是被八路军所消灭。

三年自卫战争中临沂更是写入史册，名震中外的孟良崮战役，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一举消灭了不可一世的国民党七十四师，这一战役成了解放战争的转折点，从此节节胜利，直到解放全中国，这在解放战争史中是光辉的一页。

《古城夜话》写至此就要搁笔了，休闲时顺沂河西岸南行观看这江北的水城景色，至南端过桥至东岸沿河北行，只见两岸高楼林立，滨河路东的小皇山如今大变样了，当年公路穿山而过，山上日伪时曾建一炮楼，如今建了一座皇山阁，真是大变样了。再北行到了当年的老桥位置，原来只是台潍公路的一座石桥，如今已建成现代化的大桥，今非昔比了。回城后想到老城留下什么呢？原来孔夫子带其贤哲又回到当年的孔庙了，王羲之也回到当年的老家右军祠了，以诸葛亮为首的五贤也请回五贤祠，临沂城唯一的一座古罗马式的天主堂也恢复原貌了，让怀古的人们可在此徜徉。

回忆姐姐

徐肇英

一

姐姐名叫徐肇兰，比我大八岁。听母亲说，1926年农历六月十三晚上，正遇土匪攻打小金山，姐姐就在枪炮声中出生在山顶上简易草房里。这晚住山的人们防卫好，土匪没攻打进去。第二天一早，邻居都去贺喜，有的用餐拉布子（毛巾）包着鸡蛋慰问母女俩，对母亲说，你闺女有福气吆，因为她来，把山给震住了，土匪才没攻打进来啊。其实姐姐这一生中不但没享到什么福气，反而受的苦难和煎熬太多太多……

姐姐是父母亲六个孩子中的第三个，姐姐比大哥小14岁。我记事时家里10口人居住在一起，我和三哥、四弟、侄女我们四个孩子，上下只差五岁，基本上是一起长起来的。那时的姐姐最受累。除推磨压碾、烧火做饭外，还要帮母亲、嫂子看孩子，抱着、背着、喂饭、洗衣服、梳头。那时的生活很窘迫，粮食紧张，听父亲说，姐姐每每看到饭少不够吃时，就立即自己少吃，甚至不吃，省下来让我们这四个孩子都吃饱。她心灵手巧，做针线活又快又好。记得有一次，她在油灯下一晚上做起一双鞋来，第二天父亲赶集把鞋卖了，换回其它物品调济生活。

作者近照

姐姐是心地善良的人。她非常体贴受苦人，上世纪40年代初，邻居王家有个童养媳，名叫闫士英，当时十岁，因为生活条件很差，她头上生了虱子，满头的虱子据说都往下淌了，她婆家也不管她。姐姐看到后，就把她领到家里，给她用篦子先刮了几遍，又给她洗头，连续处理了几次后虱子就灭绝了。以后她的小男人死了，她又回到下东门村娘家去了。她现在已70多岁了，听说去年有一次她去西崖子村走亲戚还问及姐姐。别人告诉她说，姐姐已去世多年了，她立刻哭了，抹着眼泪说：“我在这村当童养媳时，亏着肇兰救了我，要不我就让虱子吃了，她是最好最好的人啊……”

过去因为贫穷，姐姐没机会上学，可她在家劳动的空隙里，跟父亲、大爷等学背唐诗、三字经等，简单的书信能写会念。解放前在村里女孩子中还算是有文化的人，村里推选她当识字班队长，每天吹哨子集合村里妇女上课学文化，还教妇女学唱歌。她曾与本村王见梅合作表演歌曲《小放牛》还去金前管庄表演过一次。

作者与姐姐（左）合影

1945至1946年，她曾被上级党组织选拔出去脱产干革命工作，那时正是斗地主恶霸时期。有一次，她所在的工作组在蒙阴县城附近荆汶一带工作，一天晚上工作组里有一位姓卢的同志让坏分子逮去扔到了井里。由于此人水性好，最后自己挣扎着爬出来了。坏分子要陷害的名单上也有姐姐。几天后，姐姐所住的主人家的女儿悄悄告诉姐姐：“今晚你不能在这住了，地主恶霸要害你。”这天下午女孩的爸爸背着粪筐假装捡粪，领着姐姐绕道去了另一个山上的一户人家住，避免了这一难。从此以后姐姐整天提心吊胆，一心想离开那工作的地方。促使姐姐离开这个地方的另一个原因，是姐姐从小就晕水，见水大就晕得不能行走，那时泥里水里是常走的路。再加上有个痛经的病，三方面原因促使姐姐下决心回家干。

姐姐是共产党员，回到家后仍担任妇女干部和村干部，开展拥军优属，组织妇女做军鞋，压碾加工成品粮等支援前线。

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打响了，上级党组织号召凡是共产党员都转移到安全地方去。这时姐姐领着我，跟随有组织的民众队伍转移到了黄河北渤海区上河县乐家村。队伍按军队编制成团、营、连、排、班，每人每天供应二斤原粮，有小麦、玉米等，没有菜金。在那住了近七个月，姐姐和众妇女们除做军鞋外还帮助村里搞宣传教育，宣传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

转移在外七个多月后，已到腊月，鲁中山区形势已经平稳了，政府号召民众身体棒的分批返回家乡。在回来的路上过胶济道时，我们曾离敌人只有三里路。在解放军的护送下，我们悄悄地奔走在路多宽人多宽的大道上。解放军的口号是：宁愿牺牲10个战士也不让一个民众受伤。那晚上连走带跑一气越过了胶济道，走了120多里路，安全回到了离别七个多月的家，全家终于团聚过了春节。

转移在外七个多月里，我与姐姐相依为命。特别是辗转在路上时，我的手紧紧抓着姐姐的褂子后襟，休息时我趴在她怀里稍睡一会，白天中午休息没地方躺就倚在她身边打盹。为了让我得到更好的休息，晚上睡觉时她给我打蚊子。在吃的方面，只要有好吃的先让给我。那时我对姐姐的依恋是离开母亲行，离开她一刻也不行。

那时候我心中曾默默地想，今生今世最好和姐姐在一起，千万别离开她。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和姐姐从1955年起不但离开了，而且离开的年月还特别漫长，长达34年。

二

姐姐的婚姻是父母亲包办的。那是1948年春，23岁（虚岁）的姐姐当时在农村已是大姑娘了，父母也期盼给她找个婆家嫁出去。此时有好多给姐姐提媒的，其中有父亲的四婶子，给提的是她娘家门里的沂水县佛庄李家。她说：这户人家怎么富裕，人长得怎好等等。父亲认为是她的亲婶子提媒没错，就听信了她的说法。他四婶一听父亲有愿意之心，就急急火火地正月开始提媒，二月初就让对方传柬定亲。大概是二月初，对方派人送来四块银元，一块红布（大约6尺左右），就这样定了婚。

定婚后村里许多人传着：肇兰找的这个婆家，地无垄房无间，人又黑又瘦，还是结巴，娘三个从山西要着饭刚回来。传到父亲和姐姐耳朵里后，姐姐认死也不同意，父亲也后悔了，就向他的四婶提出拔亲（退婚）。父亲的

四婶气乎乎地骂着跑到我们家，开口就冲父亲说：“他三哥（父亲排行老三）你担不得这个好女婿，人家要文有文要武有武，你那闺女配不上人家”。于是，父亲向她提出先看看此人再说。她找了一个她娘家门里的管她叫姑奶奶的孙女女婿在集市里指给父亲看。父亲看了后很高兴，与母亲说：这人长得白静，胖乎乎的，不错。从此打消了疑虑。媒人急速策划，让李家查日子快快结婚。几天后李家让媒人送来结婚的日子：“八月初三”。姐姐得知消息后，与父母亲说：查了日子我也不去，要去就用棺材抬着去！父亲发火了，把姐姐训斥了一顿。后来姐姐也只好顺从父母之命，结婚了。姐姐坐着花轿离开父母时，父母都哭了，我也随着哭了起来。

姐姐婚后，回娘家说：让父亲在集上看的那个人是姐夫四叔家大儿子，住场园屋子和娘三个要饭从山西刚回来，房无间、地无垄都是实事。姐姐结婚住的屋是土地改革没收的地主家的，村里看他们从山西刚回来没地方住就分给姐夫三间屋。姐姐的婆婆和她小叔住两间，姐姐结婚住一间，连个饭屋也没有，姐夫与他弟弟做粉皮卖维持生活。

姐夫李瑞连是个很朴实的农民，能吃苦，能劳动，脾气很好，对姐姐很敬重，从没打过架。家底子虽穷困，可姐姐忍屈谅解与姐夫携手共创建家园，也算不错的。

三

姐姐结婚一年后，她婆婆病逝了，她小叔自愿独立生活。姐家又连续增添了三个孩子（大进、二进、三起）。生活极度困难。姐夫曾去东北伐木场打工一年多，挣得几个钱，但也解决不了长年累月的贫困。1955年他和姐姐带着三个孩子又去黑龙江省瑷珲县，以后加入了国营集体农场（瑷珲县红色边疆农场），姐夫凭着老手艺在农场里早起晚睡做粉皮、豆腐挣工分维持生活。刚过三年，他们的第五个孩子（二女儿）秀艳出生时，姐姐月子里没过七天就患了产褥热，高烧不退。姐夫和他大儿子立即送她去医院，在治疗中她死过去五个多小时，当时医生告诉姐夫准备后事。姐姐该当大病不毁，此时遇上了苏联一妇科专家正去那里巡回医疗。那专家以高超的医术精心抢救治疗，把姐姐从死神手里又夺回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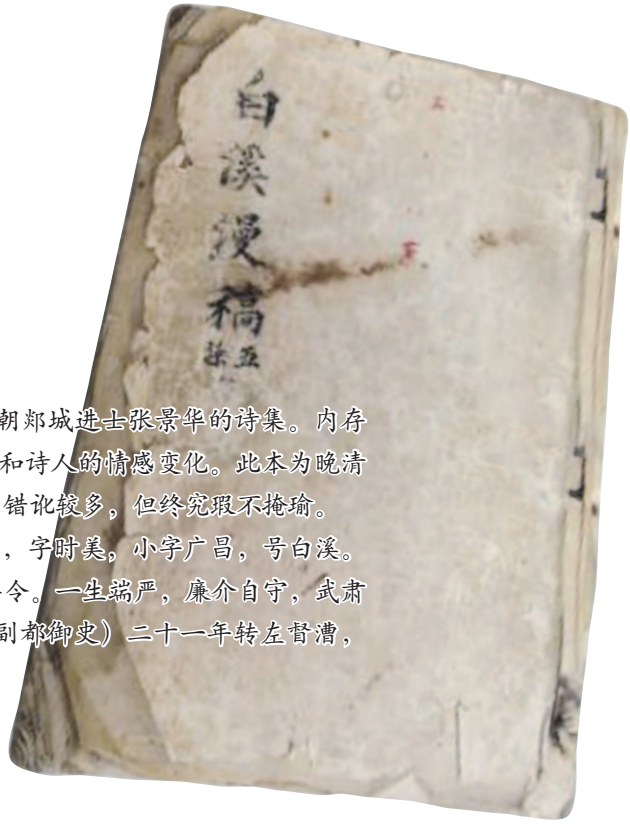
姐姐生育了八个孩子，头三个是男孩，后五个是女孩。第五个女孩（最小的）于1967年一周岁多时患病夭折了。1968年春，第三个女孩九岁时突患脑炎病夭折了。两个月后，姐夫突发心肌梗塞病撒手人寰，时年44岁。他们俩共同走过了仅仅20个春秋。撇下最大的孩子19岁，最小的7岁，三个男孩三个女孩。从此姐姐领着六个孩子，在漫长坎坷的道路上担负着沉重的家务担子往前熬。我与姐姐闲聊时曾问她：那时候你是怎么熬过来的呀？她说：“当时只有一个念头，不管困难多大都把孩子拉扯成人，让他们上学得知识，将来在社会上懂道理。那时靠大点的孩子勤劳能干活挣得收入，供养他们的妹妹上学，靠双手给邻居多做针线活。有一年冬天，我除给自己孩子做棉衣外，还一气给邻居做了九个罗缎的棉袄，日常生活中人家孩子吃水果，我没钱买就洗一盆胡萝卜让孩子啃，很少买肉吃。大孩子劳动空隙里，不断的去江边钓鱼，我把鱼煮烧熟了给孩子吃了后，剩的鱼骨头再把它烤干让孩子当点心吃，想尽一切办法让孩子吃饱，别影响了长个。穿衣服夏天天气热了，把大男孩子棉裤的棉花掏抽出来，再当单裤子穿，脏了在江边洗洗，没等干透再穿上。大孩子穿小的再给小的改改补补再穿。姑娘都互相替换着穿。吃粮多是玉米，很少吃细粮，就这样坚强的生活着，渡过了一道道难关。”

姐姐与六个孩子含辛茹苦度过了漫长艰苦岁月熬到了孩子都参加了工作，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结婚生子。他们在姐姐严教和在艰苦生活中磨练成长起来，个个都很能干，干得都很好。生活环境也得到逐步改善，这时的姐姐应该说可以过上舒服日子了，可是实情恰恰相反。

改革开放后，1989年某一天，她突然对儿子说，要回山东蒙阴老家。她虽在外30多年，可心中一直留恋着老家和家乡的人。于是她和二儿子李化林一家四口回到蒙阴。当时，她身体还非常好，精神也很旺盛。至1990年春节前她要求去秦皇岛送外孙鹏南，在那里过完年后再回蒙阴，那时她已经患病了。为了不让别人为她担忧，她默默忍受着。春节后她的病状已经瞒不过女儿女婿，女婿就送她去医院检查，结果是“再生障碍性贫血”，立即住进秦皇岛人民医院治疗，此时的姐姐只能靠输血维持生命了。住院期间，我与三哥去看望她，她说：“我很快就好了，我好了后回蒙阴让你三哥教我太极拳，天天锻炼身体，要好好地活着。”她的意思我很明白，她是不让我们为她的病担心。我和三哥离开秦皇岛后，她的病情逐步恶化，1991年农历四月二十转到北京305医院，第二天，姐姐在她儿子、媳妇、闺女、女婿守护下“寿终正寝”，终年66岁。按她生前遗愿，骨灰带回蒙阴撒在她出生地西崖子村西边小金山顶上或蒙山某个地方，但是她儿子不忍心，最后决定安放在青龙山公墓。

姐姐离世23周年之际，我独自一人静静地在家回想起苦命的姐姐，心里涌上无尽的思念。所以我仅以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到的实事记录下来一部分，让子女们看看我最尊敬最想念的姐姐是怎样一个人。

张景华《白溪漫稿》选



《白溪漫稿》是新近从故纸堆里发现的明朝郯城进士张景华的诗集。内存诗词300余首，真实地反映了明晚期的历史场景和诗人的情感变化。此本为晚清抄本，亦是孤本。由于抄写者的文字功力欠缺，错讹较多，但终究瑕不掩瑜。

张景华（1482—1555），山东郯城人。行二，字时美，小字广昌，号白溪。明正德庚午科举人，甲戌科进士，授江西吉水县令。一生端严，廉介自守，武肃两朝如一日。（嘉靖）二十年任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二十一年转左督漕，二十二年任左副都御史任，二十三年被劾闲住。

槐　柏

闲伴双槐坐，笑从十柏游。
密荫时时转，清香步步收。

秋　月

今宵月始出，清影漾长空。
未几当西落，鸟惊云外弓。

孤　雁

黄昏月初上，孤雁一声哀。
天空水阔处，颜影莫疑猜。

又

一身无伴侣，远自北荒来。
风霜野宿处，孤月与之偕。

游西溪

西溪修禊事，满白拂和风。
鸥鸟乐群聚，忘机一老翁。

野　鸟

野鸟过槐阴，从容入转深。
物微能自乐，鼓舌弄清音。

映　日

阳月日初暖，黄锦袄始舒。
一冬风雪少，到处是安居。

戊戌元日邀县学诸君

干日西庄路，东风快马啼。
春回柳眼细，暖入草心齐。
土润开耕种，山清试采薇。
一樽椒柏酒，仙木傍门低。

甲辰夏旱久得雨

旱魃频为厉，愁怀日夜萦。
云驰天欲动，雷震雨如倾。
酷暑应全减，遗禾或未登。
嗷嗷民待哺，仓库亦虚名。

咏　菊

东北海风来，菊花冒雨开。
满头插幽色，对景上高台。
落帽风何劲，正冠礼未乖。
病余贪静养，瞑目坐西斋。

沁水城阳道中

东路崎岖曾未经，眼中愁见万山青。
桑麻不比闲花草，乱噪新蝉杂鸟声。

游望海楼

春深何处可舒忧，望海由吾是旧游。
东道主人今已矣，山花迎我动情不。

春

堤柳密阴草漾青，小鱼作队趁波行。
闲春散步西溪上，笑对春光一展情。

过襄陵书清风亭有感

久约龙祠游未成，匆匆日暮下孤城。
梦魂已倦堪蛙闹，风雨忽来是水声。
亭旁湖山景自别，堂环松竹兴偏清。
愁人世事思归去，过此真兼吏隐情。

戊子九月九日不见菊花

开遍菊花未见菊，重阳疑不带茅屋。
昨夜飞鸿带霜信，春属公共秋何独。
黄菊香从栽处香，重阳非是厌僻庄。
来年春雨学陶令，多种黄花候重阳。

庚子岁三月二十日游望海楼

百里平山石突出，屹然千丈插云霄。
望海名香留孔迹，龙王碑古自元朝。
地连胜概皆环拱，气接沧溟可画描。
东风乐与游人便，登罢神怡万虑消。

寓淮安都府重阳谴怀用正韵

淮阴候代复重阳，篱畔黄花自耐霜。
何处登高乐燕饮，此心防患苦灾伤。
落英食罢香仍在，旧帽着来情未央。
卧病秋深宵更永，沭沂水近是家乡。

甲辰冬离淮二民图像因赋此以冠诸图端

淮民何为图我像，歌谣叹息知我心。
安抚岁余不忍舍，忠厚人情无古今。
迂直动辄与物忤，入祠又将议浅深。
不如随我东归去，朝夕相伴乐清吟。

菊

黄花色雅正，淡淡是其香。
慕色贪香者，往来空自忙。

又

黄花已摘尽，枝叶尚青青。
霜露不相妒，悠然乐此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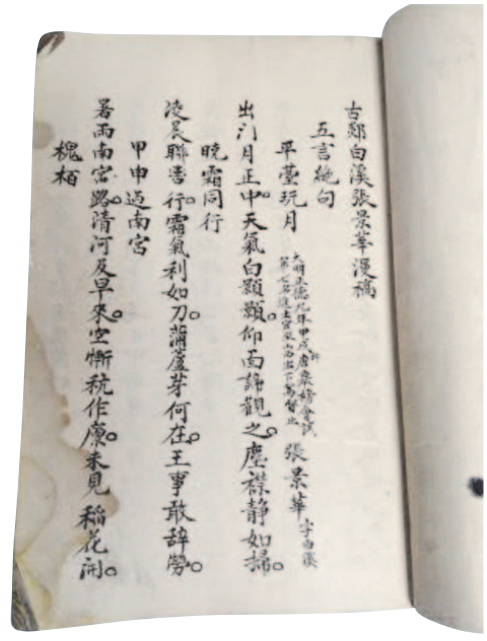
闻　雁

茅檐向晓日，仰视雁排空。
乍离衡阳月，不忘北塞风。

又

鸿雁自南来，鸣声觉似哀。
故乡离别久，鼓翼撞云开。

（李守永提供）



麃孝禹刻石（帖）

徐森玉

此刻左傍有宫本昂等刻跋：“同治庚午，扬州宫本昂、宫昱，任城刘恩瀛访得此碑于平邑。”该石现藏山东省博物馆，不知是否原刻。

由于它在清同治九年（1870）才发现，因而较早的著录都不及记载。陆增祥《八琼室金石祛伪》把它看作伪刻，但又没有说明任何理由：“右麃孝禹阙，上锐下方，似圭形。分书两行，左右各有直界，中空三寸许，上有画鹤，盖赝鼎也。”

相传此刻发现于山东。宫本昂等人的刻跋则载自平邑所得。历史上有记载的平邑有二：《史记·赵世家》：“献侯十三年，城平邑。”此在今河南省南乐县。另一平邑为汉置，后汉初废，在今山西省阳高县西南。此二地都不属山东。汪鋆《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和陈准《函青阁金石记》由于没有注意到出土地点，因而都认为是河南省南乐县的平邑。莫友芝在《金石笔识》中说此刻发现于肥城：“此拓同治九年冬潘伯寅少农所寄，谓肥城所出者。”但肥城古名和今名都非平邑，和宫某等人的刻跋不符。我怀疑莫友芝虽于发现刻石后不久即获得拓本，但由于转相传递，可能把费误作了肥城。刻跋中所记的平邑应该是山东费县西北九十里的平邑集。这个地方在西汉是否也称平邑，目前还没有找到可靠的依据。

河平是西汉成帝的年号。第二列“平”下一字，除莫友芝释为“阴”字外，大都释“邑”字。莫友芝释它为“阴”的根据，是从出土地点所谓的“肥城”引申出来的：“肥城、平阴接壤，盖获诸平阴境，移肥城尔……。”但从目前所见到的拓本看，此字并不像阴。首先由于误费城为肥城，因而平阴的解释显然是无法成立的。汪鋆《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和陈准《函青阁金石记》虽释“邑”字，但都没有说明理由和根据。看来他们由于宫本昂等刻跋既作平邑，而此字又和邑字相像的缘故。但在东汉碑刻中常见到的邑字都并不如此。这里的写法倒和“食”字相近。李翕西狭颂“面缚二千餘人”，餘字的食傍和此极为相似，问题是“平食”更不能解释了。我目前还没有更好的见解。假使说此字确是平邑的“邑”字。那么，由此至少可以得到二个推断：一、汉隶中“食”和“邑”的写法有时是相似的。二、此刻若确是发现于山东平邑的话，那么其地在西汉亦作平邑。“平邑”下一字，由于目前所见拓本损裂较甚，更难释出。《金石笔识》释“庐”。按理说莫友芝所获得的是当时拓本，一定比我们看到的清晰，应该可信。但他释庐的主要根据，也是从平阴而起的：“庐里即广里，光之别体，诸字书所未收。平阴庐里本齐邑里名。”平阴之说既然不能成立，那么所谓庐里（广里）也就无从立脚了。更何况我们目前所见拓本根本就无法确定此字笔划是否作“庐”。但前文提到山西出

土左元异墓石有“西河中阳光里”的字校，可惜未得此石拓本，否则或将有助此字的识别。此字除莫友芝外，大都释“氏”，假使某些看来似乎是笔划的地方确为石花的话，那么释“氏”也还是相近的。问题是“氏里”也不易解释。

“麃孝禹”是姓名。麃姓首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欲以并天下，李斯为舍人，蒙骜、王齮、麃公等为将军。”此外东汉礼器碑阴，侧有“故涿郡太守麃次公”、“故乐安相麃季公”、“故平陵令鲁麃恢无世”。鲁恭王墓石人胸前有“故乐安太守麃君亭长”。可见“麃”在汉代是鲁地的大姓。西汉麃孝禹刻石的发现益能证明这一点。

此刻性质和上文已记述的各种刻石不同，它并不是记事的刻石如群臣上寿刻石、鲁北陛石题字、巴州民杨疃买山记和五凤刻石；也不是题名的性质如霍去病墓石刻字。它似乎属于坟坛、神道额之类。就现有资料来说，它可以看作是东汉盛行的墓碑的先声。

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宫本昂等访得于山东费县平邑集（今平邑县），并于石侧刻跋“同治庚午扬州宫本昂、宫昱，任城刘恩瀛访得此碑於平邑，江曙高文保观。”

（局部）

岁月尘封的钻石机缘

秦承良

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临沭姑娘魏振芳与“常林钻石”的故事名扬全国。殊不知，早在50年代，类似的故事就已在沂南县发生过。故事的主人公名叫马恩普，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加工作的一名老干部，先在沂南、后到蒙阴从事电影放映工作。正是当年常年奔波的农村放映员生涯，成就了马恩普与钻石的机缘。提起当年电影队马队长捡了块金刚石献给国家的事，当地的老人很多都知道。笔者因工作之便，曾多次当面向马老了解当年捡金刚石的经历，今将这段尘封多年的历史往事整理出来呈现给大家。

机遇青睐有缘人

马恩普是济宁人，1949年6月济宁师范毕业后来到鲁中南行署参加革命工作，被分配到沂南县朱家里庄小学教学。1955年3月，沂南县成立电影放映队，他作为当时少有的文化人被选入，被送到山东艺专学习放映技术。学成归来后，他一心投入电影放映事业。1958年撤销沂南县（1961年又恢复建制），一部分划归当时的临沂县，另一部分划归蒙阴县。马恩普被安排到蒙阴县继续从事电影放映工作，一直到1992年从蒙阴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经理岗位上离休，今年已86岁高龄。正是“捡钻石”这一特殊机缘，使马恩普成为当时的“轰动”人物，也为他的人生注入了一段珍贵的回忆。

提起当年的往事，马恩普老人仍然记忆犹新。当时，沂南县电影队仅有一辆马车驮拉放映器材。1956年的冬天很冷，电影队仍像往常一样赶着马车下乡放电影。那天行至沂南张庄，过河时，马车突然陷入泥淖中，情急之下他俯身就往上抬马车，不小心伤了腰，被领导批准在家养伤。这一养就是几个月。转眼到了来年春天。一天，正在沂南县双泉峪子村放映的电影队机器坏了，现场人员怎么也修不好，捎信请在家养伤的马恩普速去修理。接到通知后，他天一放亮就赶着去目的地修机器。当走到隋家店村时，太阳已经升上头顶，突感饥肠辘辘。原来，因走得匆忙，早饭还没吃呢！于是，他顺路拐进一家小卖部，买了几块桃酥。看到离目的地不是很远了，就来到村外，找到一处路边山岗坐下来吃点心。

吃到一半，无意间一低头，地上一群蚂蚁争食遗落桃酥碎屑的场面把他吸引住了。他一边吃桃酥，一边低头循着蚂蚁游走的路线看蚂蚁搬运桃酥屑。突然，一块人的门牙般大小、形状规则、呈典型六面体且有点半透明的小石粒映入他的眼帘。咦！这块小石粒怎么这么像县科普协会里发的小册子上“金刚钻”的样子呢！他迅速捡起了这块石粒，按照从科普知识里了解的知识，他用这枚石粒去划顺手捡起的石英石，轻轻一划就会留下明显的划痕，而用石英石划这枚小石粒，却怎么也划不上痕迹。这更加坚定了他的想法：这应该是一颗“金刚钻”！

谈及当年的科普工作，马恩普老人说，当时沂南县成立了科普协会，他也是这个协会的会员。该协会给每名会员发过一本叫《怎样识别矿石》的科普小册子，那上边就介绍了金刚石的有关知识，而且还配有一些彩色图片。正是因为有平时的科普积累，所以当他看到这枚小石粒的时候，小石粒异乎寻常的透明度、形状和颜色让他一下就想到了金刚石。

来到双泉峪村，马恩普一口气将那台放映机修理完，歇下手来之后，才想起兜里那枚小石粒来。他掏出来给其他两位同事看，说："你们看，我得着宝贝了——捡到了一枚金刚钻！"谁知同事们把嘴一撇，顺手将他那枚小石粒扔出很远，说："啥金刚钻呀！不就是一块滑溜石头嘛！"看到同事们一点没心动，马恩普也怀疑起自己的眼色来：难道真的不是？但出于好奇，他还是千方百计从角落草屑中找回了那粒小石粒，又反复端详，拿它去划玻璃小瓶，小瓶留下划痕，而且还能轻易掰开，这坚定了他的判断，准备找机会向地质队"报矿"。

探矿聚焦沂蒙山

金刚石，俗称"金刚钻"，是自然界中最硬的物质，稀少而昂贵，除作为豪华装饰品外，还具有重要的工业用途，如精细研磨材料、高硬切割工具、各类钻头、拉丝模，更是很多精密仪器不可缺少的部件。

上世纪50年代，随着国家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展开，地质部门在山东展开了大面积的金刚石矿普查，并把重点放在了临沂地区，为此还成立了专门队伍——809地质队。那时候，寻找金刚石矿的地质队员几乎踏遍了沂河、沭河流域几个县的山山水水，甚至足迹还向东延伸到胶东的大小沽河、五龙河以及诸城的七宝山一带，陆陆续续发现了近千个金刚石砂矿点和砾岩，但均未发现作为工业矿床的金刚石原生矿床——金伯利岩。1962年，国家地质部正式下达"金刚石砂矿和原生矿并举"的找矿任务，并派综合地质大队的部分人员来到山东，加强山东找矿的专业力量。1957年成立的809地质队除了继续勘探金刚石砂矿以外，还集中部分技术人员与地质部派来山东的地质专家，组成金刚石原生矿专题研究队。该专题队根据金刚石砂矿的分布情况，初步预测了金刚石原生矿的分布范围，这为后来在蒙阴县常马庄发现我国第一个金刚石原生矿——红旗一号金伯利岩脉确立了正确的探矿导向。

让我们把话题转回来。那年，马恩普从双泉峪子村回到县城家里，为防止小石粒丢失，他找了一个废旧墨水瓶将它精心收藏起来。那段时间，国家地质普查队经常有人来县里探矿，食宿一般都在县招待所里。马恩普就去县招待所找地质普查队，可事不凑巧，地质普查队刚走不久。大概过了半年的样子，他再一次去县招待所时，终于如愿以偿。见到两个陌生的地质队员，他心情忐忑地说："同志，我捡到一个金刚钻！"他们非常惊讶，问："你带来了吗？"当得知没带来时，他们就让他先回去，答应一会去家里看。

马恩普步行到家时，两个地质队员也同时骑车尾随而至。他们看到那个小石粒时，眼睛一亮，说："嗬！还不小来！你卖吗？"马恩普说："卖什么！你们需要就拿去好了。"他们接着说："这个是不是钻石，我们还不敢完全确定，得回去让专家确认才行。我们拿走前，得称称。如果确认是真的，还要对你进行奖励。"在两名地质队员的坚持下，他们去了有天平的县卫生院对小石粒作了称量。后经专家确认，这枚小石粒是一颗天然钻石。之后，地质队曾让马恩普带领到捡到金刚石的现场去过两次，他们将周围作了深入细致的勘察，最后认定那枚金刚石不是当地所产，很可能是早年洪水冲来当地的。不管怎么说，因为这枚小钻石的发现，让地质

队员们更加坚定了去上游流域寻找金伯利岩的信心。

1965年8月24日，红旗一号金伯利岩脉在蒙阴县联城一带被发现，我国没有金刚石原生矿的历史宣告终结，蒙阴县也由此被誉为“钻石之乡”。

岁月沧桑话变迁

2009年5月1日，中国目前唯一的钻石公园——山东沂蒙钻石国家矿山公园，在位于蒙阴县联城镇的701矿遗址正式揭牌开园。至此，这个亚洲规模最大、品位最高的钻石原生矿露天开采遗址，在持续开采28年后第一次揭开了“神秘面纱”，让世人一睹其“庐山真面目”。2012年春，为了整合蒙山旅游资源，临沂市成立了“蒙山旅游区管理委员会”，整合原平邑龟蒙景区、蒙阴云蒙景区、国家钻石公园及柏林镇，组成了统一的蒙山旅游区。今天当人们走近钻石公园、探访神秘的钻石开采现场时，还有多少人能知道当年探矿、找矿的艰辛和那段捡宝、献宝的往事？

当年，马老捡到的那颗金刚石，为艰辛的找矿工作增添了鼓舞，对于校正金伯利岩的探矿方向起到了一定的启示和引导作用，成为当年金刚石探矿史上一个值得写下一笔的重要插曲。至于这枚钻石的具体重量，因年代久远，加上那时也不明白“克拉”之类的计量单位，马老已经记不清楚了。马老只记得，后来沂南县委为表彰他“献宝”有功，作出了三条决定：一是在《临沂大众》通报表扬；二是发个奖状；三是奖励一辆自行车、一块罗马牌手表。但是，这三条决定由于随后撤销沂南县等客观原因很久没有落实。马老随当时的区划调整被并入蒙阴县电影中队。但是，809地质队没有忘记对马老的表彰，专门派人送来了一个镶有毛泽东浮雕石膏像的奖框和400元人民币，说《临沂大众》停刊了，没法再发通报，手表不好买，给钱让马老自己买。马老向我们展示了当年自己用奖金买的罗马牌手表，可惜的是奖框后来搬家时丢失了。当我们问起马老将钻石上交给国家的感想时，他很平淡地说：“那个年代，国家百废待兴搞建设，人人想着为建设新中国做贡献，根本没想要什么奖励或报酬，只是想着向国家‘报矿’是自己应尽的义务。”

光阴荏苒，近60年过去了，马老本人也对这件事的细节也渐渐淡忘了。可追忆起来，个中的内涵和韵味仍让人回味无穷……

山东沂蒙钻石国家矿山公园

追寻远去的“费县八景”

平　凡

明清时期，非常流行“八景”。所谓“八景”，就是在本地众多的风景名胜之中，选定八个最有代表性的美景，分别取上悦耳动听的名字，然后分别题诗。这种给风景选美的做法，是文人骚客的风雅行径。他们闲来无事，品评佳山胜水，吟咏风花雪月，竞相写出花团锦簇的诗文。前人选定了“八景”，后人也不甘落后，又选出“新八景”，层出不穷。

在临沂，最有名的当数“琅邪八景”，分别是：苍山叠翠、神峰积雪、平野晓霁、普照夕阳、孝河凝冰、沂水拖蓝、泥沱月色、野馆汤泉。明代诗人舒祥专门题写了《琅邪八景》诗，流传至今。

郯城县有“郯城八景”，分别是：望海楼朝霞、石门夜雨、仙洞云壑、禹王台柳莺、沂水春帆、白溪秋月、红崖古梅、龙门桃浪。清代诗人屈复题写了《郯城八景》诗。

蒙阴县有“蒙阴八景”，分别是：蒙山叠翠、堂阜遗迹、北麓书堂、蛰山卓笔、中山古刹、龙泉漱玉、汶水拖蓝、南山仙洞。明代的公跻奎、杜洽，清代的刘德芳，都分别题写了《蒙阴八景》诗。

沂水县也有“八景”，叫作“沂阳八景”，分别是：东皋晚照、岜山耸翠、望仙石桥、织女仙洞、龙池浸月、穆陵停雪、闵公书院、沂水拖蓝。明代进士杨光溥写有《题沂阳八景》诗。

莒县的浮来山，有“浮邱八观”，都是三个字的景点，分别是：定林寺、银杏树、舸鸡岩、莒子墓、校经楼、仙书石、清泉峡、怪石峪。清代张竹溪题写了《浮邱八观》诗。

就连临沭县的曹庄镇，也有“曹庄八景”。清朝道光年间，曹庄出了一位进士叫吴步韩，他选定了当地的八个景观，写有《曹庄八景》诗。这“八景”分别是：岌顶腾云、化龙仙迹、东皋返照、西岭积雪、南涧春游、北牖泉声、饮马遗迹、东桥渔唱。

各地都有“八景”，作为“学道名区”的费县，自然也不会例外。

明代嘉靖年间，费县有个饱学儒生叫姚庭槐。他是一位进过国子监读书的贡生，做过州学的“学正”（也叫“学官”，职责是教育州学里的生员，官阶为正九品）。他撰有《曾子南武城考》一文，被收入明万历元年礼部尚书于慎行主编的《兖州府志》卷八《圣贤部》。他还是个诗人，流传下来的

费县八景——玉泉枕流

有一首《抱犊崮》诗：“泉甘田可蓺，高出白云上。我欲宅其巅，尘寰永不向。有路难跻攀，空余翘首望。”

姚庭槐出于对家乡山水的热爱，倾注心血，选定了“费县八景”，并分别题诗。明代万历年间，费县知县杨果主修《费县志》的时候，将姚庭槐编撰的“费县八景”及题诗收入志书之中。

清代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费县知县黄学勤主修《费县志》。他看到各地志书都有“八景”，心生厌恶：“郡邑志多列八景。夫景何必八？又宁惟八？只缘潇湘数幅，相习成套耳。”

黄学勤的责问不无道理：胜景为什么必须是八个？为什么不是七个或者九个？为什么不是十个、二十个？难道只有八个吗？他认为，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八景”，无非是受了“潇湘八景”的影响所致，竞相沿袭模仿，成了俗套。

黄学勤分析得很正确。据宋代沈括《梦溪笔谈》记载，“潇湘八景”原是宋代画家宋迪创作的八幅山水画，即《平沙落雁》《远浦帆归》《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夕照》。书画大师米芾对此极为赏识，专为每一幅画题写了诗序，并为之定名“潇湘八景”。当地官府又在每个景点立碑建亭，扩大影响，引起世人关注。自此以后，各地纷纷学习借鉴这种做法，于是出现了“燕京八景”、“淞沪八景”、“关中八景”、“羊城八景”、“姑苏八景”等等，不一而足，致使“八景”品牌泛滥，遍及全国。

黄学勤是一位方正严肃、很有品格的知县。他修纂县志，遇到了资金不足的难题，有人建议，可以让有钱的大户人家捐资，用现在的说法就是“拉赞助”。黄学

勤不同意。他认为，如果接受了捐资，“则志将有不可问者矣”。他虽然过着“食无兼味，衣必浣濯”的紧日子，却把朝廷给他的养廉银全部捐献出来，用作修志经费之需。

黄学勤对于志书内容的取舍，把关很严：“征文考献，取其有关名教，而浮华之辞所不录矣；节义孝行，取其实绩辉煌，而附会之说所必诎矣；古迹先贤，取其经史可据，而传闻之误所必拆矣。”

对于《万历费县志》中的“费县八景”，黄学勤不以为然：“费之八景，原系老儒姚庭槐所编，各题以诗。今并删之。”于是，黄学勤把《万历费县志》所收录的姚庭槐辛辛苦苦编撰的“费县八景”及题诗，统统删掉，没有收入新修的志书之中。他也知道费县有很多美景：“费虽小邑，佳山秀水，不胜纪录，取其最有名者载之。”（《康熙费县志》卷之一《山川》）他没有按照“八景”记载，而是代之以《山川》，将有名的山水一一罗列。

黄学勤修纂志书不尚浮华俗套、反对传闻附会的做法，固然令人佩服和景仰。但是，作为留传下来的前朝文字，毕竟是一段珍贵史料，不应该就这样轻易删掉。他一概排斥“八景”，不仅显得过于武断，也未免带有个人好恶的成分。历览全国各地的“八景诗”，其作者也许不是知名的大诗人，却是当地的文化名人。他们热心编撰自己家乡的“八景”，是一种家乡情结，是爱家乡的表现。他们选定的景观，也许并不多么优美、多么突出，可能带有一些夸张成分，却被当地人所喜闻乐道，是地文与人文的集中表现，是当地的一张文化名片。

非常令人惋惜的是，黄学勤主修的《康熙费县志》没有收录姚庭槐的“费县八景”，而收录了姚庭槐“费县八景”的《万历费县志》却不幸失传了。如今，费县所能看到的古代县志，只有《康熙费县志》和《光绪费县志》，明代姚庭槐编撰的“费县八景”到底是哪八处景观，也就无人知晓了。估计，上冶镇的“玉泉枕流”应为八景之首。

近年来，有人效仿古人，编撰出了“费县十景”，分别是：玉泉枕流、桃源仙景、水映万松、泉石琴韵、娄瑾洞府、古城风韵、蒙山滴翠、文山秋霁、蒙山古道、漏泽春色。这十处景观，分别是上冶的玉泉观、许家崖的仙人洞、城北的万松山乾隆行宫、朱田的苑上、朱田的楼景洞、上冶的古鄫城、县境北部的蒙山、县城南面的文山；“蒙山古道”是指蒙山前的古驿道；“漏泽春色”是指漏泽湖，位于费县西北130里（今属泗水县），今已无存。不知道姚庭槐的“费县八景”是不是都包含在里面了？可惜至今没有人给这“十景”题写出脍炙人口的好诗。

沂蒙革命根据地略影——

巾帼铁流（一）

海 涛 高 雷 国 英

这是一组特殊的人群，一群女性在民族危亡、国难当头的时刻，肩负起了战士的责任，用青春、生命、尊严抒写了壮丽诗篇。

她们是沂蒙抗战的英雄，她们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建设的功臣，她们是“识字班”的创造者，她们是沂蒙“红嫂”的引路人。她们就是那些在开创沂蒙革命根据地中作出卓越贡献的女共产党员，女八路军。

沂蒙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一条主线：那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两个亮点：统战工作与妇女工作。作为妇女工作的领导，她们及其她们的事业是共和国建立的一块基石，也是沂蒙抗战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即将迎来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本刊从本期起将对她们做重点介绍。

林月琴与罗荣桓及子女在鲁南行军途中

陈若克与朱瑞在沂蒙山区

林月琴（1914–2003），安徽金寨人，1930年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1月，林月琴随红四方面军主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经何长工同志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12月，调中共中央妇女部工作。与时任军委后方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相识并结婚。1939年3月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司令部直属队分总支书记。1939年秋进入鲁南，1941年4月至1942年底，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治部组织部干部科干事、副科长，1943年1月任山东军区司令部机要科政治协理员，1945年10月离开临沂，进军东北。1955年林月琴被授予大校军衔，当时在全军女同志中属唯一的一个。

陈若克（1919–1941），广东顺德人，出生于上海。16岁参加上海工人运动，1936年8月23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8月1日与朱瑞结婚。1939年6月与八路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朱瑞一起到鲁中，任山东分局妇女委员、山东省妇女救国联合会常委、山东分局组织部科长等职。1940年秋山东省各界联合大会开幕时，被选为临时参议会的驻会议员。她发动中老年妇女参加抗日救国会；发动青少年妇女成立青妇队、识字班和姐妹剧团，演出街头剧、小话剧、歌舞等，使当时山东妇女工作取得可喜成绩。1941年11月，在蒙阴大崮山反“扫荡”突围时落入敌手；11月26日，和她刚刚出生不久的孩子被日寇杀害，牺牲时年仅22岁。

吴仲廉与江华

吴仲廉（1908–1967），湖南宜章人，八路军女将领。1927年4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1934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11月，随西路军在甘肃河西走廊陷敌重围被俘，1937年8月，经周恩来营救返回延安。1938年夏与江华结为夫妻，同年12月开赴山东抗日前线沂水，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兼秘书长。1939年9月出任八路军苏皖纵队（陇海南进支队）政治部主任。1940年4月返回山东纵队，参与了沂蒙山区的反扫荡斗争。1943年冬离开沂蒙山区去延安。1952年，吴仲廉出任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成为新中国担任这一高职的第一位女性。

杨岗与张经武在沂水结婚纪念

杨岗（1920–2005），祖籍山东新泰，出生于辽宁省公主岭。济南女子职业学校、南京妇产科学校毕业。1938年5月参加八路军，为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一团宣传员，7月在八路军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9月入党。毕业后任中共沂水县委妇女部长，中共山东省委妇委巡视员，期间与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司令员）张经武在工作中相爱并结为伴侣。1939年11冬随张经武率山东代表团赴延安出席中共七大。1946年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党校宣传干事，1948年任中央军委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政治处副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军委人民武装部政工科长。

王新兰（右一）与萧华（前左二）在滨海参加整风学习

王新兰（1924–），四川宣汉人，9岁参加红军，11岁随红四方面军长征。曾任红四方面军红四军政治部宣传员、1939年11月21日在冀鲁边与萧华结婚。1940年，王新兰被任命为一一五师政治部新闻电台报务主任，第二年从山东分局党校毕业，随师部转战沂蒙山区。1945年9月离开临沂，奔赴东北。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交通外事处处长、总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总政治部主任办公室副主任、兰州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兰州军区后勤部顾问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

王小古年谱（中）

刘瑞轩

1946年　丙戌　32岁

由骆素农介绍，到灌云县南城小学，任级任老师，每月薪水200斤小麦。因人事不合，又转到新浦新化小学做级任老师。

1947年　丁亥　33岁

由顾廷藻介绍，到墟沟北城小学任教。为招待毕业生家长，编写一个反间谍剧本《感情与理智的搏斗》，并亲自饰演戴笠一角。受到观众欢迎。

8月，为44师师长王泽濬作写意《虎》一幅。

1948年　戊子　34岁

由王蔚华介绍，到新浦东海县中任美术教师。

由校长杨岳南、东海县长周天和驻军师长王泽濬赞助，与沭阳县画家仇拔（字瑞平）联合举办画展。小古参展30幅花鸟画，仇拔参展50幅古代人物画。画展在各界影响很大，好评如潮。当时，每幅画价值一匹洋布。小古共得30匹洋布。这次展览，标志着小古的画已由学习阶段迈入创作阶段。

是年秋，新海连市（1961年改为连云港市）解放。

任新浦新海中学教师，教语文、美术两课。

该校为省重点中学。市长杨祖彤任校长，文教局长曹伯衡任副校长。为配合政治宣传，校经常演剧（《白毛女》《血泪仇》等）和舞蹈。小古负责化妆。

1949年　己丑　35岁

由教导主任杨文雄介绍，加入中苏友好协会。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小古以饱满热情，创作很多花鸟作品，并组织学生以绘画、诗歌形式歌颂共产党和新中国。

因爱好京剧，结识了京剧名旦王素芳。

长女锦文出生。

1950年　庚寅　36岁

由何建东介绍，加入中国教育工会。

1951年　辛卯　37岁

经领导同意，回灌南与原配李寿祥离婚。

为配合“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等运动，创作了不少宣传画、漫画。

1952年　壬辰　38岁

山东临沂地区文教科利用暑假举办教师集训班。当时新海连市属临沂行署管辖，小古来临参加集训。文教科马科长赏识小古的绘画才能，便调他来临沂师范任教。小古携长子开微同来。开始教语文，1956年后专教美术。

三子开端出生。

1953年　癸巳　39岁

被领导派往山东师范学院中教进修班学习。同去的有党延凯老师。

进修班主要是学习政治，课目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等。通过学习，小古思想进步很大，他在学习结束时做的思想总结中写道：“我在旧社会有封建名士的思想和作风，想通过画国画成名成家。通过这次学习，我认识到超阶级、超政治的艺术是没有的。今后要将个人爱好的艺术，变为大众爱好的艺术，要按照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教导的，为工农兵服务，向群众学习，向生活学习，建筑我的新的艺术生命。”

院长余修（后调任副省长）爱好书画，在壁报上看到小古的画作，十分赏识，鼓励他继续努力，并向他索画。

经党延凯（其父是丹青能手）介绍，小古结识了泉城几位有名望的画家和领导。有王天池、黑伯龙、卓其俊等。黑、卓并将自己在各地写生的画稿赠给小古。

进修班结业后，仍回临沂师范任教。

本校教务员宣锦芳（女）拜小古为师，业余学国画。教授的方式是：（一）在小古所教的两个后师班（即一届甲、乙班）进课堂跟班学习；（二）在宿舍个别指导。小古把石膏像、静物、盆花等安排在宣家，指导练习素描或彩画。学习从本年起到1956年。

期间，小古为宣锦芳的丈夫郑瑞浩老师画一幅素描半身像，为他拉二胡的儿子画了一幅国画，题为《小小音乐家》。

课余，小古爱好很多。除下棋、打篮球外，有时还请别人拉胡琴，他唱京剧。在全校文娱演出时，饰过《捉放曹》中的陈宫，颇受欢迎。

八路军五纵三支队的组建与发展

霜林醉

新四军九旅（原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进行村落战训练

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的组建和发展

1938年12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决定成立陇海南进游击支队，以钟辉为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和苏皖特区军政委会书记，梁海波为副司令员，李浩然为政治部主任，张震寰为副主任兼宣传科长（1939年4月兼任政治部主任）。梁、李为军政委员会委员。支队任务是出山东，入徐海，统一领导邳睢铜、海灌沭地区的游击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

12月4日，钟辉、梁海波、李浩然、谢锡玉等一行21人，从沂水县岸堤镇出发，途经费县、苍山到达邳县铁佛寺，和地方武装党负责人张芳久、栗培元、冷启英等见面。12月21日，在邳县许楼将邳睢铜地方武装（邳县抗日救国团抗日义勇队、睢宁独立大队、铜山抗日游击队）组建为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支队暂设一个团（辖两个营，未设团部），共约300多人。一营营长谢文秀、教导员谢锡玉；三营营长刘文焕、教导员周瑞迎。

钟辉一行南进，与沿途地方党和抗日群众团体共同努力，发展壮大队伍。

先后整编、组建了南进支队第一团第二营（营长滕玉荣、教导员盛志明）、机炮连、第八大队，独立第三营（营长毛洪烈、政委杨汉章），独立第4营（营长朱宏善、政委张剑秋），第一团第一营第四连（回民连），铜山独立大队（大队长梁广洁），邳县独立团（团长栗培元、政委马骏）、第三大队（队长杨信、政委韩去非）。

1939年4月，南进支队根据斗争的需要，决定成立先遣第一梯队，由李浩然任梯队长兼政委。第一梯队由“南支”一团三营九连69人与苏皖特委（隶属中共山东分局）机关干部组成。4月19日于邳北泇口埝出发，越过陇海线，20晚进入邳南炬山以东的杲堂子，会见了睢宁独立营长夏玉华和进步人士杲益斋等人。九连与睢宁独立营会合，梯队达200人。不久梯队基本控制了邳睢铜中心地区。到1939年9月，在半年的时间内，第一梯队发展到两个营、七个大队、一个教导队，共1500多人。在扩大武装的同时，充实了领导机关干部，任命叶道友为先遣第一梯队副梯队长，胡笳（女）为政治处副主任，李凤（女）为梯队教导队教导员。苏皖特委宣传部长吴倩（女）也随队工作。

4月下旬，南进支队又组织了先遣第二梯队，关云培任梯队长，陈书同任政委，辖支队独立第三大队、独立第六营，活动于宿迁北部、邳县东南部和沭阳西部地区。在斗争中队伍发展到400余人，开辟了与邳睢铜相邻的一片地区。

1938年底至1939年初，活跃在东海、灌云、沭阳地区十余支游击队先后派人到山东、南进支队、苏皖特委汇报情况，请求派人加强领导。1939年3月，南进支队和特委决定成立南进支队第三团。4月下旬，第三团在沭阳县李恒庄成立，汤曙红为团长，周瑞迎为政委，张克辛为副团长，陈飞为政治部主任。下辖四个营，全团共1500余人。7月17日，团长汤曙红被国民党沭阳常备队诱骗杀害。后三团主力撤离淮海，同时任命张克辛代理团长（不久派杨志雅任团长），政委周瑞迎调走，由盛志明担任（不久，盛调走，由杨纯兼任）。

1939年2、3月，苏皖特委和南进支队先后派特委组织部长张芳久、独三营政委杨汉章到淮（阴、安）、涟（水）、泗（阳）地区领导当地党组织和已发展的抗日武装，队伍很快发展到近1000人，编为南进支队第八团，又称先遣第三梯队。

陇海南进支队自1938年12月成立，到1939年9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即由300余人发展到3个主力团7个营、4个独立大队、2个先遣梯队，共7000余人，初步开辟了邳北游击区和邳睢铜抗日根据地。

十八大队的组建与发展

1937年10月，爱国进步青年孙象涵在家乡铜山县七区桃山集组建了拥有80名队员的“桃山抗日游击队”。1938年7月下旬发展到200人，遂编为大队，下辖3个中队。7月末，中共肖县工委根据上级决定，将桃山游击队命名为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第十八大队（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对所属各县抗日武装定的统一编制，鲁南各县游击队编为一总队，丰、沛、肖、砀等县游击队编为二总队），并要求大队去肖西与十七大队会合。两大队会合后组成抗日义勇队二总队第三支队。

1938年10月，由于十七、十八大队发展较快，人数增多，肖县中心县委进行再次整编，正式成立二总队第三支队。孙象涵任支队长，尹易生任教导员。同时抽调队员和干部组建十九大队，许致远任大队长，孟献珍任政治指导员。12月底，肖县的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与宿县的二十一、二十二共六个大队奉命北上，与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会合整训。1939年2月中旬，十八大队返回肖县。

1939年春，苏鲁豫支队挥戈南下，越过陇海路，向津浦路挺进。为适应新的形势，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东西分进，以建立新的游击区。3月18日前后，孙象涵副总队长率

警卫连、第二十四大队、王广涛大队东进津浦路东，称为“东进队”。由十八大队的老骨干亢为德发展的二十一大队和韩石匠组建的二十二大队归建。5月13日，孙象涵率领的东进部队，奉命返回路西与二总队主力会合，在肖二区梧桐、陶墟、土型一带进行整编。肖县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正式改编为“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游击七大队”，大队长耿蕴斋，副大队长孙象涵、政委兰庭辉。下辖3个营，每营4个连。这次整编后，部队直接归属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标志着部队诞生以来的一个重大发展。

“六抗”三支队的组建与发展

抗战爆发后不久，原徐州特委委员孔子寿、匡亚明与赵汇川等取得联系，商量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成立了“宿县抗敌救亡社”，两个月后发展社员700多名。1938年1月，与中共苏鲁豫皖特委书记郭子化取得联系，恢复和发展宿县党组织。利用动委会这个统战的合法组织，深入群众，组织联庄会、抗日人民自卫队。1938年5月，徐州、宿县相继沦陷。赵汇川在宿西组织抗日游击队；戴晓东在宿东发起组织3个大队，共300余人，成立了宿东抗日支队。大队长分别为：王烽午、王民生、王恒兆。同时，在宿县南蕲县集，王峙宇、张幼斌等也组织了100余人的抗日游击大队。

1938年11月，这几支游击队开到宿县路西和宿西部队会合成立宿县抗日游击支队。会合后攻打古饶集据点未果。战后，一部分青年学生离队去延安。后接特委指示，由沈连成、董畏民率领两个大队前往丰县后编入了苏鲁豫支队。赵汇川继续坚持宿县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1939年1月，赵汇川前往泗县双沟，在皖东北第六行政区专署秘书、中共皖东北特别支部书记江上青的协助下，与盛子瑾商谈，达成协议。将宿县的抗日游击队编为安徽省第六专区抗敌指挥部三支队（简称“六抗”三支队），赵汇川为支队长。支队下设七、八、九三个大队和一个特务连。第七大队长王恒兆，第八大队长解冠球，第九大队长尹瑞久，特务连长赵巨川。“六抗”三支队成立后，连续作战，不断打击敌人，扩大了影响，提高了部队战斗力。

三路并进　奔向皖东北

1939年4月21日，中共发出《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及毛泽东《关于八路军今后主要发展方向是华中》的指示。中共中原局、山东分局及八路军一一五师坚决贯彻中央的战略方针，派出部队东进和南下，到1939年下半年，已形成了八路军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新四军六支队四总队协同作战，共同开创皖东北根据地的局面。

1939年6月初，在粉碎张山集日伪七路围攻之后，七大队随苏鲁豫支队主力返回路西肖、永、砀地区活动的休整。一一五师作出苏鲁豫支队分兵开辟根据地的部署。一部分向豫东发展，一部分返回陇海路北，再次挺进津浦路东，开辟皖东北根据地。

8月中旬，游击七大队于灵北大路集进行扩编。此时，第一次东进时留下发展武装的纷纷率队归来，有500多人。这次整编，大队部机关按正规团队建立，部队除原有三营改为一营外，又新组建二、三营，上级正式命名为“苏支”第四大队。任命孙象涵为大队长，钟玉祥为副大队长，杨明卿为参谋长，梁鸿志（即顾寒星）为政治处主任。

10月10日，冯庙战斗的胜利，标志着四大队战斗力的提高。11月，吴法宪奉命返回陇海路北。支队为了四大队的发展，决定四大队改为苏鲁豫支队独立大队。这支游击队经过两年多的时间锻炼，终于成为一支八路军的正规部队。

1939年2月，朱伯庸受皖东北特支书记江上青的委托第三次赴鲁南，请求上级党组

织派人加强皖东北地区的领导。同月下旬，山东分局统战部长郭子化和淄博特委书记金明派组织部长杨纯（化名陈光薇）随朱伯庸前往皖东北。3月，成立中共皖东北特委，书记杨纯。特委积极为进入皖东北地区的“苏支”筹集给养。5月，经中共山东分局批准成立中共苏皖边区委员会，书记金明，委员李浩然、邵幼和、张彦、张克辛、杨纯，统一领导苏皖边区党的工作。下辖邳睢铜、海沭、淮沭、皖东北4个地委。

1939年9月，为统一指挥苏皖边（皖东北）部队，决定成立八路军苏皖纵队。任命江华为司令员兼政委，同时将陇海南进游击支队正式命名为苏皖纵队陇海南进支队。将先遣一梯队夏玉华部编为纵队特务营。10月，南进支队直属部队和3个主力营随苏皖纵队司令部，由江华率领，南下灵璧、泗县、泗阳一带活动。

1939年7月，根据中原局的指示，新四军游击支队派豫皖边省委书记张爱萍与游击支队政治秘书刘玉柱前往皖东北地区，与盛子瑾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成立了八路军、新四军驻皖东北办事处。8月，经张爱萍、杨纯电请中共山东分局批准，中共苏皖区党委机关从邳睢铜地区南移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驻地张塘。

1939年12月，新四军六支队派张太生同6支队主力第1团及党政军干部120人到皖东北去开展工作。为统一进入皖东北地区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指挥，1939年12月26日，中原局指示，成立苏皖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张爱萍，委员金明、江华等。决定将“六抗”三支队及其它地方武装统一编成新四军六支队第四总队。

至1939年底，八路军苏皖纵队陇海南进支队、苏鲁豫支队一大队的独立大队、新四军六支队一团、“六抗”三支队、特务支队、泗北农民支队等在皖东北的部队，统一了指挥关系。

1940年2月，新四军六支队四总队宣布成立，张爱萍任总队长兼政委。“六抗”三支队改为十一团，特务支队改编为十二团，石青的农民三支队与淮北独立团合并改编为总队独立团。原七、八、九大队依次改为一、二、三营。2月底，苏鲁豫支队独立大队改属于苏皖纵队，命名为苏皖纵队第一团，任命孙象涵为团长。

1940年2月，大柏圩战斗后，苏皖纵队派李浩然在双蔡圩一带发展的蔡玉辉等人领导的抗日武装300多人，与运河支队合编为苏皖纵队第二团。

3月28日，中原局任命刘瑞龙、金明、张爱萍、江华、谭希林、田文扬等组织苏皖军政党委员会，刘瑞龙为书记，张爱萍、江华为副书记，统一领导和指挥苏皖地区军队和地方工作。

3月，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一纵队派韦国清（时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副校长兼教育长）到南进支队任政委。4月初，南进支队回到皖东北。

4月初，肖县常备队第五营（教导员兼营长沙风）编为苏皖纵队第一团第一营，将原一团一营分别补充到二、三营，任命沙风为副团长兼一营营长。

5月，国民党江苏省保安第三纵队司令王光夏受韩德勤之命，率万余人向皖东北大举进攻。刘少奇与军政党委员会决心组织安河自卫反击战，速调返回鲁南的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一大队和南进支队星夜赶赴皖东北参战。并集中八路军苏皖纵队一团、新四军六支队一团（张太生部）、四总队全部，全线反击。历经13天激战，终获胜利，歼敌千余人。

朱湖臧桥整编， 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三支队诞生

开辟皖东北的是八路军、新四军多支部队多系统共同进行的，虽然大家能协同作战，但因各有各的隶属关系，有时统一指挥，紧密配合不够。1940年6月6日，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建议统一指挥、统一领导。经中央同意，于6月下旬，进行了一次整编。

八路军五纵三支队成立纪念合影

苏皖纵队将一、二团与南进支队合编，仍用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番号，钟辉任司令员，韦国清任政治委员，孙象涵任副司令员，张震寰任政治部主任，杨志雅任参谋处长。支队下辖两个团：第一团由原苏皖纵队一团改编，孙象涵兼任团长，李浩然任政委，沙风任副团长，杨明卿任参谋长，梁鸿志任政治处主任。第二团由南进支队主力与苏皖纵队二团一部编成，“南支”一团编为一营，三团编为三营，苏皖纵队二团编为二营（南支和苏皖纵队余下部队仍在原地坚持武装斗争）。翁徐文任第二团团长，谢锡玉任政委，严光任参谋长，胡发祥任主任。

同时，八路军总部决定撤销苏皖纵队，江华司令员兼政委及纵队机关干部调回山东，另行分配工作。“南支”整编后，钟辉率二团一、三营中的3个主力连队护送江华回山东，并参加八路军第一纵队党代会。会后奉命到延安学习。支队由韦国清任司令员兼政委。

1940年7月21日，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山东分局书记兼一纵队政委朱瑞致电韦国清并告胡服、彭雪枫并报中央军委、集（十八集团军）总、中原局，决定陇海南进支队正式拨归中原局建制，归胡服直接指挥与领导。

1940年6月，八路军第二纵队政委黄克诚奉命率三四四旅（辖六八七、六八八、六八九团）、新二旅（辖五、六两团）共5个团和教导营共1.2万人，分两个梯队南下华中，抵达新兴集附近，与六支队会师。6月27日，中央军委发布两部合编的决定，7月2日，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下辖4个旅，即二旅（原新二旅）、四旅（原三四四旅）、五旅（原六支队一、二团）、六旅（原六支队三团和第一、三总队各缩编的一个团组成），另设边区保安司令部，领导和指导地方武装。

7月27日，黄克诚奉中原局指示，率二旅、四旅（六八七团）及原八路军第二纵队领导机关离开新兴集，执行“向东发展”的任务。为此，八路军第四纵队重新整编，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仍兼政委。

8月16日，经中央同意，中原局决定以新二旅、六八七团、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合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以黄克诚为纵队司令员兼政

委，下辖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共9个团，执行东进战略任务。第四纵队余下部队整编成3个旅，由彭雪枫司令员率领，执行向西防御任务。

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由苏鲁豫支队编成，第二支队由新二旅、六八七团编成。第五纵队第三支队由第六支队第四总队和陇海南进支队合编而成。8月30日，在朱湖臧桥（今属江苏泗洪县）召开合编成立大会，任命张爱萍为司令员，韦国清为政治委员，孙象涵为副司令员，张震球为政治部主任，张震寰为政治部副主任，杨志雅为参谋处长。

南进支队第一团改为三支队第七团，孙象涵兼团长，李浩然任政治委员，沙风任副团长，顾寒星（即梁鸿志）任政治处主任；南进支队第二团改为三支队第八团，翁徐文任团长，谢锡玉任政治委员，严光任参谋长，胡发祥任政治处主任；新四军六支队四总队十一团改编为三支队第九团，赵汇川任团长，蔡明任政治委员，柯俞强任参谋长，孙朝旭任政治处主任。第三支队司、政、后机关以陇海南进支队机关为主组成。随后第三支队东进淮海，开辟盐阜，迎接新四军渡江北上。

皖南事变后，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三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第九旅，下辖的七、八、九团分别改为第二十五团、二十六团、二十七团。张爱萍为九旅旅长，韦国清为政治委员，杨志雅为参谋处长，张震球为政治部主任，张震寰为副主任。任命李浩然为二十五团政治委员，沙风为副团长，顾寒星（即梁鸿志）为政治处主任（不久任命徐体山为团长）；翁徐文任二十六团团长，谢锡玉为团政治委员，严光为参谋长，胡发祥任政治处主任；赵汇川任二十七团团长，蔡明任政治委员，徐志彬为副团长，柯俞强任参谋长，孙朝旭任政治处主任。

1941年9月，新四军军部电令：为便利指挥起见，将四师十旅划归三师建制，三师九旅拨归四师建制，原旅团番号不变。同时任命张爱萍为三师副师长，韦国清为九旅旅长，十旅政治委员康志强为九旅政治委员。此后九旅隶为四师建制，直到抗战胜利。解放战争时期，九旅先后改编为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九旅、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六师、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二十一军六十三师。建国后，先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和武警六十三师。

2006年8月，泗洪县人民政府在朱湖臧桥村建立“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三支队合编成立旧址”纪念碑亭，碑名由张爱萍将军的夫人李又兰题写。

姓氏百家漫谈——吴姓（上）

赵丹峰

一、吴姓渊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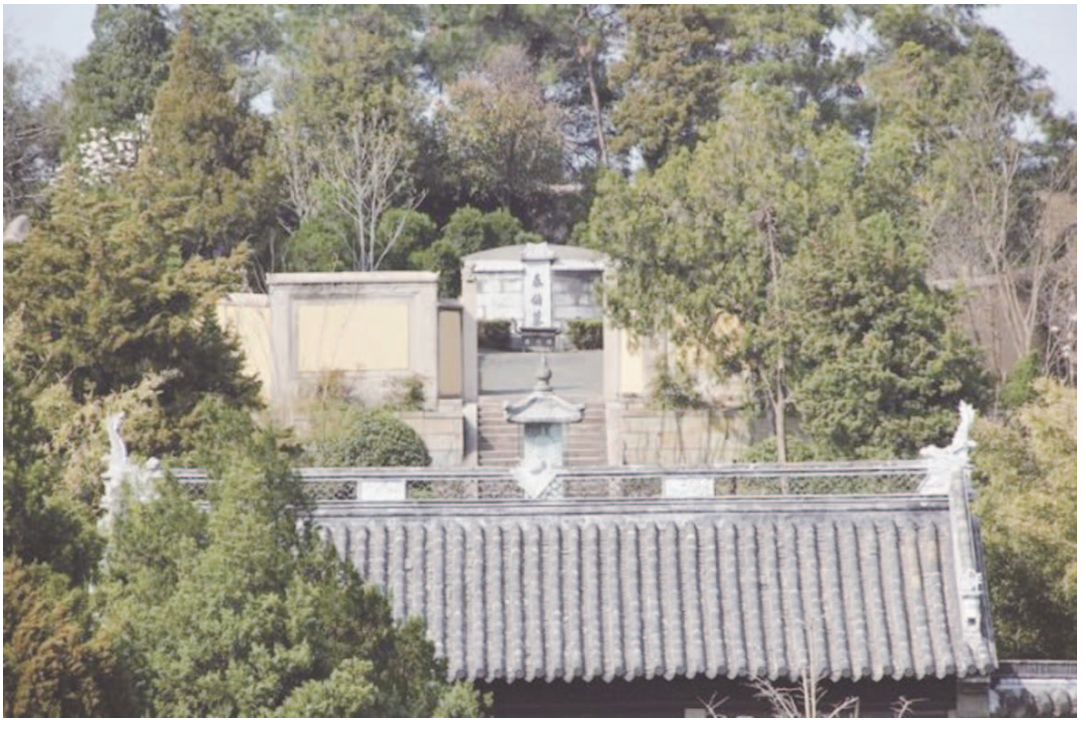
吴姓系中华大姓之一，其得姓大致有五大来源：

其一是出自舜帝有虞氏。因“虞”与“吴”音相近，故而舜的后裔有吴姓。

其二是颛顼时有一位名臣叫吴权，其后裔便以吴为姓，传衍至今。

其三是夏代少康帝时，有一位神箭手叫吴贺，其后代亦以吴为其姓氏。

其四是黄帝轩辕氏的后裔，出自姬姓，系以国为氏。史载，黄帝的第十二世孙周太王（即古公亶父）建立了周部落。周太王的几个儿子中，数小儿子季历才干出众。季历生子名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姬昌出生时有圣瑞出现，所以太王便十分喜爱这位孙子，属意让姬昌接其位。太王的长子泰伯和次子仲雍心胸豁达，主动让贤，为断绝别人想拥立他们的念头，遂离开自己的部落而奔荆蛮，并文身断发，遵行了当地土著民族的习俗。周部落的人们见状，只好拥立季历和他的儿子姬昌为周部落首领。泰伯和仲雍定居于梅里，即今江苏无



锡东南的梅里乡，旧称为泰伯城。泰伯兄弟如此仁义，方有了司马迁《史记》中“三以天下让”的感人故事。泰伯兄弟到荆蛮后，不久便被当地居民推为首领，他们自号句吴，辖区为今江苏苏州、无锡一带。泰伯死后，由仲雍继位。周武王灭商后，封当时在位的句吴首领周章（系仲雍三世孙）为诸侯，改国号为吴，同时追封泰伯为吴伯。当传至吴王寿梦时，吴国已很强盛，并接连破楚胜越，北上争霸。寿梦有五子，其第四子季札最富才干。寿梦欲将王位传给他，但季札不肯就王位，于是逃至延陵（今江苏常州市南淹城），史称延陵季子。周元王三年（公元前473年），吴国为越国所灭。季札的子孙因为不住在吴城（今江苏苏州市），方幸免于难。为怀念故国，其后代便以国为氏，称吴氏。当今吴姓中的大多数居民，均源于这支吴氏。

其五，在当今一些少数民族中，如锡伯族、朝鲜族、赫哲族中，亦有一批居民以吴为姓。

二、吴姓郡望与堂号

吴姓族群在发展中，形成了诸多郡望，较著名者有延陵吴氏、濮阳吴氏、渤海吴氏、陈留吴氏、吴兴吴氏、汝南吴氏、长沙吴氏和武昌吴氏等，其中以濮阳吴氏和长沙吴氏为显。濮阳吴氏的开基人系东汉广平侯吴汉的裔孙吴遵。长沙吴氏的开基人系西汉长沙王吴芮。

吴氏堂号众多，延陵堂是其中较为著名者。该堂号的得名与吴王寿梦的第四子季札有关：季札以贤德著称，被后人誉为“至德第三人”，因其封邑在延陵而有此堂号。

三、族群繁衍与发展

吴姓得姓于江南地区。吴国亡后，吴姓族群除继续在今江苏、浙江原江南地区繁衍生息外，不少支派又迁往安徽、山东、河南、山西等地。秦末汉初，因吴姓族人参加反秦起义，且因战功被封王侯，从而大大推动了吴姓家族的发展。南朝时，吴姓已衍居于湖北和四川。至唐代，吴姓族人已迁入福建。宋、元时期，已遍布东南和华南广大地区，如元代礼部员外郎吴光斗，即是从大陆迁入台湾的第一人。到明末，已有大批吴姓人士迁往澎湖列岛和台湾本岛谋生，有的则发展成为台湾的名门望族。如曾任国民党中央主席、现任国民党名誉主席的吴伯雄，即出身于当年大陆迁台后发展起来的台湾吴氏望族。另有一批吴氏族人，分别迁徙到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发展。季札的第五十世孙吴权，于公元939年在越南建立了当地最早的独立王朝——吴朝。南越政权的最后一位总统吴庭艳即是吴权的后裔。近现代以来，又有不少吴姓人士移居欧美澳等地区。现在，吴姓总人口已发展到2400余万人，人口规模在全国各姓氏中居第十位。

四、吴姓名人纪略

吴姓系中华大姓，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吴姓族群先后走出了一大批彪炳史册的名人，现择要述之。

说起吴姓名人，应首推战国时期的吴起。吴起，世称吴子，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西部）人，系战国时期卓越的军队统帅，最为杰出的军事理论家（时称兵家）和政治改革家之一。年轻时，胸怀大志的吴起赴鲁，投师于孔子弟子曾参门下研习儒学，因聪颖好学，在曾子诸徒弟中属小有名气者。其间，娶齐国大夫田居的女儿为妻。因母丧时未回家奔丧，遂为极重孝道的曾门所不容，被曾子的次子曾申所逐。此后，即弃文

修武，发愤研读兵学。后经鲁相国公义休举荐，被鲁元公拜为大夫。周威烈王十四年（公元前412年），齐国举兵犯鲁，鲁国国君欲拜吴起为将，但考虑到吴起的妻子系齐国人，故犹豫不决。吴起极想通过抗齐来展示自己的才干，以此取得功名，于是便决然杀死妻子，以此证明自己忠于鲁国，史称“杀妻求将”。此举多受时人与后世非议，对其日后的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吴起被任命为将军后，凭着卓越的军事指挥才干，很快将来犯的齐军击溃。尽管吴起为保卫鲁国立下殊功，但鲁元公由于听信了一些臣僚关于吴起“为了功名残忍杀妻和母丧不归，此人不可重用”的进言，不久就解除了吴起的职务。吴起久闻魏文侯有贤名，能知人善任，遂离鲁去魏。魏文侯是位精通儒术、求贤若渴的君主，他十分赏识吴起的才干，便任命他为将军，吴起率军与秦国作战，每战必胜，连克城邑五座，一时声威大振。魏文侯又命吴起守西河（今陕西华阴北部）。据史载，此期，吴起曾先后“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使魏国“辟土四面，拓地千里”。魏文侯死后，其子武侯即位。魏相公叔畏忌吴起的才干，便设计离间并疏远了魏武侯对吴起的信任。无奈之下，吴起只好离魏赴楚。当时的楚国，幅员辽阔，东至大海，南达苍梧，区域主要包括今鄂、湘、赣、皖、苏、浙等广大富庶地区，为战国七雄中国土面积最大者。吴起到楚国后，楚悼王马上便委其以重任，命他为宛地（今河南南阳）守。到任后，吴起带领军民发展经济，巩固边防，时间不长，即使宛地呈现出一片升平景象。楚悼王对吴起的卓越才干甚为欣赏与赞许，从国家发展大计考虑，遂破格任命吴起为令尹。令尹是楚国设置的臣将中的最高官职，执掌国家军政大权，系楚王治国的首辅与军队最高统帅。吴起既感恩于楚悼王对自己的高度信任与倚重，又深感此职责的重大。他决心不辱君命，在楚国进行一场巨大的社会政治变革。吴起变法的主要内容与举措有：其一是“明法审令”“要在强兵”（此内容在后面有较详记述）。其二是推行了“废公族疏远者”的政策。楚悼王即位后，楚国一直受到新兴的三晋（即春秋末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国后形成的韩、赵、魏三个新立国）的军事威胁，为求国之安宁，一直靠送礼求和。但楚国的贵族们却置国家危难于不顾，仍然腐败享乐，不思报国。吴起上任后，即在楚悼王的支持下，宣布废除原行的世袭分封制，规定封君凡逾三世者皆要取消爵禄，并将居住在都城的贵族们强迁至地广人稀之地。同时，吴起还明令禁止儒生们到楚国宣讲不同的政治与宗法理念，以便确保新政的顺利推行。其三是整顿精减统治机构，“捐不急之官，裁剪冗员”，同时选拔贤能为国效力，并对官吏的禄秩作了必要的削减。由此节省下来的资费，一是用作奖励农耕，发展经济；二是用于抚养士兵，强军卫疆。同时，吴起还调集军民高筑修牢国都城墙，大大增强了国都的防御能力，确保了楚国政治中心的安全。吴起历时十年的变革，对楚国国力的增强与日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面对强大的楚国，三晋不敢轻举妄动，楚国趁此还主动向外拓展疆域，在吴起指挥下，楚军挥师南下，一举平定百越；旌戈北指，相继兼并陈、蔡诸国，与秦国形成两强对峙之势。就在楚国经过吴起变革呈蒸蒸日上之际，楚悼王却于公元前381年不幸病逝。那些因变革自身利益受损的贵族们趁机发动叛乱，在楚悼王的葬礼上将吴起杀害。

作为一代战神和继孙武之后最杰出的古代兵学大师，吴起出神入化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博大精深的兵学理论，为后世留下了一份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要在强兵”，是吴起军事思想的核心。作为先后担任魏、楚两国军事统帅的吴起，通过言传身教、以身作则的实际行动和体贴入微、激励教化等有力举措，很好地实现了强兵的目的。史载，每逢战事，吴起不是高高在上，发号施令，而是爱兵如子，“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作为一位军队统帅，不骑马，不乘车，与最下等的士卒同吃同住同挑行囊与军粮，这在古代本已极为罕见，有士兵患毒疮，竟能俯身为之吸吮毒汁脓液，这样的统帅恐怕在古今中外亦绝无

仅有！跟随这样的统帅上阵作战，兵卒们安能不勇往直前，拼死杀敌？他在魏国任西河郡守时，秦国曾调集五十万大军欲进攻魏国。为激励魏军士气，以御强敌，吴起便请魏武侯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庆功宴：他让少数立了大功的官兵坐在前排，使用金、银质的贵重餐具，猪、牛、羊三牲皆陈列于前；让立了次等功的一批人居中而坐，所用餐具质地较前排者次之；而那些尚未立功者，则被安排坐在最后面，且不准使用贵重餐具。宴会结束后，又对立有战功者的父母妻子进行论功赏赐。对战死者的亲属，每岁均派人前往家中慰问与抚恤。这一政策连续实行了三年。当秦军进攻西河（亦称河西）地区时，数万名魏军士卒闻讯后，未等上级下达作战命令，便纷纷披甲挂胄，主动要求上阵迎敌。吴起遂从中选出尚未立过功的五万士兵组成作战前卫，由自己亲自率领，向秦军发起了迅雷不及掩耳的进攻。魏军士卒个个拼命冲锋陷阵，以一当十，形成了无坚不摧的战斗合力，一举击溃了秦军的五十万精锐之师。此役成为古今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范例。

吴起长期理政治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将这些宝贵经验升华为独具特色的军事理论，《吴子》一书便是阐述其“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谋略思想的经典文献。该书系吴起与魏文侯、魏武侯论兵的辑录。《汉书 · 艺文志》著录为48篇，已佚。今存本《吴子》（亦称《吴子兵法》）为6篇，即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全书从不同角度，分别阐述了政治与军事相互结合的重要意义；强调“审敌虚实而趋其危”，是克敌制胜的必要前提；提出了在诸多不可预料或情况突变时的应急战法与胜敌的策略；主张从严治军，严格训练和通过论功行赏，以激励军心斗志等。这些真知灼见，向来为历代兵家所重视。历史上，《吴子兵法》曾与《孙子兵法》一起被合称为《孙吴兵法》，奉为兵学领域的圭臬。后世论兵，亦将二人相提并论，合称为“孙吴”。

魏文侯与吴起

一部恢弘瑰丽的信史——《大店镇志》

魏贤胜

我市第一部乡镇志——莒南县《大店镇志》于2013年12月由黄河出版社出版。全志以大量翔实的资料真实地记录了古镇大店悠久的历史、优美的环境、灿烂的文化、丰富的物产、淳厚的民风，展现了大店地方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和社会演进发展的历史轨迹，反映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人公地位和伟大作用。特别是记述了广大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军民团结、浴血奋战、艰苦奋斗，打败了凶残的日本侵略者和反动腐朽的蒋家王朝，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的光辉历程。记述了新中国建立后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的光辉成就，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为社会提供了一部存史、资治、教化的好教材，为今天我们从事的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提供了有益借鉴。

《大店镇志》遵循志书体例，设置建置、区划演变、自然、经济、社会各方面内容共30编予以详细记述。全书长达1200多页，217万余字。鸿篇巨制，囊括万事，陈述百代，是一部恢弘瑰丽且特色鲜明的地方历史的百科全书和信史。

纵观志林群书，一般县志不过百多万字，乡镇志不过七八十万字，而《大店镇志》超过217万言，实属罕见。其内容丰富，引人入胜，非但不会因规模庞大而使人觉得有臃赘之感，反而会有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琼林漫步、逸兴遄飞、百读不厌、欲罢不能的感觉。通览这部志书之后，掩卷思之，这部巨制除了志书应涉及的应有内容以外，而以下几个方面的独特价值和独具特色的亮点值得人们特别关注。

一是记述了大店镇悠久的历史、绵远的文脉。

大店镇乃鲁东南古镇、名镇。上古时期即有史迹可考，夏商时期曾有东夷方国在此立国，境内留有向国、莒国故址，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早在新石器时代即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已发现大汶口、龙山、岳石文化遗址及周代文化遗存多处。1975年在大店东老龙腰村和街疃村发掘两处古墓，出土文物有两套编钟，见证了商周时代上古时期的高度文明，轰动全国。秦始皇东巡时曾在此逗留，留下了半是现实半是虚幻的文字记载。明代莒州文人刘朴《过马髻山》诗中有“此秦皇观海驱石之遗迹也”的记载。

此地人民有着勤劳勇敢的特征和捍卫正义、反抗邪恶的光荣传统，西汉末年在本郡樊崇领导下举兵起义，全军用朱砂涂眉称“赤眉军”，与当时另一支农民起义军绿林军，是推翻王莽政权的主力。宋代红袄军、元代红巾军曾在此建立根据地，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反侵略、反压迫，求生存的正义之争。明亡后，大店人庄调之曾举兵抗清，表现了凛然不屈的民族气节，清末翰林庄陔兰积极加入同盟会，参加“五四”运动，成为民主革命的先驱。

大店历史上是莒地重镇，境内曾有向国都城和莒国三都之一的渠丘城，有汉代椑县故址，唐代为罗店，至宋金元时期因地处要道通衢，商旅纷沓，店铺林立，遂称“诸陈店”，旋易名“朱陈大店”，驰名遐尔，载于史籍。至民国年间，简称大店而定名。

二是记述了大店庄氏庄园的形成、兴盛与衰落的历程。

大店庄氏地主庄园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庄氏族人与炎黄子孙中的其他氏族家族一样，在社会发展中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随着历史发展，也不断分化，在封建生产关系的制约下，广大庄氏族人沦为贫民，只有少数地主家庭维持了统制地位和剥削形式。至清末形成了130多个堂号（其中较有名的有72个堂号）为代表的地主庄园。民国年间，社会动荡，风雨飘摇，至1940年，只有四余堂、双榴堂、居业堂三家还保留着一些表面上的繁华景象，内部已是危机重重，其他堂号多已衰败没落，破败不堪，有志青年纷纷走出家庭追求新的生活。

《大店镇志》记载，大店庄氏的先祖，系明初江南贫苦农民，一副担子来大店定居。经过100多年的奋斗，至明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已温饱有余，有千斤铁钟捐赠寺庙和供子弟读书的条件，至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五世庄谦中进士，跻身仕途，开始了政治上的崛起，做官为宦者逐步增多。依靠政治上的优势，封建经济势力得以大规模扩张，同时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至清末民初已形成封建性质的庞大地主庄园。

大店庄氏从明末至清末300年来，出过进士7人，举人20人，贡生36人。为官者有巡按1人，道台2人，知府8人，知州6人，知县16人，州同4人，教谕16人，训导26人，县丞7人，兵部主事、刑部主事、工部主事、礼部主事等各1人，上述官员中受封典者33人。成为鲁东南名门大族，据清代最后一次修谱记载，庄瑜以下18代，除世居大店者外，分布于本县和周围各县及江苏、河北、陕西、辽宁等省300多个村镇。2000年，大店庄氏完成续修族谱，载庄瑜以下22代，人口7万余。初步统计，族人分布于全国400多个城市，更有徙居日本、新加坡、美国、加拿大等国者。

大店地主庄园发家的经济因素是多方面的，而收取地租则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大店地主占有土地和山场10余万亩，横跨山东、江苏两省，占据7个县，北至诸城、新泰，南至江苏东海、赣榆，有佃户村70多个，佃户2000多家。同时，还依靠雇工、放高利贷、开当铺等花样繁多的剥削方式，聚敛了大量的财富，造成了大店地主庄园经济繁荣、富甲一方的景象，自称“人行百里不宿别家店，马行百里不食外姓草”。

大店庄氏地主除了经营土地以外，还大力兴办工商业，庄园城内南北二里长的大街两旁，布满了各个堂号的多家商号。有的堂号还远到省内外各大集镇、城市进行经营，如淄博的同兴煤矿，济南的电灯公司、同兴炭站、春柳剧团、小广寒电影院、恒报报社、新鑫养鸡场、养蜂场，青岛的同兴公司、货栈、钱庄、农工银行、北京银行等。大店庄氏兴办的私人工商业达280多处。

在庄氏聚居的大店镇，1840年就建有周长近10华里的围墙，墙高1丈6尺，宽3尺5寸，全由12级岩石垒成，四门是双层城门洞，有两层炮楼上可驻守100多人，并设置五子炮、步枪、手雷等防御武器，形成了一座名副其实、霸踞一方的封建堡垒。

大店庄氏家族在历史上也出现过许多爱国爱民的

志士仁人和有重要建树的杰出人才，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都曾涌现过许多热血青年和革命志士。就是在封建末世、政治黑暗的情况下，也有不少人能独持清操、砥砺品节、不入浊流。有的为官清正，体察民情，不收受贿赂，不殉私枉法，尽力为国家为人民做好事，受到人民的拥护和赞扬。有的明敏英断，主持公道，平反冤案；有的带领人民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发展生产；有的以身赴国，抵御外侮，坚贞不屈；有的崇文重教，严谨治学，品行方正，著书立说；有的身体力行，孝悌仁爱、热心济世救人，美名流传后世。

随着社会的变革，大店地主庄园逐渐走入腐朽、没落、灭亡。其中的一些人愈来愈加腐化堕落。有的穷奢极欲，花天酒地，醉生梦死，荒淫无耻；有的作威作福，欺压百姓，草菅人命；有的强取豪夺，横行不法，榨取钱财不择手段；有的认贼作父，甘当汉奸，祸国殃民。

腐败必然导致灭亡。大店地主庄园代表封建的生产关系，已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民主革命的洪流中被冲垮已是历史的必然。1942年至1944年，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惩恶霸、斗地主、分田地，清算了反动地主分子的罪行。至此，大店地主庄园封建势力彻底垮台。今天，地主庄园已成为一个历史陈迹记忆的符号。

三是记述了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及其夺取“两战”胜利中发挥的重大作用。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大店一度成为山东抗日革命根据地的中心，被誉为“山东小延安”。

1937年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向山东，1938年3月2日，日军小仓厅部队占领大店，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大店一带的人民不甘亡国破家之辱，有的自觉参加当地抗日组织，秘密抵抗；有的拉起队伍，跟日本鬼子展开斗争，许多抗日义士，先后为国捐躯。

1938年8月，山东抗日游击四支队进驻此地，中共鲁东南特委在大店成立。1940年11月，我八路军部队与中共秘密党员国民党东北军一一一师师长常恩多、三三三旅旅长万毅率部一起一举消灭了盘踞在大店据点的日伪军。1942年刘少奇同志具体指示、中共山东分局领导了大店镇减租减息运动，1944年进一步实行土地改革，对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斗争产生了巨大作用。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大店一带一直是党和人民军队的稳固后方。中共山东分局、山东省战工会、八路军一一五师司令部、山东军区等许多重要机关长期驻扎在这里。同时，抗大一分校、大众日报社、北海银行、山东战时邮政总局、华东军政大学、山东军区八大兵工厂、八大剧团、山东画报社、山东新华书店等重要单位也都在这里驻扎或组建并开展工作，与广大人民结成了血肉相连、亲密无间的鱼水深情。

抗日战争中，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八路军一一五师司令部曾在此运筹帷幄，指挥了甲子山战役和五次大规模反“扫荡”战斗。解放战争中，中共中央华东局（代管华中局）、华东军区、新四军、山东军区、华东野战军指挥机构驻在大店一带，指挥了解放临沂等一系列重大战事。刘少奇、罗荣桓、徐向前、陈毅、肖华、谷牧、陈士榘、朱瑞、黎玉、邓子恢、饶漱石、康生、刘兴元、张仁初、舒同等许许多多领导人在此工作，领导了建党建政和自卫战争、土地革命等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毛泽东主席对山东根据地的革命工作多次及时给予关心和具体指示。国际友人奥地利医生亚格布·罗生特、德国记者汉斯·希伯、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联合国救济总署负责人白地格兰恒女士都曾在大店一带工作，为抗日战争做出了特殊贡献。

1945年8月13日，中共领导下的第一个省政府——山东省政府在大店镇宣告成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奠定了莒南大店成为山东解放区红色首府和革命圣地的地位。大店由此成为可与井冈山、延安、西北坡媲美的红色根据地和革命摇篮。

抗日战争胜利后，占领东北、挺进东北的主力便是山东根据地一一五师及山东军区主力部队，随军去东北的还有我根据地地方干部6000多人。罗荣桓率领挺进东北的部队就是从大店和莒南县启程的。解放战争中，华东野战军大军南下，随军南下接管南京、上海等城市，建立浙江、福建及湖北、四川、云南等各地地方政权的南下干部八批数万人，其中有1000多人是莒南地方干部。他们都是先在大店集训，然后登上南下征程的。以莒南大店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为反侵略、求解放、建立新中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四是记述了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大店镇发生的巨大变化。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大店镇人民乘势而上，以招商引资为突破口，走农业振兴、工业腾飞、商贸并重之路，使镇域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此，《大店镇志》作为重点内容进行了详细记述。

首先，农业基础地位继续加强。由于调整产业结构，围绕市场种花生、草莓、蔬菜、杂果、花卉等经济作物，粮经比例5：5，收入连年增长。全镇已形成2万亩大棚草莓、8000亩杂果、6000亩蔬菜、2000亩花卉的

特色农业生产基地。其中，草莓、杂果规模面积居全省各乡镇之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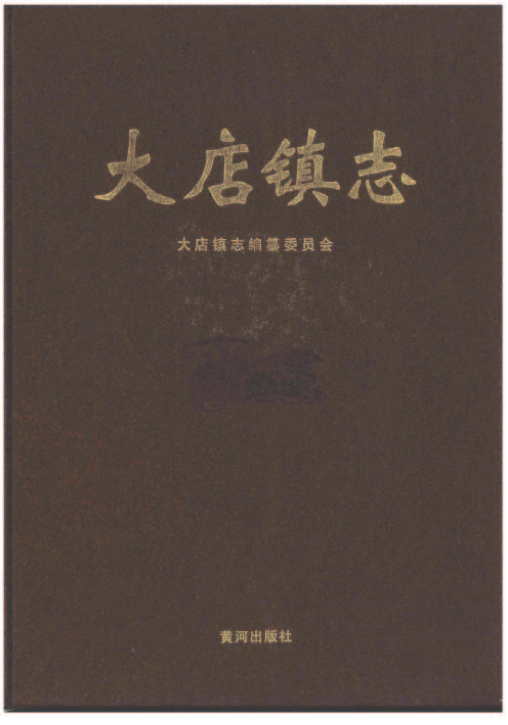
其次，工业发展势头强劲。大店镇是省政府命名的工业主导型中心镇，工业基础雄厚。2007年全镇民营经济总产值42.2亿元，利税1.3亿元，企业增加值10.2亿元，规模以上企业22家，有自营出口权企业25家，通过ISO9000国际质量体系认证企业16家。

再就是第三产业发展迅速。1978年后，个体私营商业、饮食业、服务业日益繁荣，先后建起了镇集贸易市场、农工贸批发市场、镇驻地商业街1条，草莓批发市场6处，个体私营园区22处。近年，依托省政府旧址和天马岛景区，带动了旅游、餐饮、娱乐等服务业发展，2007年底全镇共发展旅游餐饮服务业机构60余家，从业人员3000多人。

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时间里，大店镇通过年复一年的不解努力，先后共获得以下极具影响力的靓丽名片：山东省“百镇建设示范行动”示范镇、临沂市优先发展重点镇、山东省工业主导型中心镇、山东省小城镇建设示范镇、山东省特色产业镇、山东省文明镇、山东省生态文明镇、山东省旅游强镇、山东省花卉百强镇、中国磨具第一镇、山东草莓第一镇等。

经济繁荣，科技进步，带来了生活的巨大变化。如今，人们的衣食住行也发生了质的飞跃。上世纪60年代以前，各村房屋几乎都是茅草房。80年代以后各村都相继建成砖瓦房或者楼房。电扇、空调、水暖气、电暖气、电冰箱、洗衣机等现代化设备，已进入寻常百姓家。部分居民的生活水平正在渐渐接近城里人。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店仅有一条莒新公路贯通。现在，从镇驻地到每个村庄都铺设了沥青路或水泥路。1970年前，人们出行靠步行或骑自行车，90年代中后期不少人骑上了摩托车，2005年以后有条件的家庭已拥有了轿车或面包车，普通居民可以乘坐县乡公交班车。教育、卫生、医疗、养老、休闲娱乐等条件也都得到了日新月异、实实在在的改善。大店人民凭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创造了美好的生活，建设了美好的家园。

《大店镇志》编写历时七年之久，可以想象，若是没有镇党委、镇政府领导的高瞻远瞩的决策和编写人员锲而不舍的顽强拼博、无私奉献精神是很难告竣的。这种精神在对今天各地正在认真贯彻李克强总理关于编修地方志工作的重要指示，开展第二轮编修地方志工作中也是应该认真研究和借鉴的。



中医天路行

——陈权足迹

惠东波

祖国的中医学犹如一座直刺云天的巨大山峰，如果说通向极顶必有一条天路，那也只是为不懈的攀行者而存在。

——题记

一

我们可以试着想象这样一个会偶然碰上的画面：午夜12点刚过，一些人陆陆续续来到某个门前，井然有序地排起队伍。为了解决长时间排队的疲倦，其中不少人手里拿着马扎、小凳。随着时间推移，队伍在延长，蜿蜒而去……他们不是为了职业或学校而报名，也不是为了抢购一个新的楼盘，更不是为了买股票、炒黄金，他们只想预约一个人，或者说为了预约健康，预约生命。

他们是在排队挂号，专家的名字叫陈权，临沂市人民医院中医院副院长，主任中医师，首席中医专家。

开始出现这种火爆场面时，全院惊讶，院长感叹，“我们医院终于有了需半夜排队挂号看病的专家了”，话中蕴含着对陈权从医“名气”的肯定和由衷的自豪。访谈陈权也颇费周折，几次都因他诊务繁忙、或外出讲座、学术交流而耽搁。其实，对陈权来说，“名气”切切实实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艰辛努力，玉汝于成，绝非一夜成名。

陈权18岁山东中医药学校毕业后入临沂市人民医院。当时，对国家来说，还处在“知识越多越反动”、反对“白专道路”的时代；对自身而言虽然努力读得了一些书本理论，获得了一些课堂知识，但远不够应付临床，更别说治疗疑难重症、攀登医学高峰了。但是职业使他遇到了一个导师，当时的中医科负责人袁正瑶。袁主任告诉他：读了几年书，在中医学上，你还不算入门呢，干好这一行，首先要气闲神定，要潜心钻研，勤于临床，方成大器。陈权记住了这些，开始了自己的中医事业，也开始了人生舞台上的摸爬滚打。

他对疾病的研究治疗，是从治疗发热开始的。发热在中医中称为外感热病，即感染性疾病，如乙脑、麻疹、流感、流行性出血热、无名高热、肺炎等，病因多样，机理复杂，处理起来十分棘手。他紧跟前辈们，诊断、查房一步也不落下，看到或参与了许多例危重病人的救治，逐步有了经验的积累，结合与理论知识的对照琢磨，产生了许多更加深化的理解。

一天早晨，他遇到一位本院职工，称其孩子发烧已一月有余，西药尽用无效，每天黄昏便高烧不止，各种化验手段也查不出原因，请他去病房会诊。诊断后，根据患者病情和治疗过程，试着用辨证论治原理，开了一服中药，中午服下，当晚再服，竟没有再起烧。坚持服用几副药后，痊愈了。

不久后，地区计委一位负责人也找到他。这位患者低热三个多月，当时正值秋末初冬，怀疑就是感冒，以后每天午后即发热，浑身发冷，全身酸楚，不口渴，不出汗，不拉肚子。各种药物都试过了，仍不见疗效。陈权对其仔细号脉观察，发现其脉浮紧，舌淡苔白，经过认真辩证四诊合参，诊断为风寒之邪外束肌表，腠理密闭，所以恶寒无汗而发热。他遵张仲景《伤寒杂病论》麻黄汤法，只开了一副，服了半剂微汗后病竟然也好了。

“名气”在不知不觉中就有了，当时，西药中抗生素滥用已有苗头，但熟悉陈权的人，谁家有人头疼发热，便会说：“找陈权医生开几服中药，喝了就好了。”那时，他才20岁刚出头。

时光荏苒，寒去春来，陈权先后毕业于山东中医学院和山东大学医学院，学贯中西，造诣叠进，与当年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他已然成为对内外妇儿诸疾均研究颇深的著名专家，尤其肾病、脾胃病、外感热病及妇科经带胎产难杂病的辨证论治方面造诣很深，同时应用中医、中西医结合诊治各类难治性肾脏病、慢性肾脏病，慢性肾衰竭早、中期和急慢性胃炎、溃疡病、结肠炎经验独特，还在肿瘤和风湿病的中医药治疗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主持并荣获省市级科技进步奖10多项，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主编、参编专著4部。各种称号也纷至沓来：“临沂市名中医药专家”“山东省新长征突击手”，省卫生厅“优秀学术继承人”“山东省名中医专家”，2011年中国科协“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2012年被评为首届“临沂市十大名医”， 荣获“振兴沂蒙劳动奖章”……在国家省及市级中医等专业学会中担任着重要职务。

“名气”是否实实在在，自有患者公议。近10年来，陈权年门诊量均逾万人次，病房查房会诊逾千人，慕名而来的患者中，江苏、浙江、广东、四川及东北等地的病人占了30%。

二

祖国的中医药学，历经几千年无数代人孜孜探索，高如喜马拉雅令人仰止，深如无尽

东海浩瀚博大。从事这一事业，陈权称之为“医路漫漫”，只有追求，没有穷尽。他说，有三点必备：一是读经典，二是跟名师，三是做临床。

读经典，务在“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夯实理论基础。陈权意识到，既然选择了医学这门职业，就与书本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从《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经典读起，坚持随时随地不离不弃，重点条文倒背如流，格言名句出口成章。同时，广泛涉猎各时代医书，泛读不止，坚持至今。他遵师训“每日必有一得”，总要带着白天临床遇到的疑难问题、复杂病例，晚上读医书、查资料，寻求答案，天长日久成为习惯。对此，凡住过一个宿舍的“室友”均印象深刻，多年后还津津乐道，深感敬佩。但他自己从不沾沾自喜，认为这是选择从医的必须，只有对经典著作细琢精读，深刻感悟，才能在指导临床中举一反三，变通活用。这一点做不到，便是庸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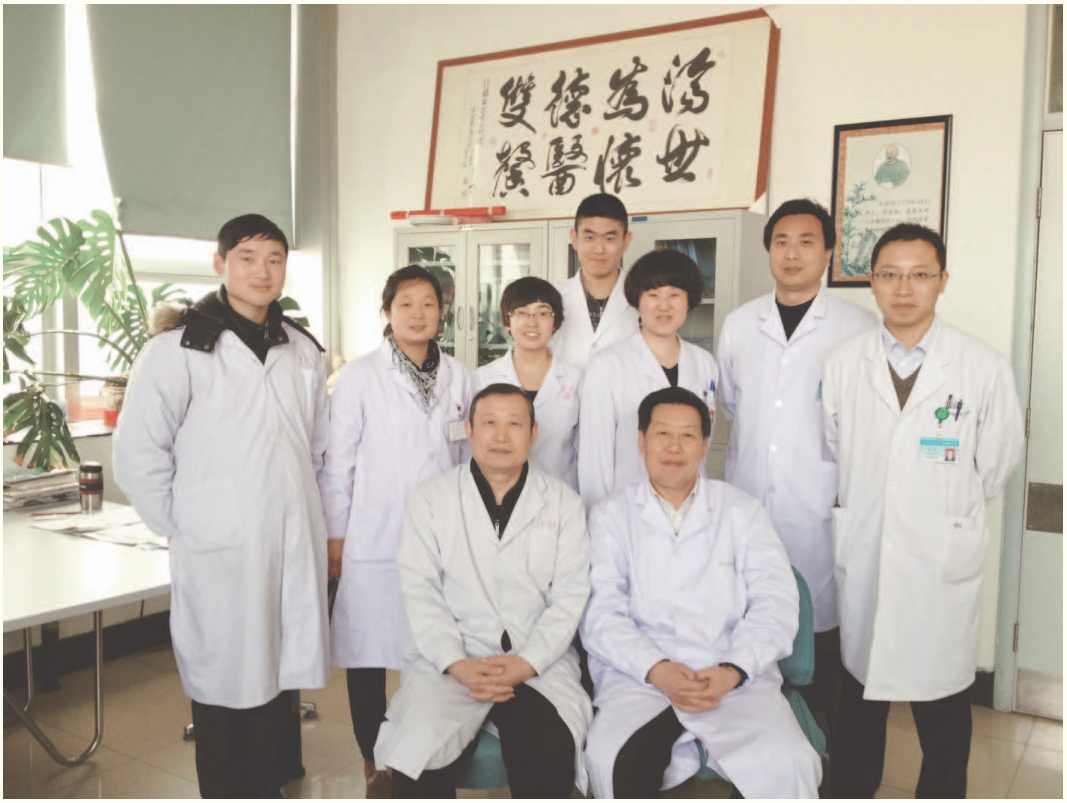
让陈权倍加感念的，是他从医经历中遇到的几个好的老师。临证以来，他四处游学，多方拜师。初涉医林，先识我市名老中医袁正瑶、姚子扬两位大师，是他们真正地把他领入祖国医学大门，后又师从中国中医科学院孙桂芝、薛伯涛教授，再拜国医大师朱良春教授为师，成为朱老的入室弟子。

从不同的导师那里，在不同的时期，贪婪地吸收着各方面知识的营养。他深深感到从名师那里汲取宝贵学术经验，达到承学术、走捷径、丰羽翼的目的。他对老师皆尊若父母孝敬有加。早在1991年，在卫生部组织的全国首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传承工作中，他就被遴选为姚子扬主任医师的学术继承人，在全面继承的基础上，主攻肾脏病专业，经老师言传口授，刻苦学习3年，经严格考核和论文答辩，顺利出师。20多年过去了，这项战略性的继承工作已到第5批，陈权也由继承人完成了向传授人的转变，成为第4批、第5批师承工作的指导老师、博士生导师，被聘为徐州医学院、滨州医学院、山东中医药大学兼职教授。他同样诲人不倦，倾囊传授，带出两批学生，已有2批4人出师，其中一位博士研究生、一位硕士研究生。

国医大师朱良春教授常说：“中医之生命在于学术，学术之根源在于临床，临床之水平之检验在于疗效”“医之临床，胜于临敌”“医之用药，如将帅之用兵”。多年来陈权也是这样践行的。他认为做临床搞科研要在严谨治学的基础上，勤于实践，坚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千锤百炼，总结经验，不断升华，方成正果。因此他坚持从医一天，临床一天。临床中，面对的是病人，他用心用情，几近极至。十多年前，他接治了苍山县一邵姓中年男性患者，患慢性肾炎，肾功能衰竭，有关指标极不乐观。治疗这种疾病，本是陈权的拿手好戏，几经中医药调治，血尿检验明显好转，病情一直稳定。之后他还是时时关注这位农村患者，果然后因农忙及经济拮据而停药，加上3个月后生气及感冒后致病情加重，恶心呕吐，下肢浮肿，面色萎黄，血清肌酐达800 β mmol/L以上，西医建议血液透析，他拒绝了西医的建议，再次邀请陈权中药治疗，经中药调治2个月好转。这种事例不胜枚举，患者登门致谢多少次，门诊收到的锦旗多少面，都难计数，而其体现的医术医德，却在广袤的沂蒙大地乃至更大范围口口相传。

三

无论什么学科，创新永远是其发展的生命力，中医药学科也绝不例外。多年来，陈权绝不因自己的成果而固步自封，崇尚“提倡与时俱进，顺应时代特点，因时因人制宜”的原则，在许多领域继承传统而不拘泥呆板，实事求是而不照本宣科，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创新，成为其医术进步的一大特点。这对于一个研究传统科学的工作者来说，实属难能可贵。譬如脾胃病，包括各种急慢性胃类、溃疡病、胃食管反流病、功能性消化不良、溃疡性结肠炎、慢性泄泻等胃病和肝炎、肝硬化、脂肪肝、胆囊炎、胆结石等肝胆疾病，都属



最常见的病。传统的中医学也已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病理判断和诊疗套路。陈权在全面继承先师经验、博采众长的前提下，没有陷入模式化禁锢，更不搞一个单子吃药，而是大胆探索研究，提出“重视肝脾，斡旋中焦气机，条分虚实寒热，主以轻清凉润”，擅用滋脾通络，进而完善了“轻清凉润”大法，治愈了很多患者，也得到了中医药界的充分认可和高度评价。

再如恶性肿瘤，近年来发病率逐年走高，并有年轻化趋势。对此，陈权很早便有关注，决心潜心研究，以自己掌握的中医药知识与之一搏。他曾到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肿瘤科进修，又拜了擅长治疗肿瘤风湿病，对虫类动物药有深入研究的中医泰斗国医大师朱良春教授为师，学到了许多治疗肿瘤的宝贵经验，加之多年的临床摸索，不断总结，疗效甚好。他认为，在肿瘤的治疗上，西医常用的手术、化疗和放疗确有良效，尤其对早期发现、体格健壮的患者，往往可以根治，目前仍是临床常用的三大手段。但现实中，多数肿瘤病人一经发现往往已处晚期，不但失去手术机会，连放化疗也难以承受。放化疗的特点，虽可有效地杀灭癌细胞，但同时又良莠不分，对人体伤害极大。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这种情况：病人经放化治疗后，骨髓抑制，吐泻纳呆，数日脱发，几近衰竭。稍迨恢复，又行下次疗程。如此反复，往往人去财空，治了病要了命。而通常所说的恶性肿瘤“三分之一吓死，三分之一病死，三分之一治死”虽有偏颇，也反映出一些现实问题。实践业已证实，癌细胞是杀不尽、灭不绝的，只要残存有一个癌细胞，它就能分裂变生出多个、甚至成千上万个，造成复发或转移。他辨证论治、扶正祛邪，重视因人因时因地制宜，遵循师父的教诲，治疗肿瘤也要讲和谐，讲辨证。他认为治癌必须在扶正培本、调养正气、增强和调动自身修复能力，提高自身免疫力、内在抗病能力上下功夫，以主动祛除病邪，战胜疾病。即使不能完全根治，使肿瘤处于静止、稳定、不发展状态。或在一定条件下，与癌细胞和平共处，相安无事，长期带瘤生存，也不失为上策。治病说到底是为了延续和健康生命，何乐不为？

在诸如男、女科疾病等领域，陈权同样保持着研究、探索、创新的活力，原因在于前

面的未知世界还很多很多，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正如97岁高龄的老师朱良春教授所说：“世上没有不治之症，只有不知之症”，自己作为继承人，怎能停下追求真知的脚步！

四

“大医精诚”，陈权追求的是这样一种境界。医是仁术，做医生要有菩萨心肠，要有怜悯之心，“一人生死关系一家，倘有失手，悔恨何及。”他诊治过的病人数以十万计，但都坚持一视同仁，不分地位高低，没有贫富妍媸分别，能够区分的只有病情轻重缓急，一切为了生命和健康。

他近40年的从医之路，正是国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变革的年代，在亲身经历了、享受了改革及成果的同时，也经历了各种观念的冲击。他是中医，自认为是需要耐得住寂寞，经得起各种诱惑的行者，是一个不惧孤独、追求真理的探索者。他看到很多现象：中医教育过分强调外语，却忽视古汉语，学中医的读不懂经典名著；中医药院校培养的学中医的学生看不起中医，不相信中医，不想干中医，甚至成了中医潜在的掘墓人；中医院无特色，中不中，西不西，置中医学术不顾而言他；街头野医游医大多打着中医旗号，骗财害人，不惜祖国中医宝贵的形象千疮百孔……他很愤懑、很担忧、有时又很无奈，期盼着这些现象的改观。

正因为如此，他感到了责任的重大，完成担当的途径只有一条，那就是沿着既定的道路义无反顾地前行。现在山东省卫生厅、省中医药管理局命名的“陈权名中医学术经验传承工作室”已经挂牌，并领衔成立了“临沂市中医药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和“临沂市余九堂中医临床研究所”，承担着来自全市基层卫生部门的临床中医学术骨干的分批培训。他经常和学生们说：我恩师朱良春老先生年逾九十有七，仍手不释卷，总结经验，著书立说，把脉省疾，课业授徒，讲学会诊，为中医的发展振兴，学术的传承创新，奔走于国内外。我今刚五十有八，修业养性，建树成学，尚未晚矣。

是的，科学的巅峰固然尚难征服，但只要前行，便会一步步靠近，便会一步步领略新的风景，岂不快哉！

市史志办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10月20日上午，市史志办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市史志办主任、党组书记朱海涛主持会议并作总结讲话。市史志办全体党员干部职工参加了会议。中共临沂市委第十八督导组组长、市纪委派驻二组书记王培栋到会指导并讲话，对史志办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情况及取得的明显成效予以充分肯定，并要求市史志办进一步统一思想、端正态度，用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坚持抓常抓细抓长，以实现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临沂市志》（1995～2010）第一部完成征求意见稿。自2013年10月《临沂市志》（1995～2010）第一部从分编阶段进入总纂阶段以来，市史志办编纂人员认真进行完善篇目，核实、增补资料，合理统筹内容归属，删繁去冗，解决交叉重复，规范语言文字等项工作，数易其稿。至2014年10月中旬，完成征求意见稿。

《临沂市志》（1995～2010）第一部首设综述，次设大事记，之后依次设行政区域、自然环境、人口、人物、城乡建设、国土资源、环境保护、交通、邮电七编，共110多万字。《临沂市志》（1995～2010）分三部，计划分别于2015、2016、2017年依次出版。

临沂市史志办参加全省市县组稿培训会。11月24日—25日，《山东年鉴》2015卷市县组稿培训会议在济南召开。省史志办副主任郭永生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年鉴处处长杨军仕到会授课。会议对《山东年鉴》2014卷的编纂工作情况作了简要回顾和总结，对《山东年鉴》2015卷的编纂工作进行了部署。按照会议要求，市史志办副主任段洪带领市史志办年鉴工作人员及临沭、莒南、沂水史志办工作人员参加会议，并在会议上进行了年鉴组稿、撰稿经验交流。

市史志办领导班子到“第一书记”任职社区调研。12月16日，市史志办主任朱海涛、调研员伊永航、副主任段洪等领导班子成员到“第一书记”任职社区——费县费城街道泉子山社区调研，费县县委常委、市委选派“第一书记”工作组费县大组长李军等陪同。市史志办领导班子听取了驻村工作组入点以来的工作情况汇报，详细了解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桶装矿泉水厂建设、小型水库除险加固项目建设等情况，并提出了具体指导意见，就下一步如何做好选派任职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还向社区赠送了《沂蒙革命根据地志》、《临沂年鉴》、《沂蒙史志》等图书。

《费县志》（1986–2010）志稿评议会召开。12月16日—17日，《费县志》（1986–2010）志稿评议会在费县召开。省史志办副主任翟世林、市县基层志编纂指导处处长李刚，临沂市史志办主任朱海涛，费县县长刘飞、副县长王康艳等出席会议。省史志办王耀生、屈婉情，省专家组成员王笃银，临沂市及所属各县区史志办部分史志专家和业务人员共40余人参加会议，临朐县史志办负责同志应邀参加会议。

省史志办副主任翟世林在会议上发表讲话，对《费县志》（1986–2010）志稿编纂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希望编纂人员认真归纳梳理评议意见，制定切实可行、科学合理的修改方案，力求修出一部经得起考验的精品志书。朱海涛主任在讲话中对费县高度重视修志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就全市下一步抓好二轮修志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与会专家对《费县志》（1986–2010）志稿进行了全面会诊，提出了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沂水县史志办积极指导基层修志工作。9月23日，沂水县史志办有关业务人员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进行《沂水县城乡建设志》编纂业务指导，就志书的篇目设置和资料收集提出了指导意见，并与志书撰稿人员进行业务交流。

《莒南年鉴（2014）》出版发行。由中共莒南县委、莒南县人民政府主办，莒南县史志办编纂的《莒南年鉴（2014）》，近日由黄河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书主要有特载、大事记、专记、县情综述等25个栏目，共70万字。该书全面、翔实地记载和反映了2013年莒南县加快城区和新农村建设，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历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地域特点。年鉴在编纂中实现结构及内容改版，创新收录了市级以上重点党报党刊刊发的新闻报道稿件，更真实地反映了2013年莒南的发展变化。

《临沭文物》出版发行。近日，临沭县第一部文物专著——《临沭文物》出版发行。《临沭文物》由临沭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共同编纂而成，设概述、古迹、近现代重要史迹、石器、陶器、铜器、瓷器、石刻、玉器、杂项、后记11个部类，共2.8万字，配图220余幅。